

THE CAPITAL CITIES
OF LIAO DYNASTY

内蒙古出土文物暨
辽南京建城 1080 年展

首都博物馆 编

大辽五京

首都博物馆 书库
丁种 第肆拾捌部
《大辽五京：内蒙古出土文物暨辽南京建城 1080 年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辽五京：内蒙古出土文物暨辽南京建城 1080 年展 / 首都博物馆编. --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12
ISBN 978-7-5010-5806-8

I . ①大… II . ①首… III . ①出土文物－内蒙古－图
录 IV . ① K873.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49153 号

大辽五京 ——内蒙古出土文物暨辽南京建城 1080 年展

编 著：首都博物馆

责任编辑：智 朴
特约编辑：裴亚静
责任印制：梁秋卉

出版发行：文物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东直门内北小街 2 号楼
邮 编：100007
网 址：www.wenwu.com
邮 箱：web@wenwu.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635mm×965mm 1/16
印 张：19.75
版 次：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10-5806-8
定 价：360.00 元

本书版权独家所有，非经授权，不得复制翻印

主办单位

北京市人民政府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

协办单位

北京市文物局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

承办单位

首都博物馆 内蒙古博物院

展览项目组

展 览 主 持：韩战明 陈永志 杨文英 付 宁
项 目 统 筹：谭晓玲 吴 明
展览责任人：杨 烨 马晓珣
展 览 大 纲：高红清
展 览 设 计：李 赫
文 物 管 理：王显国 李 兵 于力凡 柳 彤 韩 冰 闫 娟 杨静兮 马悦婷 王丹青 李 梅
迟海迪 丁炳赫 马英豪
照 明 设 计：索经令 吕 欧
摄 影：梁 刚 谷中秀 张京虎 朴 识
图 片 编 辑：韩 晓 白 琳 杨 妍
图 片 提 供：朝阳市北塔博物馆 阜新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辽阳博物馆 凌源市博物馆
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辽宁省博物馆
巴林左旗辽上京博物馆 赤峰市博物馆 内蒙古史前文化博物馆
宁城县辽中京博物馆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巴林右旗博物馆 内蒙古博物院

致 辞（一）

公元938年，辽升幽州为南京。北京作为陪都和大辽五京之一，在民族融合与国家发展的历程中，正式进入作为国家首都的历史准备期。公元938年对于北京这座伟大城市和我们的伟大国家来说，是一个承前启后、值得纪念的重要历史时刻。

“大辽五京——内蒙古出土文物暨辽南京建城1080年展”作为首都博物馆“品鉴智慧北京”系列展览的2018年特展，历经三年的创意、研究、打磨，现已接受公众的评判。作为全过程的亲历者，其中的酸甜苦辣，我最清楚。2016年，在首都博物馆推出“大元三都”展的同时，著名考古专家、我馆副馆长宋大川先生即已提出策划“大辽五京”展的基本思路，得到了决策层的集体支持。著名世界史专家、我馆学术委员会主任、前馆长郭小凌先生积极推动，启动筹划；韩战明同志接任馆长后多方协调、狠抓落实。在杨文英副馆长的直接调度下，由谭晓玲博士牵头负责的策展团队，历时三年开展深入细致的馆藏文物研究和赴各文博单位进行调研求教。高红清博士在担当展览大纲撰写工作的同时，还就燕云十六州的历史深入学术研究，有关学术专著即将面世。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由设计师李赫牵头的展览设计团队，通过与策展团队的磨合，不仅坚持了“首博展览”宏大叙事的历史艺术风格，而且将一个个学术成果、知识细部以图和表等多种呈现方式表达于观众面前。在展览施工阶段，以吴明、李丹丹同志为首的部门同仁以追求卓越的精神，努力使每一个细节做到最好。

在这一展览从策划到呈现的1000余个日夜中，从国内合作与民族考古研究部的最初案头，经历藏品管理、财务支撑、宣传教育、信息出版、开放安保、后勤保障等各个团队的不断加入，到陈列艺术与创意开发部的最终呈现，一个个首博人、首博团队为了首博荣誉付出着、坚守着，让我感动于首博学人的求真，感佩于首博员工的奉献，而最让我欣慰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办馆初心，在新时代首博人心中牢牢树立。

当然，我要代表首博人感谢市文物局对此展的把关，感谢舒小峰局长、于平副局长的全程参与和全力支持。同时，也要代表首都文博人向全国的

文博同行致谢！此展共有来自17家国内文博单位的270（件）套文物上展，其中一级文物103（件）套。这在全国观众对大辽时代和契丹民族有了最为完整和直观的历史对话，正如展览结语所言：“借由大辽五京，我们大体勾勒出了契丹族及其政权的生发轨迹，而这一过程无可辩驳地实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和特点。”

最后，我要代表京蒙两地文博人向蔡奇书记和陈吉宁市长、布小林主席致敬！感谢您们对此展的关怀与支持，让我们能够心无旁骛精研究，力求完美抓呈现，为全国观众呈现出具有全国文化中心品质的历史文博展览，在“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的同时，更加深了京蒙互助的深厚友谊，坚定了推进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振兴中华实现中国梦的信心和决心。

首都博物馆党委书记 白 杰

2018年11月18日

致 辞（二）

契丹族是我国古代北方著名的少数民族之一，北魏之际见于史乘，隋唐时期势力强盛，五代宋初建立了强大的辽帝国，金元之际完全融合于其他民族之中，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古老的民族，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政治上，契丹人建立的辽王朝，“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因俗而治”，将存在于中国北方农耕与游牧两大经济形态完美地结合与统一，结束了中国北方诸民族长期对抗纷争的无序状态，奠定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历史根基。在文化上，契丹人创造的辽文化是举世瞩目的。两重的政治体制所孕育出的民族文化，既有贯通古今遍及全国的共性，又有其时代、地域与民族特点，二者的参同契合、互为因果，导致了契丹社会多元汇聚的文化内涵与南北文化的再造与升华，奠定了我国古代北方各民族万风而归于一元的基础。“万国河山有燕赵，百年风气尚辽金”，“涿州沙土饮盘桓，看舞春风小契丹”，契丹民族在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大舞台上所展示的民族风采是异常醒目的，从“华夷同风”之绝唱，再到“我本丹东八叶花”的豪叹，无不证实契丹人所创造的辽文化，早已深深地融入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之中。自辽朝以后，“契丹”一词风靡于世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中华民族之代称，可见其影响之大。纵观契丹人的历史，在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历史发展的链条中处于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对于契丹族物质文化的深入研究与展示，是揭示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历史真实面貌的一个突破点，也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平台。

“大辽五京——内蒙古出土文物暨辽南京建城 1080 年展”在首都博物馆闪亮登场，这是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与北京市人民政府首次联袂举办的文物展览，这是内蒙古自治区和北京市两地文化建设上的又一件大事，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意义。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具体工作任务，为我们做好文化遗产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的瑰宝，承载着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明。通过此次展览，我们力求讲好

内蒙古故事，讲好中国故事，以深入发掘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更加坚定文化自信。

内蒙古东部草原地区是契丹人的肇兴之地，也是契丹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契丹人所创造出的丰富多彩物质文化，有如璀璨夺目的明珠，镶嵌在中国北方的大地上。在内蒙古自治区、山西省、辽宁省、北京市分布有辽上京、辽东京、辽南京、辽西京、辽中京等都城遗址，辽代五京的城市建置，四时捺钵的生活习俗，是契丹辽文化的精粹，真实地体现了辽代社会生活的概貌。在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两地还保存有辽祖陵、辽怀陵、辽庆陵、辽显陵、辽乾陵等五大皇帝陵寝。近年来，陈国公主墓、耶律羽之墓、宝山辽墓、吐尔基山辽墓、萧氏贵妃墓等辽代重大考古发现，可谓石破天惊。此次展出的辽代文物精品，有光彩照人的金银器，有晶莹剔透的玉器，有冰肤玉洁的瓷器，还有神秘莫测的佛教器具，林林总总、洋洋大观，真实地再现了契丹人政治、经济、文化的真实状况，也充分地展示了气势恢宏的辽文化。

内蒙古自治区地处祖国北疆，是我国的文物大省区，历史文化积淀丰厚，文化遗产体系庞大。目前有古文物遗址 2.1 万处，可移动文物 112 万件套，国家珍贵文物 16 万余件。本次展览，共展出精品文物 270 余件组，其中由内蒙古自治区借展文物 182 件组，包括国家三级以上珍贵文物 135 件组。这些精品文物主要来自于内蒙古考古发掘的辽代重要遗址和墓葬，其中有五处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此次展览可以说是一个盛大空前的文物盛宴。通过这些文物精品的展示，可以让广大的观众真实地了解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正确地认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

内蒙古博物院院长 陈永志

2018 年 11 月 18 日



目 录

001 学术论文

- 002 论辽代都城与皇陵的突出普遍价值 / 陈永志
- 009 内蒙古多伦县辽代贵族墓葬发掘 / 盖之庸
- 018 辽代契丹贵族的葬俗 / 万雄飞
- 024 辽上京皇城遗址考古新发现和研究 / 董新林 汪 盈
- 033 朝阳北塔地宫辽代石经幢及相关问题研究 / 王志华

043 前 言

045 第一部分 五京备焉

- 046 临潢天府：辽上京
- 057 辽阳奥壤：辽东京
- 082 燕台翼京：辽南京
- 090 云中帝城：辽西京
- 092 奚地皇都：辽中京

103 第二部分 四时捺钵

131 第三部分 南北面官

- 132 经略幽燕 坐制南邦
- 146 官分南北 因俗而治

157 第四部分 华夷同风

- 158 君臣同志 华夷同风
- 179 文物彬彬 不异中华

267 第五部分 塔寺巍巍

306 结 语



学术论文

论辽代都城与皇陵的突出普遍价值

陈永志·内蒙古博物院

内蒙古东部草原地带在历史上是辽代契丹人的肇兴之地，也是契丹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一地区分布有契丹都城辽上京(今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和辽中京(今赤峰市宁城县铁匠营子村)，同时还保存有辽祖陵(今赤峰市巴林左旗石房子村)、辽怀陵(今赤峰市巴林右旗岗根苏木)和辽庆陵(今赤峰市巴林右旗索布力嘎村)三大皇陵。这是内蒙古自治区极为珍贵的物质文化遗产，在世界上享有盛誉，闻名遐迩，其所蕴含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信息是异常丰富的。近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辽代契丹人特殊而又神秘的丧葬制度，琳琅而又多姿的随葬品，有如阿里巴巴宝藏的大门，逐渐地在向世人打开。深入发掘辽代都城与皇陵的突出普遍价值，真实地再现了契丹人政治、经济、文化的真实状况，彰显契丹民族文化遗产的特色与优势，这有利于我们深入地了解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正确地认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

一 辽代都城与皇陵营建的历史背景

契丹族在五代宋初建立了强大的辽帝国，与北宋相互抗衡对峙，学界称之为“第二次南北朝”。关于契丹族的起源有着一个美丽的传说：在北方草原上有两条河流，一条叫“潢水”(今赤峰市西拉木伦河)，另一条河叫“土河”(今赤峰市老哈河)，传说一位驾着青牛车从潢河而来的仙女，与一位从土河骑着白马来的仙人，在两河的交汇处的“木

叶山”相遇并结为夫妻，其后子孙繁衍成为八个部落，这八个部落的名称分别为“悉万丹”“何大何”“伏弗郁”“羽陵”“匹吉”“黎”“土六于”“日连”。逐渐发展成为以后的契丹族。契丹之名始见于北魏，居潢水(今赤峰西拉木伦河)之南，黄龙(今辽宁朝阳)之北，常以“名马文皮”献于北魏，其后经过了大贺氏和遥辇氏两个部落联盟时代。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年)，归附唐朝。公元648年，唐朝以其地置松漠都督府(今赤峰市林西县南)，以其首领窟哥为都督，赐姓李氏。又置十个羁縻州，各以其部落首领为刺史。契丹与唐保持朝贡贸易关系，唐赐以“奉国契丹之印”。唐天复元年(901年)，出身于遥辇氏世里家族的耶律阿保机被推为夷离菑，首先征服了周围的奚、室韦、于厥等族，并南越长城攻伐河东燕代九郡，其后又东伐女直，契丹统治的地域已是“尽有奚、霫之地，东际海，南暨白檀，西踰松漠，北抵潢水”(《辽史》卷一)。唐天祐四年(907年)，阿保机取代遥辇氏担任部落大人，开始着手建立国家政权，首先平定以皇弟刺葛为首的三次叛乱，又以“盐池之会”杀掉其他部落首领。神册元年(916年)，阿保机在龙化州即皇帝位，建立了辽朝，自称为“大圣大明天皇帝”，确定了皇权世袭的国家体制。阿保机建立国家之后，采取了一系列完善国家体制的政治、军事、经济措施。首先，在公元918年，命礼部尚书康默记充当版筑使，在大兴安岭东南麓风水秀美之处选址营建都城(赤峰市巴林左旗林

东镇南)，史载“负山抱海，天险足以为固”，此为辽上京的前身。阿保机在兴建皇都辽上京的同时，创制文字，制定完善的法律，在上京道、东京道建立投下州城，实行“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两重政治体制。有辽一代，中国北方得到了空前的大统一，契丹南并奚族燕云，东兼渤海，北吞室韦、阻卜，西属回鹘，建成了“五京六府”、“州军城百五十有五，县二百有九，部族五十有二，属国六十”(《辽史》卷三七)的泱泱大国。

公元926年，耶律阿保机远征渤海途病逝于扶余城，其妻述律平称制，当年营建辽太祖陵(赤峰巴林左旗石房子村北)，阿保机去世时陵墓尚未建成，尸体运至陵墓外的祖州保存，在祖州城西北角至今矗立在地表巨大的神秘石室即是耶律阿保机尸体的临时存放地。公元927年陵墓建成，辽太祖阿保机入葬陵园。其后附葬辽太祖陵园的还有因谋反被囚禁于祖州的皇太子李胡和被人诬陷溢杀以“庶人礼”葬在白马山下的斋天皇后等。

阿保机入葬祖陵当年十一月，耶律德光即位，此为辽太宗。944年，辽太宗耶律德光率军南下灭后晋。当年四月在今河北栾城杀孤林病逝，其后尸体被制作成干尸，北运回辽国本土，有史书称“国人剖其腹，实以盐数斗，载之北去”(《契丹国志》卷三)。辽太宗耶律德光尸体运回辽上京地区后第二年葬于怀陵(今赤峰市巴林左旗岗根苏木)。葬在怀陵的辽代皇帝还有辽穆宗皇帝。公元969年二月，因辽穆宗为政暴戾，被厨人等弑杀于黑山(赤峰巴林右旗巴音罕山)，也入葬在辽怀陵。

辽穆宗死后，景宗耶律贤被推举为帝。公元982年，辽景宗驾崩，辽圣宗继位，因圣宗幼小，萧绰皇后摄政。萧绰摄政二十七年间，励精图治，注重农桑，减少赋税，整顿吏治，重用贤臣韩德让、室昉、郭袭等，使辽国国势强盛。公元1004年(统和二十二年)萧太后与圣宗亲率大军深入宋境，俘获号称“杨无敌”的宋朝名将杨继业。公元1005年，在澶州(今河南濮阳)议和，与宋朝订立“澶渊之盟”，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繁盛。辽圣宗时期，在奚族本土靠近中原的地方兴建辽中京城(今为赤峰市宁城县铁匠营子村)，作为辽国的又一政治中心。辽太平十一年(1031年)6月辽圣宗驾崩，葬于庆陵(今赤峰市巴林右旗索布力嘎村)。辽兴宗时期，辽国兴兵黩武，多次征伐西夏，逼迫宋朝多交纳岁币，辽兴宗还迷信佛教，国内矛盾逐渐尖锐，辽重熙二十三

年(1055年)8月，辽兴宗驾崩，谥孝章皇帝，葬于庆陵。其后，辽兴宗的长子辽道宗耶律洪基即位，为辽国第八位皇帝，在位47年。辽道宗重用耶律重元等奸佞，导致“滦河之乱”发生。他笃信佛教，在位期间曾大修佛寺佛塔。公元1101年，道宗去世，也葬在庆陵。在辽代附葬在庆陵的还有辽兴宗的生母钦哀皇后萧耨斤、仁德皇后萧菩萨哥、仁懿皇后萧挹里、宣懿皇后萧观音等。

二 辽代都城与皇陵的具体情况

辽上京城始建于神册三年(918年)，号“临潢府”，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林东镇南(图1)。城址由皇城和汉城两部分组成。平面略呈日字形，城墙夯筑，周长10597米，残高5~9米。皇城位于北部，是契丹统治者居住区域，也是初筑的皇都。东、西、北三墙中部残存有门址，并加筑瓮城，各墙上残存有马面。西墙内的山岗顶部，有一组东向的建筑址，应是早期的宫殿遗迹。建筑基址下有一大道直向东门，推测皇城最初是以东门为正门。扩建汉城后，城内主要建筑都改成南向，皇城南门改为正门。大内位于皇城中央部位，墙墙基已残毁，为长方形，周长约2000米。内有宫殿、门阙、仓库等建筑基址，其中有两座大型宫殿，建筑在高约4米的台基上。皇城南部有不规整的街道及官署、府第、作坊和寺院基址，其中一座寺院内残存一躯残高4.2米的石刻菩萨像，为天雄寺遗址。皇城北部地区未发现建筑基址，应是文献所载契丹贵族搭设毡帐的地带。

汉城位于南部，是汉、渤海、回鹘等族居住区域，其北墙即皇城南墙，东、南、西3墙为扩筑。墙身较皇城低窄，残墙最高3米，无马面，现已无法探明原有6座城门的具体位置。

在上京城址附近还现存砖塔两座。一座位于城址东南约3公里的山坡上，俗称南塔，为八角密檐式，残高约25米，尚存7层塔身及塔基。塔东南约50米处有辽代开悟寺遗址，此塔当是开悟寺塔。另一座位于城址北约1.5公里，俗称北塔，为六角密檐式，仅存5层塔身，残高约6米，传为辽代宝积寺塔。辽上京作为辽之都城历经204年。1120年金兵攻占上京。金时将上京改为北京临潢路，至元代上京逐渐废弃。

辽中京城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大明镇铁匠营乡。此城建在老哈河冲积平原上，北有七金山(今九头山)，西眺



图 1 辽上京城遗址

马孟山，南濒老哈河。辽圣宗统和二十一年（1003 年）开始营建，统和二十五年基本建成，并在此设立了大定府。辽中京的城市布局仿照北宋汴京开封的城市建制，有外城、内城和皇城三重。皇城呈正方形，每边长 1000 米，居于内城中北部，以内城北墙为皇城北墙。皇城居住契丹贵族。当时，皇城内建有祖庙、景宗承天皇后御容殿、文化殿、武功殿、会安殿、昭庆殿等大型建筑，造型优美，气势宏大。内城在外城的中部偏北，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 2000 米，南北宽 1500 米。从南墙正中的阳德门到宫城南门阊阖门，有一条宽约 40 米的大道。外城平面呈长方形，东西宽 4200 米，南北长 3500 米。南墙正中为朱夏门遗址，筑有瓮城，四角有角楼遗址。外城南部按文献记载为汉族聚居区域，街道整齐，自朱夏门至内城南门间，有一条宽 64 米的中央大道。大道两侧各有对称的坊区 4 个。坊区北面至内城南门间的大道两侧，各有长约 250 米的廊舍遗址，应为市易交换的场所。此外尚有官署、驿馆、寺院等遗迹。在外城南部的东北角，保存有一座密檐式的砖塔，这就是著名的大明塔（图 2）。大明塔筑于高约 6 米的夯土台基上，八角十三层砖砌密檐式，高 80.22 米，塔基底径 48.6 米，塔体直径 34 米，在现存辽塔中为最大。塔座为须弥座，上部砌出仰莲瓣。塔身

第一层每面嵌镶浮雕造像，正中镶成起券佛龕，龕内莲座上趺坐佛像，姿势各不相同，佛像两侧为菩萨、力士像，塑像之上砌出华盖，两侧上方各有飞天一对。在该塔的西南方另有一塔，高 24 米，俗称“小塔”，也是八角十三层密檐，可能是辽代末年的建筑。

祖陵位于赤峰市巴林左旗哈达英格乡石房子村西北 2 公里山谷中（图 3），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太子李胡及贞烈皇太后、斋天太后陵寝。祖陵由陵园、记功碑和奉陵邑三大部分组成。陵园为一袋状山谷，四周群山环抱，山谷出口处有两座巍然耸立的岩峰如巨龙昂首，东西对称，形成天然山门。这就是《辽史》中记载的“黑龙门”。龙门两侧有凸起的土堆，应是门楼基址。在山谷西北山脚下，靠山有一巨大的圆形土丘，系人工而成，应为“凿山为殿”的陵墓。陵墓前有享殿遗址，残存有石翁仲及经幢等遗物。另外，在陵墓的西侧山坡上，有一座大型的陪葬墓，与太祖陵墓仅一岭之隔。墓道东南向，由墓道、甬道、前室、中室、后室和两个耳室组成，全长近 50 米。

陵园黑龙门外东南一处山丘顶部为辽太祖阿保机记功楼遗址，遗址现存一石龟趺。经考古发掘清理，发现了大量带有契丹文、汉文的石碑残片，从石碑用料的形状和字体上看，



图 2 辽大明塔



图 3 辽祖陵陵园

这应当是立在龟趺上石碑，前面为契丹大字，后面为汉文楷书。残碑上书写有“天赞五年”“升天皇帝”等字样，还有与刘守文会盟北淖口、征渤海国等内容。从这些内容上断定，此碑就是《辽史》中记载的“辽太祖纪功碑”。

在辽太祖纪功碑遗址东南山坡下有一城址，这就是专门奉祀祖陵的城址祖州城（图 4）。祖州城墙全是用土夯筑的，

全城由外城、内城两重城组成。外城平面呈不等边的五角形，东墙长 285 米，在中部开设城门，因其直对着上京城，所以名之“望京门”。南墙长 570 米，在中部内折成为折背形，在中部开设城门，名叫“大夏门”。西墙长 295 米，中部开设城门，名叫“液山门”，并加筑有瓮城。北墙长 600 米，在东段开设城门，名叫“兴国门”，并加筑有瓮城。内城位于全城的后半部，城墙东西宽 295 米，南北长 145 米，东墙正中开设一城门，名曰“兴圣门”。祖州城城内的建筑以祭祀用的殿堂为主体，外城为官署、膳房、作坊及守护官军住所，城外为守陵户等和百姓的住所。内城分布有城门、祭殿、享堂、石室等主体建筑。在内城的南面区域内，有一座造型奇特的建筑物，这就是著名的祖州石室。石室建在一处长方形的高大台基上，用 7 块完整的花岗岩石板拼组而成，石板厚约 60 厘米，前面用两块石板组成门阙，左、右、后三墙各竖立一块，顶上平铺一块，室内靠后部再平铺一块。这座平顶的长方形石室，长 6.7、宽 4.8、高 3.5 米。石室建在祖州城的西北角，与其他区域隔开，使人感到神圣肃穆。另外，在祖陵陵园外围还分布有与契丹族祖源传说有密切关联的祖山、木叶山和白马山，与祖州城、祖陵陵园共同构成了契丹族起源、建国与立业等一系列地标性质的精神圣地。

辽怀陵亦称“凤山陵”，系辽太宗耶律德光、辽穆宗耶律璟的陵寝，现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岗根苏木北 6 华里的床金沟山谷中（图 5），陵寝周围地貌亦属于环状的袋形山谷，山谷中有一横穿的石墙，将山谷分为内外两个陵区，内区属于陵寝所在，外区属于祭殿建筑区域。在山谷内区靠北的山峰下有一宽阔的台地，为陵寝所在地。陵区周围袋状的山峰顶部都建筑有围墙，形成一个完整的封闭性的环境。陵墓位于袋状山谷坐北朝南的山峰下，依山为陵，地表封土直径达 32 米，存高 6 米左右，在陵墓的西南有一大型的享殿基址，地表散布有石柱础及其他方砖等建筑构件。另一座陵墓在另一座山峰下，地宫塌陷，形成一直径 30 米的大坑，属于早期被盗掘。

辽庆陵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索博力嘎苏木北约 15 公里处。陵墓分列在大兴安岭林区中一条东西横亘的大山南麓的山地狭谷中（图 6），这座大山如一道屏障呈东西向横亘，在山麓的南坡有三个山峰，怪石嶙峋，直插云天，该山辽代名“永安山”，后改称“庆云山”，庆陵之名也因此而来。根据《辽史·地理志》记载，辽代第六代皇帝辽圣宗



图 4 辽祖州城

耶律隆绪经过庆云山时说,他死后应当埋葬于此。于是此后,辽代三代皇帝均葬在这里。这三座皇陵由东向西一字排开,分别是辽圣宗耶律隆绪及钦哀皇后、仁德皇后的“永庆陵”,辽兴宗耶律宗及仁懿皇后的“永兴陵”、辽道宗耶律洪基和宣懿皇后的“永福陵”,三陵各相距约 2 公里,因这三座陵墓自东向西排列,按位置人们又称为东陵、中陵、西陵。由于三座帝陵共处一个陵区,通称三陵为辽庆陵。

辽圣宗永庆陵位于庆云山半山腰处,现陵区内地表尚可见到享堂、祭殿、羨道、陵门等遗迹,是三座陵墓中保存最好的一座。永庆陵为仿木结构的七室砖墓,墓内全长 21.2 米,最宽 15.5 米,最高约 6.5 米,分前、中、后三正室,前室中室都有东西耳室,后室为主室,内有柏木组建的巨大槨室,各室间有通道相连,安有柏木大门,门楼用雕砖砌成,瓦垄起伏、鸱吻高翘,通体彩绘。墓壁绘有精美壁画,墓内出土物石制哀册等遗物。辽兴宗永兴陵位于永庆陵之西 0.6 公里,现存神道、陵门、祭殿、膳堂等遗址,共七个墓室,前、中、后三个正室,四个侧室,以后室为主室,墓室前为十字形甬道。中陵已塌毁,仅看出各室平面是八角形,曾出土过兴宗和仁懿恣皇后哀册,在中陵享殿的西南方残存石刻陀罗尼经幢 1 座。永福陵即西陵,位于永兴陵之西 1.4 公里处,陵园建筑与东陵相同,现存神道、陵门和祭殿遗址,墓室形同中陵,也是七室墓,墓室前为十字形通道,各室平面呈八角形,

规模大于中陵。墓内有壁画残存,曾出土过道宗、宣懿皇后契丹文、汉文哀册等文物。

三陵全部为砖木结构,墓内都绘有精美壁画,以东陵最为典型,现存有摹本、照片,并保存较完好。壁画主要在墓内砖砌仿木结构细部及墓壁上方,用工笔彩绘龙凤、花鸟、祥云、宝珠以及网格状图案,在墓道、前室及其东西侧室、中室和各甬道壁面上,绘有与真人等大的人物图像 70 余个,墓道两壁为 15 个戴圆帽、穿圆领窄袖长衫、执骨朵的仪卫和 1 匹备有鞍辔的马,前室南甬道与中室南甬道绘有同样的仪卫。另外在永庆陵中室有四幅巨大的山水画(图 7),清新淡雅,画技高超,描绘了辽朝腹地的春、夏、秋、冬四季风光,即闻名于世的四季山水图,十分珍贵。

三 辽代都城与皇陵的突出普遍价值

辽上京城是契丹民族立国之后在中国北方草原地带建立的第一座都城,是辽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辽祖陵、辽怀陵、辽庆陵是契丹皇帝的陵寝,埋葬有辽代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辽太宗耶律德光等七位帝王。这种特殊的历史文化内涵决定了辽代都城与皇陵所特有的突出普遍价值。

首先,辽代都城与皇陵是辽朝政治、经济、文化及科技高度发达的产物,都城与皇陵规模宏大,保存完整,堪称辽代皇家陵园博物馆,是中国乃至世界见证了契丹民族历史发



图 5 辽怀陵陵园

展与文明进程的物质文化遗存。辽上京城由皇城、汉城两部分组成,城垣总面积达 504 万平方米。如果加上南北二塔佛教寺院及渤海小城等重要建筑遗迹,城址总面积近 10 平方公里,城址内宫殿、官署、寺庙、作坊、道路、城门、城墙等建筑遗迹保存完好,“大内”“龙眉宫”等大型建筑基址凸显于地表,天雄寺石制菩萨观音像、宝积寺塔(北塔)、开悟寺塔(南塔)至今伫立在原址,构成了辽上京城址非常完整的遗产景观。辽中京由皇城、内城和外城三重城垣构成,城内建筑遗迹亦保存完好,在外城城址内现保存两座完好的密檐式的砖塔,八角十三层砖砌密檐式“大明塔”。可谓辽代最高的密檐式砖塔。辽代皇陵在内蒙古地区保存有祖陵、怀陵、庆陵三处,埋葬有辽代七位帝王,还附葬有多位皇后、太子、大臣,组成了规模庞大陵墓群。辽代皇帝陵园多选择环境优美呈封闭状的袋状山谷,除主体陵墓外,还附建有享堂、祭殿及守灵之州城,构成了宏大而又庞杂的陵寝建筑体系。在辽代的皇陵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辽祖陵。陵园是几乎全封闭状的袋形山谷,谷口正对一高大的山峰,即契丹之圣山“木叶山”,谷口外侧西南一线分布有辽太祖记功碑和奉陵邑祖州城等重要祭祀设施,构成了契丹民族“祖灵”“祖山”“祖源”等精神崇拜的标志性实物。这是辽代契丹族陵寝制度的又一大特色。综上所述,辽代都城与皇陵,可以说是中国北方草原地带最为庞大而又独特的文化遗产景观,彰显着契丹民族曾经拥有过的辉煌历史与灿烂的文化。

其次,辽代的都城与皇陵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契丹民族对中国东北、西北的开发建设,特别是首都、州县一系列



图 6 辽庆陵陵园

城市建设,在地域上的空前大统一,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也为南北、东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先决的条件。有辽一代,草原文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与繁荣,辽代都城与皇陵的营建,是其辉煌历史文化的实物见证。上京都皇城与汉城二城相连的“日”字形建制,是契丹统治者“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因俗而治”治国方略的真实反映,“分而治之”的统治理念体现了契丹高度发达的政治文化。“因山为陵”“陵邑结合”的皇陵营造体系,是契丹民族对汉唐陵寝制度的传承与发展。辽代皇陵与贵族墓葬中多出土有石刻哀册(墓志)。仅庆陵三陵就出土哀册 15 方,主要是圣宗、仁德皇后、钦爱皇后、道宗、宣懿皇后的陵寝所属。这些哀册分别镌刻有契丹、汉两种文字,每方近 2000 字,其中汉字书写刚健道丽,工整含蓄,堪称辽代书法精品。部分哀册用契丹文字对译书写,这些契丹文字哀册,是发现最早的契丹文字资料,为进一步研究辽代的历史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另外,契丹文学与绘画在当时也非常发达。耶律阿保机长子东丹王耶律倍就是著名画家,擅画“本国人物”,流传有《骑射图》《射鹿图》《番骑图》至今。辽代墓葬中多画有珍贵壁画,至今发现的辽代壁画近万平方米,仅庆陵三座陵墓壁画就达千余平方米,其中以“南北面官图”“四季山水图”“仪仗图”最具代表性,其他辽墓壁画有“出行图”“狩猎图”“创厨图”“西瓜图”等,这些壁画构图严谨,形象生动,是契丹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场景的真实写照,开创了中国写实主义画派的先河,是极为罕见而又珍贵的辽代艺术珍品。



图7 辽东陵壁画“春山秋水图”

再次，辽代都城与皇陵具有重要的科学技术价值。辽代有“京五、府六，州军城百五十六”（《辽史》卷三七），辽上京城的营建，是中国北方草原地带大规模城市建设的开始。以上京城为中心，辽代在中国北方还建有辽中京、东京、南京、西京四个陪都，还建有奉陵邑、头下州等其他中小城镇，辽代城镇总数达 560 多座，构成了中国北方完整的城市网络，标志着草原地带文明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城市是一个时期、一个地区文明的标志，科技含量丰富。辽代都城城市功能完备，城墙、马面、角楼等防御设施齐全，宫殿、街道、廊坊、市肆、民居布局合理，错落有致。辽上京按功能分皇城与汉城二城相连布局，辽中京城三城环环相套，皇城居中，这种城市布局，体现了城市建筑者高超的设计理念。辽代皇陵建筑宏伟高大，多凿山为穴，墓室多间相连，穹隆式拱顶，体现了契丹人卓越的建筑技术水准。另外，在辽代都城与皇陵中埋藏文物丰富，以金银器、玉器和瓷器出土为多。辽代金银器器类丰富，锤碟、錾刻工艺成型，以陈国公主墓出土的金面具、鎏金双翅帽、鎏金银靴为典型，工艺之精，造型之美，堪称一绝。辽代玉器种类繁多，琥珀璆珞、琥珀握手、鸳鸯玉佩、双鱼粉盒等饰件，雕琢工艺繁缛，做工精巧。辽代瓷器也非常具有民族特色，仿皮囊提梁壶、双耳穿带壶、鸡冠

壶等都是辽代瓷器的精品，辽代三彩器也非常著名，六方砚台、壶、凤首瓶等器物都能与唐三彩相为媲美，标志着辽代发达的手工业生产技术。

总之，辽代都城与皇陵是契丹民族辉煌历史的实物见证，同时也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极为珍贵的物质文化遗产。契丹人建立的辽王朝，将存在于中国北方农耕与游牧两大经济形态完美地结合与统一，结束了中国北方诸民族长期对抗纷争的无序状态，奠定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历史根基。契丹人所创造的辽文化是举世瞩目的，两重的政治体制所孕育出的民族文化，造就了契丹社会多元汇聚的文化内涵与南北文化的再造与升华，奠定了我国古代北方各民族万风而归于一元的文化基础。自辽朝以后，“契丹”一词风靡于世界，西欧文献“契丹”就写成 Khitay。当时中亚地区各国“无闻中国有北宋，只知契丹即中国”，可见影响之大。“万国河山有燕赵，百年风气尚辽金”，“涿州沙土饮盘桓，看舞春风小契丹”，契丹民族在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大舞台上所展示的民族风采是异常醒目的，从“华夷同风”之绝唱，再到“我本丹东八叶花”的豪叹，无不证实契丹人所创造的辽文化，早已深深地融入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之中。

内蒙古多伦县 辽代贵族墓葬发掘

盖之庸·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图1 多伦县辽代墓地全景

2015 年 6 月～ 12 月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锡林郭勒盟文物站、多伦县文物局对锡林郭勒盟多伦县蔡木山乡铁公泡子村小王力沟辽代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清理辽代大型墓葬两座（编号 M1、M2），取得了重大收获。

两座墓葬位于一个东、西、北三面环山的巨大簸箕形山谷中，山谷中部有一山梁，将其分隔成高低错落的两个簸箕形山洼，北面山势高峻，向南渐开阔，并形成缓坡，两座墓葬就分别坐落在这两个山洼的缓坡上。山洼向南有

几座小山与此相望，下有一河穿绕中间，名吐力根河（吐力根，蒙古语，迅急之意），属典型的辽代贵族墓地（图 1）。

M1(坐标:北纬 42° 18′, 东经 116° 41′,方向 150°)由墓道、墓门、过洞、甬道、墓室几部分组成，全长 25.6 米。其中墓道总长 19.8 米、宽 1.5~4.6 米，呈长方形斜坡阶梯状，前为土质斜坡，后接砖砌台阶，阶梯计 11 级，每阶高 18 厘米、宽 28~34 厘米，共长 210 厘米；墓门木质，拱形，上为仿木结构，并用砖砌出五个斗拱，斗拱以墨勾勒轮廓，



图2 M1主室



图3 铜渣斗

内填朱、黄等彩，斗拱的间隔处又以朱、墨、褐等彩勾勒出三朵阔叶团花图案，皆色彩艳丽，手法细腻，斗拱上方承绿色琉璃瓦当，当头呈黄色并饰以狮纹图案。用琉璃瓦加饰墓门，是辽代考古发现中所罕见的，也反映了墓葬的高规格。整个墓门显得富丽堂皇；过洞长1.75米、宽2.1米、残高3米，过洞与甬道又以木门相隔（木门残朽，仅见部分遗迹）；甬道平面呈长方形，长2.6米、宽2.1米；墓室砖砌圆形，直径4.80~5.22米，并以墓椁为饰，椁室由方木搭建的八角形结构，顶部已无存，墓室底部方砖铺地，方砖磨光，铺砌平整，并用红、白两彩绘制璧形图案，内以朱彩勾勒莲瓣花纹，色彩华丽。在地面上装饰花纹彩绘，为以往辽墓发掘所仅见（图2）。

墓葬多经盗扰，墓主人尸骨无存，位于墓室北部，现



图4 三节莲花形铜烛台

存一木质棺箱，箱盖四边用青铜包裹，并饰以铜泡，角部装饰如意纹，箱底部四角也用青铜包裹，制作考究，其内殉牲一完整马匹。

该墓虽经多次盗扰，但仍出土了大量的随葬遗物，主要有铜、铁、瓷、琥珀、银等几大类，其中鎏金铜渣斗（图3）、三节莲花形烛台（图4）皆为铸造，造型精美，为不可多得的辽代文物精品。随葬马具由于盗扰原因，大多已无存，但仍出土了许多精美的马具构件，其中双龙纹银鎏金马具饰片为其代表。

另外出土了大量的随葬瓷器，以影青瓷为主，纹饰华丽，胎质细腻，器型主要为瓶、罐等。还出土有定窑白瓷，釉色光洁，器型以碗、盘为主。

M2（坐标：北纬42°18′，东经116°41′，方向1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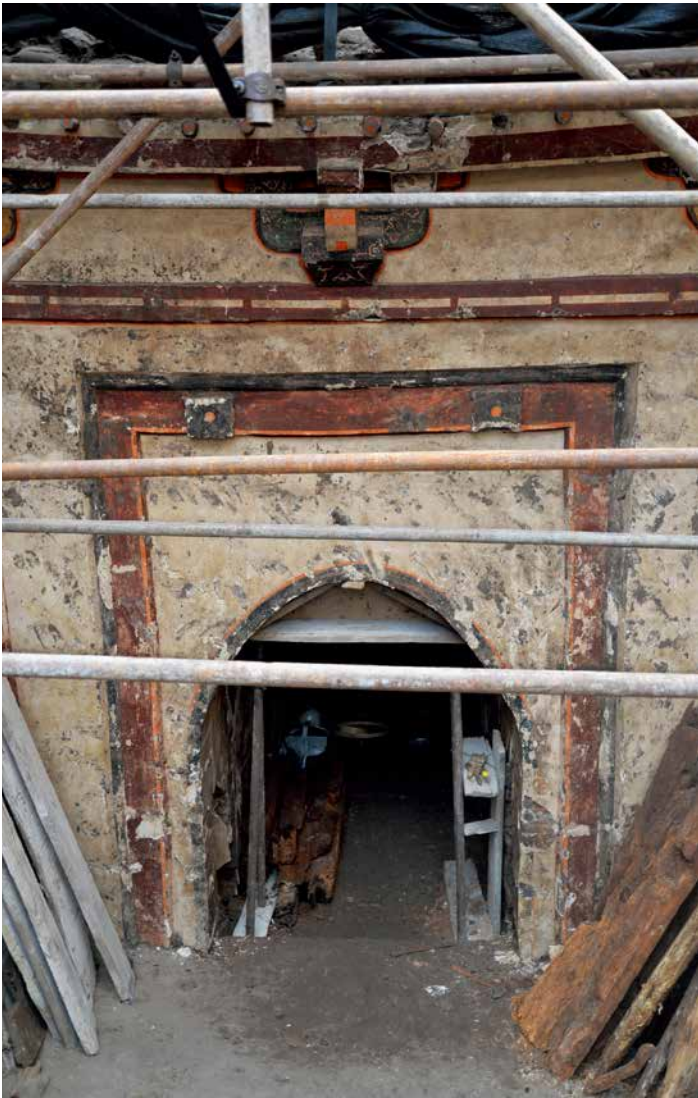


图5 M2墓门

由墓道、前庭、仿木结构墓门、过洞、甬道、主墓室组成。墓道呈斜坡式，长23米、宽2~7米；前庭青砖垒成，长15米、宽4~5.1米、深11米；墓门为砖券拱形，上承斗拱等仿木结构，并用红、褐、蓝、白等彩勾勒轮廓图案，唐风浓郁（图5）；甬道平面略呈长方形，砖券拱顶，北接圆形墓室；主室平面呈圆形，直径3.92~4.28米，青砖砌制，并用木椁为饰，穹隆顶。墓葬全长40余米，最深处11米。

位于墓室北部，砖砌尸床，尸床正面砌出七朵莲瓣图形，其内涂彩，棺床上放置一髹漆木棺，木棺以柏木制成，材质厚重，上髹黑褐色漆，头西脚东（图6）。棺内还随葬有一银片团窠对蝶纹髹漆木枕（图7），木棺周围饰以木帐，棺床东部殉牲犬一只。

该墓虽近期被盗，但由于墓室椁木等坍塌，将随葬品掩盖，



图6 M2棺（俯拍）



图7 银片团窠对蝶纹髹漆木枕

因此仍出土了金、银、铜、铁、玉、琥珀、玻璃、木、泥、丝绸等大量文物。其中鎏金镂花凤纹高复翅银冠（图8），金花银镂花凤纹高勒靴（图9）、银鎏金鞞嵌龙纹玉钭捍腰（图10），玛瑙柄银鎏金龙纹鞘短刀（图11）、银丝链玉组佩（图12）、金垂饰（图13），与辽陈国公主墓出土遗物相似，但制作更为考究，工艺也更臻完美，属辽代文物之珍。

墓葬中还清理出铜镜两只，其中一只为八角菱花镜，圆钮，周围环绕几只凤鸟，造型生动，为墓主人生前的实用镜（图14）。另一只为圆镜，亦饰多只鸾鸟，为墓葬顶部悬镜（图15），两只铜镜皆为辽代铜镜的精品之作。

墓葬出土瓷器为大宗，以定窑白瓷、越窑青瓷为主，间有影青瓷，所出土瓷器最大的特点是器口、足多包金饰，且加有金、银盖，是辽代钹器出土最为集中的一次，反映出



图8 鎏金镂花凤纹高复翅银冠



图9 金花银镂花凤纹高勒靴



图10 银鎏金程嵌龙纹玉铸捍腰



图11 玛瑙柄银鎏金龙纹鞘短刀

辽代宫廷用瓷气派。其中“官”字款白釉刻莲瓣纹罐（图16）、白釉银盖葫芦瓶（图17）、青釉刻划鹦鹉纹银钫注壶（图18）、青釉银钫花口盏托（图19）等，胎质细腻，釉色明亮，纹饰华丽、生动，反映出了当时制瓷工艺的最高水平。还出土了五件玻璃器，玻璃器呈绿（图20）、蓝（图21）、褐等色，器型主要有瓶、执壶等，器形较大，据质地分析应为伊斯兰玻璃，为草原丝绸之路的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特别是墓葬中还发现墓志一盒（图22），墓志为汉白玉质，略呈方形，边长89厘米。志盖盪顶，四周围绕十二生肖人物，人物面部丰腴，神态传神，颇具唐风。中部阴刻篆书“故贵妃萧氏玄堂志铭”几字；志石阴刻正书，首行撰“大契丹故贵妃兰陵萧氏玄堂志铭并序”，其上详细记载了墓主人的生平、身世等情况，洋溢千余言。

这两座墓葬的发掘意义重大，对辽代历史的研究必将

起到推动作用，甚至可以说填补了辽代历史研究的某些空白，取得了重要收获，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 关于墓葬年代、形制

M1 东北距 M2 约 200 米，坐落于同一簸箕形山谷，M1 墓主人应与 M2 墓主人辽代贵妃属一个家族。M1 没有纪年随葬品出土，但其墓门装饰和墓室形制等与大康二年（1076 年）关山八号辽墓（萧德让与魏国公主合葬墓）^[1]，豪欠营子六号墓^[2]，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祺墓^[3] 等颇为接近，带有较为鲜明的辽代中、晚期墓葬特征，研究者一般认为多角形辽墓是从辽兴宗以后开始大量出现的，M1 据墓葬形制可初步判断应属于辽代中、晚期墓葬，最有可能处于辽兴宗中、晚期至道宗晚期。

M1 墓葬规模宏大，墓门用琉璃瓦装饰，主室地面也加饰彩绘，这在以往辽墓发掘中是罕见的，该墓虽经多次



图12 银丝链玉组佩



图13 金垂饰



图14 蝶鸟莲枝八角菱花镜



图15 鸾鸟纹铜镜



图 16 白釉刻莲瓣纹罐



图 17 白釉银盖葫芦瓶

盗扰，但仍出土了许多高规格的随葬品，因此墓主人也应为贵妃重要的家族成员。

M2 墓主人为辽圣宗贵妃,是辽代贵妃墓葬的首次发现。据墓志记载为辽统和十一年（993 年）的墓葬,属辽代中期,与稍晚的开泰七年(1018 年)陈国公主墓^[4]、重熙十五(1046 年) 年秦晋国大长公主墓^[5] 圆形墓室形制较为一致，符合辽代中期墓葬特征。但其墓门装饰风格简约、大气，受唐墓影响成分增多。其墓道以北部分的东、西两壁都用青砖干垒护壁，护壁部分长 7 米、深达 11 米，长而深的墓道护壁墙反映了墓葬的高规格，也是为了克服墓葬深埋而当地土质为黄沙土，直立性差的无奈之举。M2 的长墓道和深埋是其特点。

M2 葬具使用了木制围榻，是中原贵族常用的葬具，

虽经盗扰，围榻准确形制已扰乱不清，但围榻存在是可以确定的。类似的葬具在辽墓中鲜有发现。

二 关于随葬品

M1 多经盗扰，随葬品数量、位置不详，在扰土里发现了大量的瓷片，这些瓷片多为影青瓷片，少有定窑白瓷，间有越窑青瓷，这也符合辽代中、晚期墓葬随葬瓷器的特征，辽代贵族墓葬随葬瓷器的大致规律是,早期墓葬以定窑、越窑瓷器为主，间有邢窑、耀州窑瓷器。中期定窑、越窑瓷器依然占主导地位，影青瓷器开始出现，至中、晚期影青瓷器开始大量出现，占比超过定、越窑瓷器。

M1 东壁下出土了两件铜器，由于扰土覆盖，应为原位放置，未经扰动，而金、银器皿没有发现，虽然不排除金、

银器被盗出的可能，但铜渣斗等也皆为铜制，这可能与辽兴宗重熙十一年十二月丁卯“禁丧葬杀牛马及藏珍宝”^[6] 的诏令有关，然而 M1 墓中有随葬马匹，可见诏令未能完全实施。

M2 出土了大量随葬品，其中冠、靴等与陈国公主墓出土的随葬品较为接近，但做工更为考究，其中高翅冠，M2 出土的为复翅，而陈国公主为单翅，有当时贵妃与公主生前所戴头冠即效此样式的可能。贵金属冠、靴是辽中期大贵族敛具的组合，但 M2 的随葬品未见面具与网络，这可能于殓葬方式不同有关，M2 墓主人用木棺殓葬，而一般用面具与网络随葬的多不用棺，面具与网络似起到与棺同等的作用。

M2 出土了大量瓷器，以定窑与越窑瓷器为主，这批瓷器的最大特点是口、足部分多加金、银包饰，是辽代钗器最为集中的一次出土。与几乎同时期且墓主人身份相似的陈国公主墓出土随葬品相比，金银器明显减少，且制作

也较为简单，M2 出土的这些加金、银饰口、足，且多加银盖，纹饰也多仿金银器的瓷器，似乎有象征金、银器的作用。《辽史·圣宗本纪》：统和十年春正月“丁酉，禁丧葬礼杀马，及藏甲冑、金银器玩”。此诏令与辽、宋当时正发生战争，经济明显困难的时局有关，而墓主人下葬在此诏令颁布的第二年，即统和十一年，因此金银器使用减少，也属正常。

M2 出土瓷器器型精美，纹饰华丽，其中定窑瓷器多有“官”字款，越窑瓷器也见此款，有些瓷器有五代时期瓷器的特征，有的瓷器由于损坏还加铜补，这些可能是辽代早期宫廷中传承下来的瓷器。其中金钗口执壶、竖耳青瓷钵等多件瓷器具有唐代越窑秘色瓷器的特征，应为秘色瓷。

M2 还出土了 4 件玻璃器和 3 件铜盆，玻璃器属于典型的伊斯兰玻璃，产地应为今哈萨克斯坦附近。铜盆的纹饰也极具西亚地区的铜器特征，应为舶来品，这些随葬品的出土说明辽中期草原丝绸之路的畅通和辽与中亚、西亚地区的文化、物质交流在当时是充分的。

三 关于贵妃及其家世

墓志记载，M2 墓主人为辽圣宗贵妃。关于墓主人,《辽史》记载相当简略,贵妃墓志的出土,揭示了大量相关史实,为我们研究辽代后族家族关系等方面，提供了重要史料。

《辽史·公主表》载：“圣宗十四女，贵妃生一女，燕哥第一，封隋国公主，进封秦国。兴宗封宋国长公主，下嫁萧匹里。”此贵妃，即应为墓主人，这也是史料对墓主人唯一的记载。

据墓志记载贵妃之父名萧宁，官至归德军节度使，同政事门下平章事，尚魏国公主。萧宁，名见《辽史·地理志》，其中载：“福州，国舅萧宁建。南征俘略汉民，居北安平县故地”。又检《辽史·公主表》知魏国公主为辽景宗与承天皇后次女长寿女,《辽史·公主表》载：“长寿女，第二。封吴国公主。统和初，进封卫国公主，改封魏国长公主，下嫁萧排押”。萧排押与萧宁，所历职署亦同，故为一人，萧排押为契丹名，宁为汉名。关于萧排押,《辽史》有传,称萧排押,字韩隐,尚卫国公主,后封懿王。在《秦晋国妃墓志》中称萧排押为“曷宁”，盖“曷宁”应为萧排押,字韩隐之“韩隐”的音转,故宁、排押、曷宁俱为一



图 18 青釉刻划鸚鵡纹银钗注壶



图 19 青釉银钐花口盖托



图 20 仰莲纹玻璃杯

人。萧排押在《辽史》其传中仅记“国舅少父房之后”。《辽史·圣宗本纪三》：统和七年四月“国舅太师萧达览为子排亚请尚皇女延寿公主”（延寿公主为长寿公主之误，见《辽史·校勘记》一笔者注）。此排亚与排押为同音异译，将排押载为萧达览之子。而本墓志载贵妃祖，也即为排押之父为“祖讳信宁，燕京衙内都指挥使”。《秦晋国妃墓志》载萧排押之父为“故燕京衙内都指挥使，驸马都尉割烈”^[7]。因此信宁应与割烈为同一人，一为汉名，一为契丹名。《辽史》将排押系为萧达览之子为误，存在排押过继萧达览为子的可能。结合相关史料可知，萧排押两女，长女为墓主人，即圣宗贵妃，次女为秦晋国妃，下嫁圣宗弟秦晋国王耶律隆庆，婚姻关系俱为甥舅婚。



图 21 带流玻璃瓶

贵妃曾祖，本志载：“曾祖讳迷古德，大国舅，皮室大将军。”《秦晋国妃墓志》载为：“故迷古宁详稳讳演乌卢。”迷古德即演乌卢，二名为同一人。其中“迷古宁详稳”，研究者认为即皮室将军。另外，同出贵妃家族一系且辈分相同的萧仪，其墓志载：“曾祖讳迷古里，战高群平，职大将军。”^[8]迷古里与迷古德应为同音异译，为同一人，大将军应为皮室大将军的省称。《萧仪墓志》载：“高祖讳撒刺，授左丞相，守太傅。”撒刺据考证即应为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淳钦皇后弟阿古只，阿古只，《辽史》有传，其为辽的建立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列传最后载“子安圜，官至右皮室详稳”，详稳，据《辽史·国语解》释义即为将军，与贵妃曾祖迷古德官职相同。另外《辽史·穆宗本纪》：天禄五年“六月壬辰国舅、



图 22 萧贵妃墓志

政事令萧眉古得、宣政殿学士李澣等谋南奔，事觉，诏暴其罪……八月乙丑，眉古得、娄国等伏诛”。此国舅萧眉古得，《辽史》记载简略，不知世系所出，《辽史·后妃传》载辽世宗怀节皇后为“淳钦皇后弟阿古只之女”。而阿古只之子安圜即应为大国舅，本墓志明确记载贵妃曾祖迷古德为大国舅，因此，穆宗朝被诛杀的国舅眉古得，与贵妃曾祖迷古德也为同音异译，为同一人，即为阿古只之子安圜^[9]。另外《资治通鉴·后周纪》：“广顺二年（952年），太子宾客李涛之弟澣，在契丹为勤政殿学士，与幽州节度使萧海真善，海真，契丹主兀欲之妻弟也。”海真的事迹与萧眉古得相同，故也应为一入。综上所述，墓主人圣宗贵妃出自阿古只一系，在辽代9位皇帝中，有4位皇后出自该家族，为辽代后族最为显赫的一支。

墓志还对辽后族萧姓的来历有如下记载：“耶律汉室之宗刘氏也，世娶兰陵，周王之重姜姓也。”与《辽史·后妃传》：“太祖慕汉高皇帝，故耶律兼称刘氏，以乙室、拔里比萧相国，遂为萧氏。”的记载相符。

注 释：

- [1] 辽宁文物考古研究所：《关山辽墓》，文物出版社，2011年。
- [2] 乌盟文物站、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契丹女尸》，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
- [3] 盖之庸：《探寻失去的王朝——辽耶律羽之墓》，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4年。
- [4]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哲里木盟博物馆：《陈国公主墓》，文物出版社，1993年。
- [5] 郑绍宗：《契丹秦晋国大长公主墓志铭》，《考古》1962年第8期。
- [6] 《辽史》卷十九《兴宗本纪》。
- [7][8] 向南：《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
- [9] 《辽史》卷七十三《兴宗本纪》。

辽代契丹贵族的葬俗

万雄飞·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契丹建国以前，实行一种特殊的丧葬方式——先树葬后火葬，即把死者尸体置于深山大树之上，三年之后再收骨火化。《隋书》卷八四《北狄传》载：“其俗颇与靺鞨同……父母死而悲哭者，以为不壮，但以其尸置于山树之上，经三年后，乃收其骨而焚之。”契丹建国前夕，葬俗发生了重大变化，筑墓入殓逐渐兴盛。建国之后，国家政治制度日益完善，辽朝丧葬制度也逐渐成熟。

辽代墓葬考古发现是研究辽代丧葬制度的第一手资料，经过多年的考古工作，现已能提供比较系统的辽代墓葬资料。研究表明，契丹贵族墓葬是引领辽朝丧葬制度发展演变的先导，集中体现了辽代丧葬制度的核心内容。下面以近几十年来经过科学考古发掘的身份较重要、保存较完好的契丹大中型贵族墓地为例，总结辽代契丹贵族葬俗的特点。

一 魂归深山 聚族而葬

魂归深山，是辽代契丹人对传统葬俗的固守。如前文所述，契丹族早期实行树葬时，就把尸体置于深山之中。契丹人认为，山既是他们民族的发源地，又是灵魂归宿之所，因而对山十分崇拜。

《契丹国志》卷二七《岁时杂记》载：“冬至日，国人杀白羊、白马、白雁，各取其生血和酒，国主北望拜黑山，奠祭山神。言契丹死，魂为黑山神所管。又彼人传云，凡死人，悉属此山神所管，富民亦然。契丹黑山，如中国之岱宗。云北人死，魂皆归此山。每岁五京进人、马、纸物各万余事，祭山而焚之。其礼甚严，非祭不敢进山。”契丹人的黑山，

相当于汉人心目中的泰山，认为是灵魂归皈之所，具有崇高地位，因此契丹人死后都要葬于山中。

目前考古发现的辽代契丹族墓葬，不管是帝陵、高级贵族墓葬还是一般贵族墓葬，均位于山地，绝不见于平原或草原。辽祖陵通过系统的考古工作，确定了陵园位置和布局，祖陵陵园地处“大兴安岭南端，坐落于一个口袋形的山谷中，四面环山”^[1]。辽怀陵位于大兴安岭南端的山谷之中，当地称为床金沟^[2]。辽庆陵位于大兴安岭一条东西横亘的大山南麓^[3]，该山现名大黑山，辽代称为庆云山。辽显陵和乾陵的准确位置尚未确定，但史料明确记载，它们位于医巫闾山^[4]。近年通过考古调查，已基本确定其大体位置在医巫闾山东南麓的二道沟和三道沟地区^[5]（图1）。

契丹高级贵族墓地的发掘情况也是如此。阜新辽萧和家族墓地^[6]，位于医巫闾山东北余脉，萧和家族是辽代中晚期最显赫的后族。出土墓志称阜新关山为“黑山”。阜新辽萧仅家族墓地^[7]，位于乌兰木图山，属努鲁尔虎山余脉，萧仅家族是辽代另一个著名的后族家族，出土墓志称乌兰木图山为“页敦山”。法库叶茂台辽代墓地^[8]位于叶茂台镇叶茂台村西部的山坡上，由出土墓志可知它们是辽代北府宰相萧义的家庭墓地，现在这里称“西山”和“唐房山”，辽代名为“圣迹山”。

身份地位略低的普通契丹贵族墓地也发现于山谷坡地上。如凌源小喇嘛沟墓地^[9]，发掘了11座墓葬，没有墓志出土，推测墓主人身份多为一般契丹贵族。墓地位于一个狭长山谷中的坡地上，地属努鲁尔虎山东南麓，当地人称这个山沟为小喇嘛沟。宁城小刘杖子墓地也是一个普通契丹贵族



图1 北镇二道沟、三道沟地区

墓地^[10]，它地处燕山山脉东段北缘，老哈河南岸大山的山洼中。

聚族而葬是辽代契丹贵族对中原地区唐、五代丧葬制度的效仿。目前，经考古发现的辽代契丹贵族墓地，每个墓地埋葬的墓葬少则三、五座，多则达几十座。如果有墓志出土，证明它们同属一个家族。如阜新辽萧和家族墓地，发掘9座大型辽代墓葬，出土墓志5合，为同一家族的4代人。阜新辽萧仅家族墓地，发掘墓葬12座，出土墓志3合。墓主人分别是萧仅、萧忠和萧旻，萧仅、萧忠为亲兄弟，萧旻是萧忠之子。宁城埋王沟墓地^[11]发掘了6座墓葬，出土墓志8方，证明宁城埋王沟是辽代萧继远的家族墓地。

出土墓志的有关记载证实，契丹贵族确有“归葬先茔”的习俗。阜新关山萧德温墓志称其“祔葬于黑山之先茔”，同墓地中的萧德恭墓志称“葬于奉先军北黑山，从先茔也”。阜新萧仅墓志载“葬于先祖坟页敦山”。“先茔”“先祖坟”证明墓地是祖先埋葬之所，子孙后代祔葬于此。

二 使用金属面具和网络

契丹贵族死后入葬时，面部覆以金属面具，周身各部位

着银或铜丝网络，这是辽代契丹葬俗中最独特的地方。辽代的汉族人不用此法，我国古代其他民族中也不见此习俗。宋人文惟简的《虏庭事实》载：“（契丹）其富贵之家，人有亡者，以刃破腹，取其肠胃涤之，实以香药盐矾，五彩缝之。又以尖苇筒刺于皮肤，沥其膏血且尽，用金银为面具，铜丝络其手足。耶律德光之死，盖用此法，时人目为帝羴，信之有也。”可见，同时代的北宋人对契丹贵族的这种葬俗也很好奇，当作奇闻逸事记录下来。

辽墓考古已发现较多辽代金属敛具的资料。据不完全统计，从内蒙古辽庆陵首次发现有铜丝网络以来，目前已在30多座契丹墓内发现了金属面具和金属网络。这个数量与已发掘的辽代契丹墓葬比起来，只占很小的比例，但是辽代墓葬绝大多数都被盗掘，所以目前很难对金属敛具在当时使用的普遍程度做出准确的判断。

截至目前，考古发现的辽代金属面具年代最早的为辽中期，辽代早期金属面具的实物尚未发现。据此推测，很可能从辽代中期开始，金属面具才在契丹贵族墓葬中出现。辽代中期的金属面具，形象多为双目圆睁。这种面具出土实例较少，考古发现的有奈曼旗辽陈国公主墓^[12]出土的两件金面



图2 凌源小喇嘛沟墓地出土鎏金银面具

具、凌源小喇嘛沟1号墓出土的两件鎏金银面具（图2）和凌源小喇嘛沟11号墓出土的一件银面具。辽代晚期金属面具均为双目微闭，面带微笑。考古发掘出土的辽代金属面具绝大多数都为闭眼形象。

金属面具具有金、银鎏金、银、铜鎏金、铜等质地，金属网络也有银、铜鎏金和铜丝等多种。不同质地代表了不同的身份等级。目前发现的考古材料中，辽陈国公主墓出土的金质面具、银丝网络代表了最高等级，墓主人的身份是皇室公主和驸马。低级贵族则使用铜面具和铜丝网络，如宁城小刘杖子辽墓群，4座墓葬出土了3件铜面具和1件铜鎏金面具。

金属面具是按照墓主的真实面容打制的，有性别和年龄之分。男性面具较大，具有一种粗犷的韵味，有的镌刻胡须；女性面具相对而言面目较清丽，耳垂部多留有佩戴饰件的圆孔。如凌源小喇嘛沟1号墓出土的两件鎏金银面具，男、女像各一件，均用薄银片制成，表面鎏金，采用锤揲工艺，形成浮雕效果。男像为长圆脸，额头光洁，脸部宽平，丰满圆润，下颌饱满，浓眉，细长目，隆鼻，阔口厚唇，鼻翼两侧法令线深长，神情肃穆，不怒自威。女像额头光洁，颧骨较高，下颌尖圆，长眉浓密，细长眼，直鼻，小口，薄唇，神情沉静。

男女墓主人的性别、个性，通过面具形象一眼就可以分出来。

三 厚 葬

契丹贵族非常注重厚葬，尤其是中高级贵族，死后入葬时要随葬大量的物品，包括敛葬服饰、生活用品、生产工具和兵器、马具等，从材质上看有金银器、瓷器、铜器、铁器、玻璃器、玉石器、漆木器和皮革制品等。

厚葬造成了大量社会财富的浪费，并且滋长了奢靡之风，不利于国家长治久安和社会进步发展。辽朝的不少有识之士都意识到厚葬的危害，故而提倡薄葬，且身体力行。统和十年，汉族重臣、枢密使室昉“遗言戒厚葬”。萧惠、耶律仁先等契丹高官显贵也曾“遗命家人薄葬”。辽代朝廷多次颁令禁止墓中随葬甲冑、金银器玩。辽兴宗重熙十一年（1042年）“诏禁丧葬藏珍宝”，次年又“诏世选宰相、节度使族属及身为节度使之家，许葬用银器”。

考古发掘的几座保存完好的契丹大中型墓葬，如阿鲁科尔沁旗辽耶律羽之墓^[13]、通辽吐尔基山辽墓^[14]、法库叶茂台7号墓、辽陈国公主墓、凌源小喇嘛沟1号墓等都出土了大量随葬品。辽耶律羽之墓被盗后，收缴回精美文物共计300余件套，包括成套的大件金银器皿。吐尔基山辽墓墓主人是辽代早期与皇室有关的女萨满，出土了包括金器、银器、铜器、漆器、木器、玻璃器、丝织品等在内的200余件（组）随葬品。法库叶茂台7号墓出土了300多件珍贵随葬品，有精致的木制棺床小帐、雕花四神石棺、“官”字款瓷器、漆器、缣丝织品、双陆棋等珍贵文物，尤其是墓室内出土的两轴绢画《山弈候约图》和《竹雀双兔图》，是罕见的艺术珍品。辽陈国公主墓出土了大量精美器物，包括金器31件，银器147件，铜器50件，瓷器30件，玻璃器7件，木器及俑89件，玉石佩饰23组2315件，马具2套18副，更为难得是墓主殓葬用具、随葬物品等均为原位摆放，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极为珍贵的契丹墓葬原景。凌源小喇嘛沟1号墓的墓主人应为重要节度使一级的中高级契丹贵族，这座墓葬是辽宁省继法库叶茂台7号墓之后，又一座早年未遭盗掘的契丹中型墓，墓葬出土遗物丰富，有金银器（图3）、铜器、铁器、瓷器、玉石器和骨角器等，总计100多套约700多单件。

这些随葬品绝大多数是墓主人生前使用的实用器，只有少数是为入殓而专门制造的殓器。随葬品中价值最为昂贵是



图3 凌源小喇嘛沟墓地出土银鎏金冠饰

金银器、玉器、高档输入瓷器和玻璃器这几类，集中体现了辽代契丹贵族厚葬的风习。金银器和玉器的珍贵性自不必细说，下面着重介绍容易被忽视的高档输入瓷器和玻璃器。

输入辽朝的瓷器主要有邢窑和定窑的白瓷、越窑和耀州窑的青瓷以及景德镇窑系的青白瓷，其中以越窑青瓷尤为珍贵。晚唐五代时期的越窑青瓷被称作“秘色瓷”，是供奉朝廷的贡器，倍受人们赞赏和青睐。唐代陆龟蒙曾这样赞美越窑青瓷：“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这种高档的越窑青瓷，主要是五代吴越国贡奉馈赠给辽朝的贡品。辽代的权贵都以拥有一件越窑青瓷器为傲，北宋谢景初《观上林埧器》诗曰：“里中售高价，斗合渐收敛。持归示北人，难得曾罔念。贱用或弃扑，争乞宁有厌。”可见上林湖越窑瓷器受契丹人的珍视程度。考古发现证明，辽代越窑青瓷仅出土于高级契丹贵族或高级汉官墓葬之中，如辽耶律羽之墓、北京南郊赵德均墓^[15]、赤峰大营子驸马赠卫国王墓^[16]、北京八宝山韩佚墓^[17]、辽陈国公主墓等。阜新关山萧和家族5号墓出土了4件越窑青瓷器，执壶、温碗、盏托、器盖各1件，它们器型规整，秀美轻巧；胎色暗灰，胎壁轻薄，质地细腻；

以细线划花为装饰，线条纤巧柔和，细密华丽；釉色青翠莹润，光彩照人，是罕见的艺术珍品（图4）。



图4 阜新关山辽墓M5出土越窑青釉执壶



图5 凌源小喇嘛沟 M7 墓道内殉马

辽代契丹贵族墓葬中还有一类高档的随葬器，就是通过贡奉或贸易从遥远的中亚或地中海地区获得的伊斯兰玻璃器。它们在当时被视为稀世珍宝，其价值甚至在黄金之上，仅出土于契丹高级贵族墓葬之中。出土了玻璃器的辽代墓葬只有辽陈国公国墓、朝阳耿延毅墓^[18]、通辽吐尔基山辽墓、辽耶律羽之墓、阜新关山萧和墓、辽平原公主墓等少数几座。这些墓主人不是皇亲国戚，就是达官显宦。

四 殉 牲

殉牲是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普遍流行的丧葬习俗，契丹族也不例外。殉牲的对象一般是游牧民日常牧养的动物，如马、牛、羊等。这些动物既是游牧民族的生产对象和生活资料，也是他们的精神伴侣。殉葬这些动物，反映了牧民对它们的心理依赖和情感牵挂。

《辽史》记载，辽圣宗、兴宗分别多次颁布诏令，禁止丧葬杀牲，尤其禁止杀马，证明了辽代契丹人杀牲为殉的习俗不仅有，而且十分流行，其副作用甚至影响到社会生产和军备国防。赤峰大营子驸马赠卫国王墓墓志盖上的九行小字记载，此墓殉葬“白马一匹，骠马一匹，骠尾黑大马一十匹，小马廿一匹，牛三十五头，羊三百五十口”，殉牲数量十分惊人，确实到了需要皇帝下令禁止的地步。

辽代契丹墓葬的考古发掘中，经常可见到殉牲迹象。用

于殉葬的动物有马、牛、羊和狗，其中以羊最为普遍。一般用动物的头骨和肢骨殉葬，也有用完整动物的实例。殉牲的位置不固定，有的在墓道，有的在墓室，还有的在墓顶上的填土中。建平张家营子辽墓^[19]，墓室内有完整的羊头和角；朝阳前窗户辽墓^[20]，东耳室出土羊牙和羊下颌骨；喀左北岭4号墓^[21]，墓道中发现了马头骨和四肢骨；凌源温家屯2号辽墓^[22]，墓道内出有马头骨和四肢骨；建平炮手营子辽墓^[23]，墓道中发现一具山羊骨；法库萧袍鲁墓^[24]，东耳室出土一具完整狗骨架，墓门外出有牛骨和马牙。

殉牲葬俗表现最突出的是凌源小喇嘛沟墓地。发掘的11座墓葬中，多数有殉牲现象，发现的动物骨骼有牛、羊、马和狗。尤其是7号墓，在墓道底部殉葬一匹整马（图5）。更特殊的是，墓地北部距离墓葬不远处发现了两个单独的殉牲坑，坑内各葬一匹整马，这是前所未见的情况。1号坑位于墓地中部偏北，平面为圆角长方形，长约2.3、宽0.8、深约1.6米，四壁陡直，坑底较平，坑内放置一匹整马，头北尾南，马骨保存较完好。2号坑位于墓地东北部，平面为圆角长方形，长2.2、宽0.75、深约0.45米，四壁陡直，坑底随坡就势成斜坡状，坑内放置一具马骨，头北尾南，马骨保存较差，但位置清楚，未被扰动，怀疑为一匹整马先被肢解，然后摆放在坑内。

辽代契丹贵族墓葬除了上文总结的几个主要特点以外，

还有其他一些特征。如墓地选址注重堪輿，墓向多朝东或东南方，一般为尸骨葬等。受考古资料的公开发表和研究深入程度所限，辽代契丹贵族葬俗还有许多问题不十分清晰，有待于进一步探讨。总体而言，辽代契丹贵族墓葬的葬俗一方面受到了汉族文化的强烈影响，另一方面固守和发展了契丹民族的传统习俗，体现出辽文化开放而自信的特点。

注 释

-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代祖陵陵园遗址》,《考古》2009年第7期。
- [2] 张松柏:《辽怀州怀陵调查记》,《内蒙古文物考古》1984年第2期。
- [3] 彭善国:《辽庆陵相关问题刍议》,《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4期。
- [4] 《辽史》卷38《地理志》:“显州,奉先军。上,节度。本渤海显德府地。世宗置,以奉显陵。显陵者,东丹人皇王墓也。人皇王性好读书,不喜射猎,购书数万卷,置医巫闾山绝顶,筑堂曰望海。山南去海一百三十里。大同元年,世宗亲护人皇王灵驾归自汴京。以人皇王爱医巫闾山水奇秀,因葬焉。山形掩抱六重,于其中作影殿,制度宏丽。州在山东南,迁东京三百余户以实之。应历元年,穆宗葬世宗于显陵西山,仍禁樵采。”《武经总要》卷二二《北蕃地理》:“乾州,医巫闾山南,虜主景宗陵寝在焉。东至显州八里。”
- [5]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北镇医巫闾山辽代帝陵考古调查》,《2013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
- [6]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关山辽墓》,文物出版社,2011年。
- [7] 李宇峰、袁海波:《辽宁阜新辽萧仅墓》,《北方文物》1988年第2期;穆启文、李宇峰:《辽宁省阜新县辽萧旻墓发掘简报》,《辽金历史与考古》第二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0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阜新市文物管理办公室:《辽宁阜新梯子庙二、三号辽墓发掘简报》,《北方文物》2004年第1期;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阜新辽代平原公主墓与梯子庙4号墓》,《考古》2011年第8期。
- [8] 刘谦:《辽宁法库县叶茂台辽墓调查》,《考古通讯》1956年第3期;冯永谦、温丽和:《法库县文物志》第93页,辽宁民族出版社,1996

- 年;辽宁省博物馆、辽宁铁岭地区文物组发掘小组:《法库叶茂台辽墓记略》,《文物》1975年第12期;辽宁大学历史系考古研究室:《辽宁法库县叶茂台8、9号辽墓》,《考古》1996年第6期;温丽和:《辽宁法库县叶茂台辽肖义墓》,《考古》1989年第4期;许志国、魏春光:《法库叶茂台第22号辽墓清理简报》,《北方文物》2000年第1期。
- [9]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源小喇嘛沟辽墓》,《中国考古学年鉴》1995年。
- [10]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昭乌达盟宁城县小刘仗子辽墓发掘简报》,《文物》1961年第9期。
- [11]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宁城县鸽子洞辽代壁画墓》,《宁城县埋王沟辽代墓地发掘简报》,俱见《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宁城县岳家杖子辽萧府君墓清理记》,《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 [12]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哲里木盟博物馆:《辽陈国公主墓》,文物出版社1993年。
- [13]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辽耶律羽之墓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第1期。
- [14]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通辽市吐尔基山辽代墓葬》,《考古》2004年第7期。
- [15]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南郊辽赵德均墓》,《考古》1962年第5期。
- [16] 热河省博物馆筹备处:《赤峰县大营子辽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6年第3期。
- [17]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辽韩佚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4年第3期。
- [18] 朝阳地区博物馆:《辽宁朝阳姑营子辽耿氏墓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3辑。
- [19] 冯永谦:《辽宁省建平、新民的三座辽墓》,《考古》1960年第2期。
- [20] 靳枫毅:《辽宁朝阳前窗户村辽墓》,《文物》1980年第12期。
- [21] 武家昌:《喀左北岭辽墓》,《辽海文物学刊》1986年第1期。
- [22] 冯永谦:《凌源温家屯发现的辽代契丹人墓葬》,《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动态》1984年2期。
- [23] 辛岩、华玉冰:《辽宁建平县两处辽墓清理简报》,《北方文物》1991年第3期。
- [24] 冯永谦:《辽宁法库前山肖袍鲁墓》,《考古》1983年第7期。

辽上京皇城遗址

考古新发现和研究

董新林 汪 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契丹族是我国业已消逝的古老民族，原本是东部鲜卑的一支。公元 344 年，由鲜卑慕容部建立的前燕攻破宇文部，契丹遂从鲜卑宇文部中分裂出来。契丹部落后游牧于潢河(今西拉木伦河)与土河(今老哈河)一带,附属于“库莫奚”。《魏书·列传第八十八·契丹》记载北魏太祖拓跋珪登国三年(388 年)破奚和契丹的事情。“契丹国，在库莫奚东，异种同类，俱窜于松漠之间。登国中，国军大破之，遂逃进，与库莫奚分背。经数十年，稍滋蔓，有部落，于和龙之北数百里，多为寇盗。”^[1]这是契丹之名最早见于中国文献中。

经过 500 余年的发展和壮大，公元 907 年，长期雄踞燕山北麓地区的契丹族异军突起，契丹部落联盟可汗耶律阿保机称帝。公元 916 年正式建国号“契丹”，后一度改称“大辽”。此后契丹逐渐统一北方中国，并长期占据，与南中国的五代、北宋对峙 200 余年，开启中国第二次南北朝的局面。

契丹辽帝国的疆域以赤峰地区的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为中心，占据北抵克鲁伦河流域，一度到外兴安岭一线，东临日本海，西到阿尔泰山附近，南达河北高碑店白沟一线的广大地区。契丹辽帝国曾设有五京。《辽史·地理志》载：“太宗以皇都为上京，升幽州为南京，改南京为东京，圣宗城中京，兴宗升云州为西京，于是五京备焉。”^[2]其中辽上京是辽朝营建最早、使用时间最长、最为重要的首都。



图 1 辽上京遗址位置图

辽上京遗址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南(图 1),是 1961 年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辽上京曾是辽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是中国游牧民族在北方草原地区建立的第一座都城。城址平面略呈“日”字形，由皇城(北)和汉城(南)两部分组成。辽上京双城制的平面布局，是“因俗而治”统治理念的物化表现，开创了中国古代都城形制布局的一种新模式。对于金、元、清诸王朝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我国乃至世界古代都城发展史上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

辽上京作为辽代首都沿用了 200 余年，是我国历史上使

用时间最长的草原都城。辽上京遗址也是我国目前保存状况最好的古代都城遗址之一。位于北部的皇城遗址平面格局基本保存完好，夯土城垣高达 6 ~ 10 米不等，宫殿寺院等建筑基址依稀可见；位于南部的汉城遗址地表遗存保存略差，但城内文化堆积较厚，仍存有丰富的文化遗存，具有极高的历史和科学价值。辽上京城址遗址所蕴含的丰富的社会制度和历史文化等信息，一直为国内外学术界所关注。对于辽上京遗址进行科学的考古发掘和有效的遗址保护，无疑是对保护中国古代文化遗产所做的重要贡献。

进入 21 世纪，巴林左旗城区的扩展使辽上京遗址保护压力骤增。为了推进对辽上京都城制度的深入研究，促进地方政府对辽上京遗址进行有效保护，为辽上京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和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提供科学的考古资料，在国家文物局有关领导和专家的大力支持下，从 2011 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和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辽上京考古队，开始对辽上京遗址进行全面勘测和有计划的考古发掘。我们的学术目标首先是要了解辽上京城址的平面布局、功能分区和历史沿革；其次是结合历史文献，探索以辽上京为代表的辽代都城制度和历史地位；第三是促进对辽上京遗址的有效保护，为辽上京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以及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等保护工作提供科学的基础资料。

辽上京城址由北部的皇城和南部的汉城两部分组成，平面略呈“日”字形，总面积约 5 平方千米^[3](图 2)。皇城遗址保存较好，皇城墙范围基本完整，平面呈不规则方形^[4](图 3)。根据文献记载，宫城位于皇城中部。但是宫城城墙已掩埋于地下，宫城的准确范围一直都不清楚。从 2011 年至 2017 年，辽上京考古的重点工作区域集中在辽上京皇城遗址，紧紧围绕城址形制布局和历史沿革的城市考古工作目标，对辽上京皇城和宫城的城门、城墙、城内道路、重要建筑基址等进行了一系列有计划的科学发掘，取得了诸多重要考古新发现。

(一) 城门遗址

辽上京考古队对皇城东门、西门遗址和宫城东门、南门、西门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或试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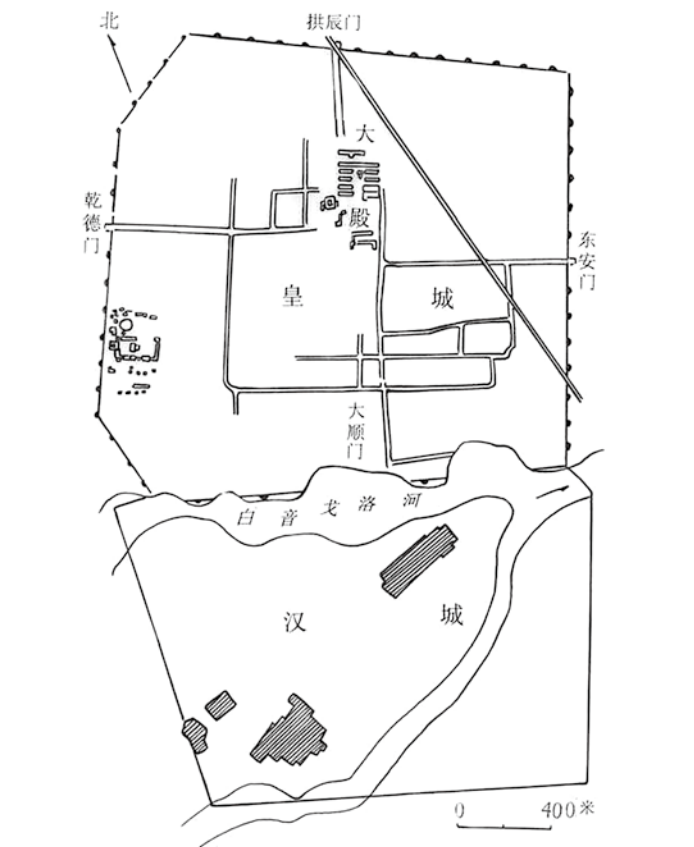


图 2 辽上京城址平面图

1. 皇城东门和西门遗址

辽上京皇城城墙地表遗迹保存较好，整体形制保存基本完整，平面呈不规则方形，其中西墙南、北两端略呈折线。皇城四面各辟有一座城门，除南门已遭沙力河洪水破坏，皇城东、西、北三座门址地表遗迹清晰。辽上京皇城现存的三座城门都有瓮城。瓮城整体平面呈“马蹄形”，由瓮城墙和瓮城门组成。其中东门的瓮城规模最大。

皇城东门遗址位于皇城东墙的中部，由瓮城和城门组成^[5]。根据试掘可知，辽代城门为过梁式城门，呈一门三道格局。其中，中门道破坏严重，南、北两个门道保存好。门道内残存石地袱、木地袱承排叉柱的建筑基础，倒塌堆积中包含大量烧毁的砖、木构件等。金代对皇城东门进行原址改建，封堵南北两个门道，只用中央一个门道出入。

皇城西门位于皇城西墙的中部偏北，城门墩台及城门外侧的瓮城格局保存情况较为完好^[6](图 4)。城门遗址由南北两侧的夯土墩台、单门道及其路面和内侧的登临马道等组成。根据门道内外倒塌的砖瓦堆积推测，城门之上原应有城



图3 辽上京遗址航拍（左为北）



图4 辽上京皇城西门遗址（下为北）

楼建筑。城门至少有三次大规模营建。第一次和第二次营建城门规模较大，墩台范围较清楚，门道宽（地袱石内侧路面宽度）约6.2米，进深约30米。其中第二次营建的城门门道基础石地袱保存较好，烧毁的木地袱上还可辨认出榫眼，应作竖立排叉柱之用。门道中部仍存石门限，其北侧存一门砧石。城门北墩台（南墩台未发掘）内侧发现登临马道。第一、二次营建的城门属于辽代；第三次营建的城门规模体量明显变小，仅残存北侧的部分石地袱，及其

上的木地袱和排叉柱遗痕。宽度不详，总进深约19米。墩台四角均发现安置石角柱的槽石，其中西北角的角柱尚存。北墩台的西立面保存较好，底部作条石，上部包砖。门道中部残存一段木门限，其北侧存一门砧石，原来应设双扇版门。此次营建属于金代。

《辽史·地理志》记载，上京“其北谓之皇城，高三丈，有楼橹。门，东曰安东，南曰大顺，西曰乾德，北曰拱辰。”^[7]我们发掘的皇城东门和西门，应是安东门和乾德门遗址。

2. 宫城东门、南门和西门遗址

根据《辽史·地理志》记载，“其北谓之皇城……中有大内。内南门月承天，有楼阁；东门曰东华，西曰西华。此通内出入之所。”^[8]皇城内有机城，但地表已经无法辨识宫城城墙的位置。2013~2015年的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确认了宫城的位置和范围。宫城位于皇城中部偏东，平面略呈长方形，宫城东、南、西三面各辟有一门，勘探未发现北门。考古发现与《辽史》记载基本吻合。辽代宫城城门在金代被破坏，发现有金代民居和灰坑等。

宫城东门位于东墙的中部，为殿堂式城门^[9]。门址由夯土基槽、台基、礅墩、坡道和南、北两侧的附属设施遗迹等组成（图5）。夯土基槽平面略呈长方形，南北宽约32米，进深13米。残存的台基上确认22个礅墩，由此确定建筑的

柱网平面为面阔5间，进深2间。根据门址东侧的坡道及道路残迹可知，宫城东门可能有三门道。

宫城南门位于宫城南墙中部略偏西，由东、西两侧的墩台、中间的单门道和登临墩台的内侧（北侧）马道三部分组成^[10]（图6）。夯土墩台保存较好，各面边壁包砖。西墩台南北长11.8米，东西宽6.7米，最高残存约3.3米。墩台中间设单门道，宽约7.8米。原位保存有将军石、石门限和门砧石等设施。将军石东段石门限上存有两道较深的沟槽，与路土上的车辙痕迹相连。门道两侧城门基础做法为石柱础上铺木地袱、上立排叉柱。石柱础每侧6个，即城门门道进深5间。在门道中央将军石南侧，发现一个祭祀坑，坑内发现两副狗骨架和两件羊头骨。马道紧贴城墙北侧而建，外侧边壁包砖，底部包石。根据夯土遗迹和门道内外倒塌的砖瓦堆积，可知城门之



图5 辽上京宫城东门遗址遗迹总平、剖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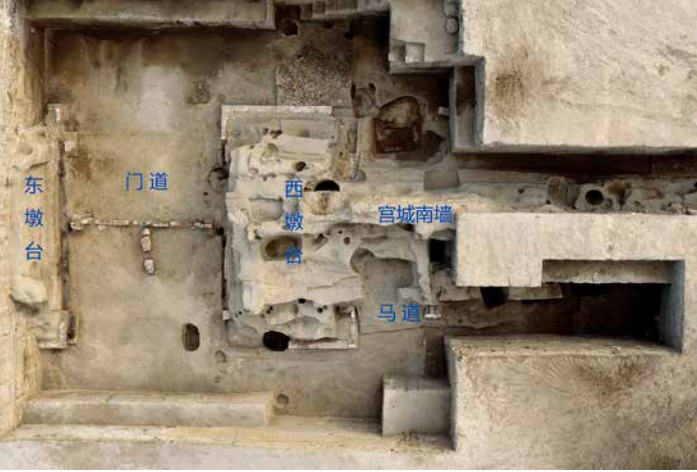


图6 辽上京宫城南门俯视图（下为北）

上建有木构门楼建筑。我们在西墩台残存的夯土台面上发现4个柱洞，即墩台上的木构门楼建筑或其平坐采用永定柱做法，可能为进深三开间的柱网布局。根据层位关系和出土遗物，宫城南门第一次营建应在辽代早期；第二次增设墩台和木构门楼，可能与《辽史·地理志》所载辽太宗“辟承天门”有关^[11]。辽上京宫城南门及宫城墙在金代完全被小房址所叠压，宫城格局已彻底废弃，仅南门大街（一号街道）继续沿用。

宫城西门位于宫城西墙中部，与皇城西门相对。由两侧的墩台和中间的门道两部分组成^[12]（图7）。夯土墩台保存较差，中间设单门道，宽度约6.4米。门道内尚存将军石、地袱石、路面、柱洞等建筑基础遗迹。根据遗迹和遗物推断，该门址在辽代至少经过两次较大的营建。城门毁弃后，此处仍有东西向道路遗迹，并先后建有依宫墙残迹而建的房址、跨宫墙残迹而过的院墙等晚期遗迹。

（二）城墙遗址

辽上京考古队对辽上京皇城东墙和宫城四面城墙都进行了试掘，初步了解到城墙结构和营建次序。其中以结合考古钻探，探寻宫城形制规模的宫城城墙试掘最为重要。

从现地表遗存来看，辽上京宫城墙保存状况较差。除北墙还有局部隆起，大部分已掩埋于地下，无法分辨。通过对辽上京宫城北墙、南墙和西墙的考古发掘和解剖，可知残存宫城墙由夯土夯筑而成，夯土可分为地上墙身和地下基槽两部分^[13]。地上的墙身部分残存高度0.3 ~ 2.0米不等。目前发现的宫城北墙和西墙的底面宽度均2.6 ~ 2.9米左右，主体



图7 辽上京宫城西门遗址局部 2014年发掘（东—西）

为黄色夯土。南墙的底面宽度约6.6 ~ 6.8米，主体为灰褐色夯土（图8）。地下的基槽部分深度约0.25 ~ 0.45米，南墙局部基槽深度达0.92米。墙基两侧筑有夯土护坡等附属设施，墙外可能设有壕沟。根据遗迹和出土遗物推定，宫城墙建于辽代，局部有夯土增补修筑；毁弃于金代，局部城墙上已建有金代房址。

根据重点考古勘探工作的新线索和对宫城墙进行考古试掘的新收获，辽上京考古队进一步对四面宫城墙的走向、形制结构和保存状况进行了确认。从而首次从考古学上明确了辽上京宫城的规模和范围。辽上京宫城位于皇城中部偏东，平面呈长方形，东西宽约740米，南北长约770米。

（三）城内道路和相关遗迹

根据考古勘探和踏查，在辽上京皇城内发现多条辽金时期道路。其中勘探和试掘可以明确皇城东门内大街，南门内大街和西门内大街。这是辽代皇城内最为重要的三条干道。

皇城东门内大街遗址^[14]位于辽上京皇城东门和宫城东门之间。根据考古试掘情况可知，该街道遗址现存三次主要营建（图9）。最早的路面L3营建是在生土之上，局部用灰褐色碎砂石土做垫土，路面残宽43.5米，厚约5厘米。南部有一条浅路沟。第二次营建L2路面大部分沿用L3的路面，局部垫土，形成新路面，含较多石子等。路面发现9条车辙。路面残宽约40米。第三次营建L1路面沿用L2或L3的路面，局部修整形成灰褐色砂石路面。含较多石子、较少的兽骨等。根据层位关系和出土遗物等



图8 辽上京宫城南城墙夯土剖面 2014年发掘（南—北）

推定：L3应与宫城东门大体同时始建，为辽代早期开始使用；L2和L1沿用并修补。L1的下限至少可到金代晚期。

皇城南门内大街遗址^[15]位于辽上京宫城南门外（南侧）。地层堆积厚度约3.4 ~ 5米。共清理出一号街道的路面遗迹15层（编号L1 ~ L15）、与各路面相对应的临街建筑址30处（编号F1 ~ F30）及水沟、灰坑等其他遗迹。根据层位关系，结合遗迹和遗物的整体变化，可将一号街道及临街建筑的营建从早到晚分为五段。其遗存始建于辽代，在金代进行多次改建，至元代废弃。辽代地层堆积较薄，一号街道路面状况一般，出土遗物较少，可能并未经过频繁使用或曾经遭到严重破坏。而该遗址金代地层堆积厚，街道路面状况较好，临街建筑基址规模较大。出土的建筑构件及其他遗物，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建筑等级的变化，体现出上京城在辽金两代城市布局上的变化。这为我们认识辽上京城的平面布局和历史沿革积累了重要的基础材料，同时对于以后的考古钻探发掘也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四）重要建筑基址

辽上京皇城遗址内现存诸多建筑基址，多数都是经过辽金时期长期使用和改建后的遗存。通过考古发掘和试掘，辽上京考古队初步确认了数处重要的辽金时期建筑基址。

1. 西山坡佛寺遗址

在辽上京皇城西南，靠近皇城西墙有一处呈缓坡状的自然高地，当地俗称“西山坡”。西山坡地表可见两组东向的



图9 辽上京皇城和宫城东门之间的2号街道三层路面情况（南—北）

长方形院落及其相关的附属建筑基址群。两组东向的院落南北并列，坐落在自然山丘上，地势最高，这里也是辽上京全城的制高点。在北组院落的中后部，并排存有三座高台建筑基址。根据考古发掘可知，这三座高台建筑是3座六边形塔基^[16]（图10）。居中的一号塔基是一座六角形木回廊的砖构楼阁塔基。塔基由夯土台基和残存塔身两部分组成，结构较为复杂。夯土台基规模宏大，平面呈六角形，由夯土、包砖、砖铺散水、东侧月台和西侧慢道组成。台基边长约20米，对角直径约40米，总高约2米。台基六面边壁作单层包砖，磨砖对缝，抹白灰皮。残存塔身的底层平面结构保存较好。平面呈六角形，用柱三周，每面三间。塔身结构由双套筒砖构、双向楼梯、塔心室、木构副阶构成。塔心室平面为六角形，可惜中前部近一半面积被巨大盗坑所破坏，未发现可以确认塔心室下方是否设置过地宫的迹象。木构副阶即外圈和中圈柱础之间形成的木构回廊，地面铺砖，进深5.3米。在副阶东面前门的位置，门道一侧原址保留了一处泥塑立像，残存仰莲座及泥塑跣足，彩绘贴金（图11）。在副阶的铺砖地面上，出土了大量的倒塌泥塑造像残块、大量铜钱和部分陶瓷器残片等。在副阶内沿中圈柱础外侧一周，还清理出几处砖砌像座址。由此说明，在副阶回廊之内，原安置供奉了大量泥塑造像，很可能还有围绕塔身外壁底部而建的影壁；并且副阶内曾有信徒进行供养活动。二号塔基和三号塔基也都是六角形砖构塔基，分别位于一号塔基南侧和北侧，基本对称分布。两座塔址都现存夯土台基和地宫两部分。地面以上残存六角形包砖夯土台基，边长为5.7 ~ 5.9米，对径约为11.5米。



图 10 辽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寺遗址 2012 年发掘（下为东）

地宫均破坏严重，不仅地宫遗物被盗，而且连修砌地宫的青砖都被取走，仅存部分砖痕。幸运的是，在三号塔基的盗坑扰土中，发现彩绘石雕舍利棺残块。表明该塔基内可能曾瘞埋舍利。通过这次考古发掘，我们初步确认西山坡遗址是一处佛教寺院遗址，位置重要、规模庞大，是辽上京皇城内的标志性的建筑群之一。三座塔址始建于辽代，经过数次改建，一直到金代还在沿用。以往学者根据地表遗迹，多认为西山坡遗址是辽代早期宫殿址。本次发掘确认其为佛教寺院的建筑性质，对重新认识辽上京皇城的形制布局将产生重大影响。

2. 宫城内东向建筑基址群

根据地面踏查、考古勘探现象可知，连接皇城东门和宫城东门的东门大街延伸到宫城内，其轴线上大致有数座大型建筑基址。因此，我们对宫城内东门大街轴线上建筑分别编为一号殿院落、二号殿院落和三号殿院落。

一号殿院落位于宫城东门内，东门轴线上，坐西朝东，平面呈长方形。院落四面均以廊庑围合，东面中央建设院门，西面正中为一座大型建筑基址（即一号殿址）。通过局部揭露可知，一号殿址夯土台基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 48 米，东西宽约 27 米。台基四壁包砖，南北两端与院落的西侧廊庑相连（图 12）。一号殿址出土遗物主要以瓦当、滴水、筒瓦、板瓦等建筑构件为主。

二号殿院落居于皇城东门、宫城东门、一号殿院落的轴线上，一号殿院落西侧。坐西朝东。根据考古勘探和试掘，二号殿院落遗址沿中轴线对称分布，院落东部格局清晰。已确认院



图 11 西山坡遗址出土泥塑

落东部南侧廊庑，夯土建筑，东西宽约 11.6 米，分布有 4 排磴墩。即廊庑进深三间，与一号殿院落四周廊庑的建筑形制一致。推测东面设门。而院落西部已破坏殆尽，现为自然基岩，院落和殿址位置和形制结构不明。在该处还发现金代陶窑址、金代房址等晚期遗迹，普遍破坏了辽代宫殿建筑遗址。

三号殿院落位于东门轴线的最高处，为自然的小山丘。考古勘探和发掘还没有确认院落。但在东门轴线上最高的自然高地上，确认一处辽代建筑址（2017JZ1）。一号建筑基址营建在一处高起的基岩之上，不设基槽，直接用夯土与基岩面找平。这里是辽上京宫城东向中轴线上地势最高的建筑，也是轴线最西端的建筑。该建筑始建台基平面略呈长方形，南北长 17.85 米，东西残宽 15 米，残高 0.2 ~ 0.62 米。台面未见柱网。现南、西、北三面均未见登临的慢道，东侧毁坏不详。台基西侧约 4.42 米有一道与南北走向台基边平行的黑夯土墙，南北两端均超出台基范围。墙残长 50 余米，宽约 2.3 米，残高 0.4 米。该建筑在辽代曾经对台基局部进行补筑、新修慢道，改建后为南向建筑。夯土台基平面呈长方形，东西宽 18.2 米，南北长 21.42 米。高 0.5 ~ 0.8 米。台基原有包砖壁和散水设施。台基上建筑柱网不详。

3. 金代“西大院”遗址和大型建筑基址

在辽代宫城西部，地表可见一处大型院落遗迹，沿用以往资料称“西大院”遗址^[17]。“西大院”四面墙体地表遗迹明显，略呈长方形，东西宽 240 ~ 270 米，南北长 360 ~ 390 米。其北墙东部，恰从辽代宫城西墙的西门处穿过。辽上京考古

队通过宫城西门遗址的考古发掘和解剖可知，西大院北墙完全叠压在辽代宫城墙废弃后的堆积上，分层堆土而建^[18]。残高 0.8 ~ 1 米，底面宽度 5.3 ~ 5.5 米。墙体堆土层厚 0.3 ~ 0.5 米，土质疏松且包含大量遗物。墙外有壕沟。根据遗迹遗物判断，西大院墙体始建年代不早于金代晚期。

原来宫城内的一号建筑基址（2017JZ1）始建于辽代，金代原址改建，并新建了一组南向的建筑院落。院落内主要建筑为一号、二号两座基址。一号基址在金代有两次营建。一号建筑建有双层台面，台基南北两面中部筑有慢道。二号基址（2017JZ2）位于一号基址北侧，而始建地面较一号建筑基址低较多（图 13）。在金代有三次大规模的营建。始建台基平面呈近方字形，北部中有一个月台，南面有通道与一号建筑基址相连。台基东西宽约 33 米，南北进深约 27 米，高约 2 米，包壁砖用磨砖对缝工艺。根据现存柱网分布情况推定，主体建筑为面阔 5 间、进深 3 间。第二次改建台基规模略变小。主体建筑也是面阔 5 间、进深 3 间的建筑。室内后部抬高地面，形成“凹”形台面。室内平铺方砖。台基南侧有平缓通道；北侧中部有慢道。第三次改建台基规模更小。主体建筑为面阔 3 间、进深 3 间。室内平铺长方形砖。

三

七年来，辽上京遗址考古工作遵循城市考古的基本方法，并与建筑考古、科技考古和遗址保护等多学科密切结合，重点围绕城址的布局和沿革开展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调查、勘探总面积达 3 平方千米。发掘的遗址主要包括皇城城门（东门、西门）、西山坡大型佛寺塔基、宫城城门（东门、西门）、宫城一号殿院落等重要建筑遗址，还对皇城城墙、



图 12 一号殿院落之北侧廊庑局部（东北—西南）

宫城城墙以及城内道路系统等线性遗迹进行了试掘和解剖，在较短时间内取得一系列重要考古成果，极大地增进我们对辽上京皇城布局和沿革的认识。主要收获有以下几个方面。

1. 通过考古勘探和重点试掘，首次确认了辽上京宫城的位置和规模，更正以往对宫城范围的错误推测。宫城位于皇城中部偏东，平面呈近方形，东、南、西各辟有一门，目前未发现北门。通过对宫城四面墙体的局部试掘和解剖，初步掌握辽上京宫城城墙的营建做法、形制结构及其年代。辽上京宫城位置和形制的确定，是辽上京遗址考古的重大成果。

2. 根据考古调查、勘探线索，结合考古发掘，首次发现并确认皇城东门、宫城东门、宫城内一组东向的大型建筑院落，及贯穿其间的东西向道路遗址，呈东西向轴线布局。辽上京皇城东门和宫城东门均为一门三道格局，而皇城西门和宫城西门、宫城南门均为单门道，可见东门规模大、等级高，体现出帝都的规制。而且宫城东门外大街的宽度至少是南门外大街的 2 倍。从考古学上首次证明辽上京城曾存在东向为尊的情况，与历史文献记载相一致，极大地推进对辽上京城址布局的研究。

3. 通过对皇城内多处建筑遗址的发掘和解剖，我们了解到辽上京都城建筑的形制类型、历史沿革及其建筑技术特点。从皇城和宫城的东门、西门遗址来看，辽上京的城门主要分为以皇城东门、西门为代表的过梁式城门和以宫城东门为代表的殿堂式城门两种。通过对皇城墙、宫城墙、一号殿址、一号建筑基址、西山坡遗址、南部街道及临街建筑等多种类型遗址的揭露，我们对辽上京城墙、宫殿、佛寺、街道的形制做法也有了更深的认识。这为我们研究辽代建筑的形式、技术及其源流发展，提供了难得的考古资料。

4. 皇城内西山坡遗址的发掘是迄今规模最大的一次辽代都城遗址考古。根据出土遗迹和遗物，可以确认西山坡是一处辽代始建的佛家寺院遗址，位置重要、规模庞大，是当时辽上京城标志性的建筑之一。佛寺分为南、北两组，各有院墙。其中北组西部为三座六角形佛塔基址，布局形式为一大两小、一字排开，是目前所知国内唯一的实例。位于中央的大型塔基，出土大量精美写实的泥塑佛教造像，引起国内外多学科科学者的广泛关注。这次发掘成果明确了西山坡遗址的性质，对重新认识辽上京皇城布局和沿革将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5. 通过对皇城遗址的考古勘探和对皇城内几处重点遗址



图 13 辽上京皇城二号建筑基址（2017JZ2）全景

有计划的发掘，较全面地了解到皇城内原始的地形地貌和地层堆积情况。同时，获得一系列地层关系清晰明确的重要遗物，可初步建立一些遗物的年代序列，为推定遗址时代建立基础，有效推进对辽上京城址营建、发展、废弃等历史演变过程的认识。

辽上京遗址这七年的发掘成果十分重要。一方面丰富了辽代都城考古的基础材料，提升对辽上京城址布局和沿革的研究水平，极大地推进辽代都城的考古和历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另一方面也为促进大遗址保护，推进辽上京国家遗址公园建设和辽上京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等提供更坚实的学术支撑。

注 释

- [1]（北齐）魏收：《魏书·地理志一·上京道》，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 年，第 2223 页。
- [2]（元）脱脱等：《辽史·地理志一·上京道》，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 年，第 438 页。
- [3] 李逸友：《辽上京遗址》，《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年。
- [4] 中国历史博物馆遥感与航空摄影考古中心、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内蒙古东南部航空摄影考古报告》，科学出版社，2002 年，第 85 页照片。
- [5] 董新林、陈永志、汪盈、肖淮雁、左利军：《辽上京城址首次确认曾有东向轴线》，《中国文物报》2016 年 5 月 6 日第 8 版。
- [6] 董新林、陈永志、汪盈、康立君、肖淮雁：《辽上京城遗址首次大规模考古发掘乾德门遗址》，《中国文物报·文物考古周刊》，2012 年 1 月 20 日第 8 版。
- [7]（元）脱脱等撰：《辽史·地理志一·上京道》，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 年，第 441 页。

- [8]（元）脱脱等撰：《辽史·地理志一·上京道》，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 年，第 441 页。
- [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宫城东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17 年第 6 期。
-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遗址的考古新发现》，《考古》2017 年第 1 期。
- [11]《辽史·地理志一·上京道》，中华书局，1974 年，第 440～441 页。
- [12] 董新林、陈永志、汪盈、左利军、肖淮雁、李春雷：《考古发掘首次确认辽上京宫城形制和规模》，《中国文物报》2015 年 2 月 4 日第 8 版。
-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宫城城墙 2014 年发掘简报》，《考古》2015 年 12 期。
-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遗址的考古新发现》，《考古》2017 年 1 期。
- [15] 董新林、陈永志、汪盈、肖淮雁、岳够明、马东旗、左利军：《辽上京城考古重大发现——皇城西山坡确认辽代佛寺遗址》，《中国文物报·文物考古周刊》，2012 年 12 月 7 日第 8 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寺遗址获重大发现》，《考古》，2013 年第 1 期。
- [16] 董新林、陈永志、汪盈、肖淮雁、左利军：《2013 年辽上京皇城遗址考古发掘取得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14 年 2 月 14 日第 8 版。
- [17]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辽上京城址勘察报告》，《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 1 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 年。
- [18] 董新林、陈永志、汪盈、左利军、肖淮雁、李春雷：《考古发掘首次确认辽上京宫城形制和规模》，《中国文物报》2015 年 2 月 4 日第 8 版。

朝阳北塔地宫辽代石经幢及相关问题研究

王志华·朝阳市北塔博物馆

朝阳北塔位于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慕容街北端。清朝初期，朝阳城内还保存有三座古塔，依其方位，称为东塔、南塔、北塔。

朝阳北塔始建于北魏太和年间（485 年前后），是北魏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为其祖父北燕王冯弘祈祷冥福、弘扬佛法，而在东晋十六国时期前燕、后燕、北燕龙城宫殿基础上建造的“思燕佛图”。这是一座土木结构楼阁式塔，后被火烧毁。隋文帝仁寿二年（602 年），颁布五十三州建立灵塔，供奉舍利。其中第三位为营州（今朝阳）。营州人奉诏在思燕佛图旧址上重建一座方形空心叠涩密檐式砖塔，称“梵幢寺塔”，安葬隋文帝派高僧颁赐的佛舍利。唐玄宗天宝年间（742～755 年），安禄山任三镇军政节度使，对这座隋代砖塔进行第一次维修，并在塔束腰处施以精美彩绘，建筑风格保留了隋塔的风貌。辽代初期和辽兴宗重熙年间两度维修此塔，并更名为“延昌寺塔”。辽代第二次维修时重修了北塔天宫、地宫，并将隋塔包修在里面，改变了隋唐和辽初佛塔的建筑风格，变成了如今所见的辽代风格的密檐式砖塔。

1984～1992 年，国家文物局拨款对朝阳北塔进行加固维修。随着北塔维修工程的进展，尤其古建勘察和考古发掘工作的进行，专家们在丰富的考古资料基础上，通过综合分析、研究，揭开了朝阳北塔“五世同体”的面纱，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貌^[1]。朝阳北塔历经三燕、北魏、隋、唐、辽五个朝代，荟萃了南北朝、隋唐、宋辽三个历史时期佛塔建筑

风格特点，是中国古代佛教建筑史上难得的典型代表，在中国乃至世界古建筑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北第一塔。

通过维修和考古发掘，朝阳北塔有许多重要考古发现。现在介绍的是北塔地宫辽代石经幢，并就有关问题谈谈自己的粗浅看法，不妥之处，敬请专家们指正。

一 朝阳北塔地宫概况

地宫发现于 1986 年，位于朝阳北塔塔心室下面的塔基中心，略低于现在地表面。宫室为长方形，室内南北长 2.05 米，东北宽 1.76 米，高 4.48 米。用沟纹青砖筑成，白灰勾缝，柏木板棚顶，青砖墁地。墙壁面涂以白灰，现已大部分脱落。南壁中间有一个砖砌的方洞，长宽 20 厘米，此洞下与地宫相连，上与塔心室相通，并与塔顶天宫上下相应。地宫中部地面上矗立一座石经幢。石经幢南侧地面下有一个长方形砖室，用青砖筑成，上部用雕刻莲花藻井图案的大条砖封盖。地宫早年被人盗窃、扰动。原来应放置在砖室内的盛装佛舍利的石函被移到室外砸坏，地宫及石函内的珍贵文物大都被洗劫一空。地宫虽然被盗，但还残存一些颇有价值的文物：刻有“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和“哪吒护法”图案的石函，刻写“霸州邑众诸官／同共齐心结缘／弟三度重修所有保安法师奉隋文帝敕藏舍利／未获／请后知委”共 37 字的题记砖，白瓷子母狮，白瓷方盘、圆盘、碗、碟、罐等瓷器，

还有许多用水晶、玉石、玛瑙、琥珀、珊瑚、琉璃等贵重材料雕琢而成的各种形状的珠饰及铜钱等^[2]。其中最宝贵的当数高大精美的石经幢。

二 经幢形制与雕饰

石经幢用青砂岩雕制。现存幢座和幢身，其中幢身有4节，发现时立有3节，高4.28米，另有一节幢身和两个莲花座散置在地上。安装后，经幢通高可达5.26米，比地宫要高出0.78米。包括放在地上的幢身和莲座，经幢共有4节幢身和6层八角形座和1层仰莲圆座，其中第一节幢身下有2层八角形座和1层仰莲圆座，其余各节幢身皆有1层八角座和1层圆形莲座，八角座上面刻一周莲花纹，其上置仰莲圆座，座上面雕连珠纹，上承幢身。幢身八角柱状，上细下粗，上下出榫，插于石座内，高度逐层递减，高71~98厘米，直径37~57厘米。八角形座直径75~121厘米，厚15.5~23.5厘米。仰莲圆座直径90厘米(图1)。从经幢的一般特点看，此经幢并不完整，基座和顶部都有缺失，但此经幢形体之高大、保存之完好、雕刻之精美、内容之丰富，在古代经幢中还是很少见的，堪称“东北第一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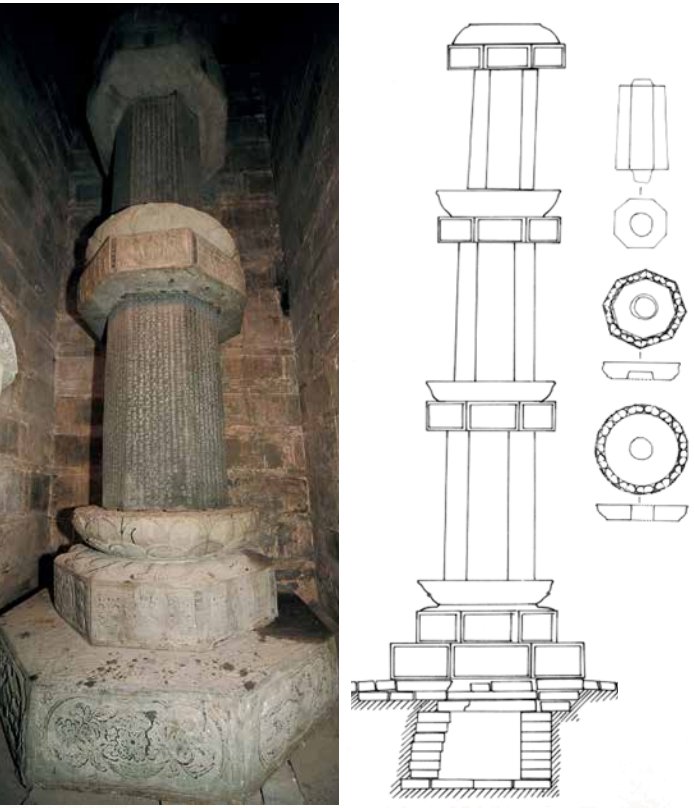


图1 立在地宫中的经幢及组合后的经幢形制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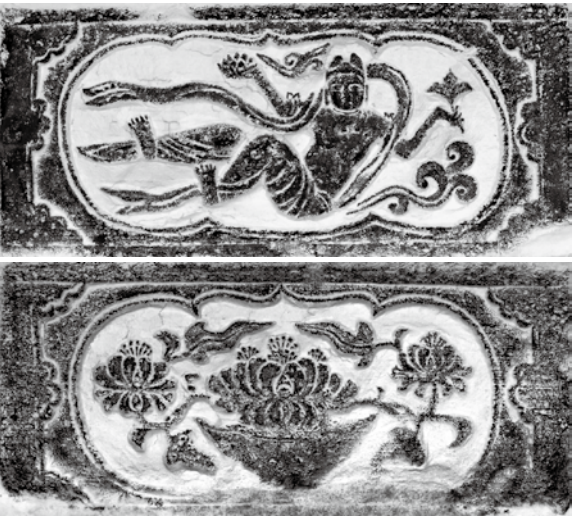


图2 经幢第一节第一层座立面雕饰图案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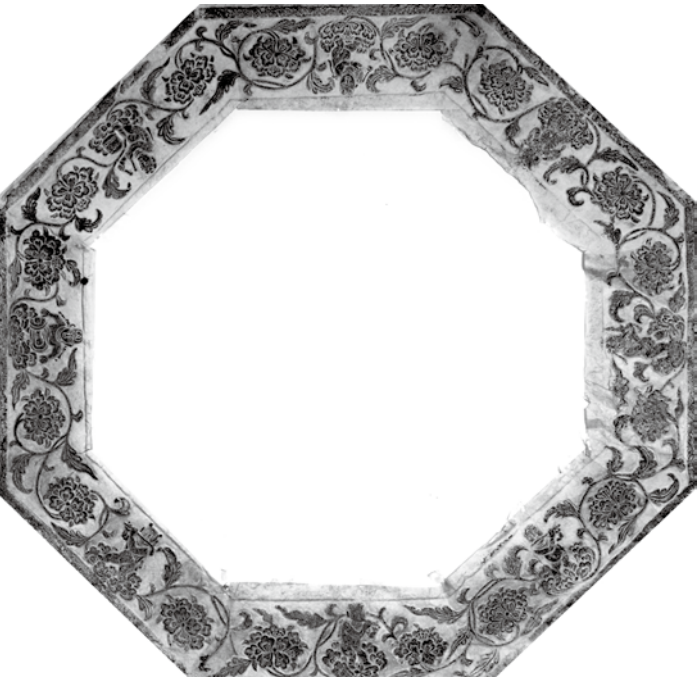


图3 经幢第一节第一层座上面雕饰图案拓片

经幢幢座雕刻佛教图案，非常精美。第一节幢身第一层八角形石座，立面和上面采用剔地浅浮雕技法，雕刻着飞天、乐人、莲花图案。八立面之周边刻出边栏及连弧纹，内刻壶门，门内浮雕图案分为两种：四正面各刻一莲盆，四隅面各刻一飞天(图2)。莲盆图案构图相同，均于下部刻出八瓣连弧形花盆，盆内一枝盛开的莲花。飞天形态大体相同，面相方圆，慈眉善目，头梳双髻，颈系缨珞，戴臂钏，上身袒露，穿长裙，挽彩带，双臂上举，一手托供物，一手持莲枝，头上臂下，飞舞于空中，天衣飘曳，婀娜多姿，周围且有祥云缭绕。



图4 经幢第一节第二层座雕八大菩萨拓片

八角座之上面在边栏内刻连续莲枝纹图案(图3),每面3朵,中间一朵莲花上刻一乐人,姿态不同,皆奏着乐器。八面八人,奏八种乐器,有:大鼓、细腰鼓、横笛、拍板、萧(竖笛)、篪(箎策)、笙、排箫。

第二层八角形石座八立面于边栏内各刻一尊菩萨像,边栏题字称作“八菩萨坛”(图4)。菩萨居中,结跏趺坐于莲座上,头戴菩萨冠,颈系缨珞,披袈裟,戴臂钏,一手结印相,一手持物,有头光、身光。菩萨两侧均上刻宝盖,下置莲座。



菩萨左侧边栏题刻菩萨名号及排序,从南往东依次为:观世音菩萨头、弥勒菩萨二、虚空藏菩萨、普贤菩萨、执金刚主菩萨、文殊师利菩萨、止诸障菩萨、地藏菩萨八。

第二节幢身八角座立面浮雕“过去七佛”和“执金刚神众”(图5),各面内容布局相同,中央刻一尊立佛,身披袈裟,手结契印,站在祥云之上,有头光、身光。每尊佛都有二位菩萨手持法器或供物侍立两旁。胁侍菩萨皆女性装束,穿高领上衣,长裙拽地,头上或梳双髻,或裹头巾。佛右侧边栏



图5 经幢第二节座雕饰过去七佛和执金刚神众拓片

内有阴刻楷书佛号名，从南往东依次是：南无毗婆尸佛、南无尸弃佛、南无毗舍浮佛、南无拘留孙佛、南无拘那含牟尼佛、南无迦叶佛、南无释迦牟尼佛、执金刚神众。

第三节幢身八角座八立面浮雕“八塔七佛名”。各面均在边栏内中央雕一单层檐方塔，塔身刻写塔名，塔两侧刻出祥云。又在一侧边栏上阴刻楷书药师七佛名号（图6）。从南往东依次排列：“净饭王宫生处塔一”，边栏刻写“南无金刚坚强消灭坏散佛头”；“菩提树下成佛塔二”，边栏刻写“南无宝光月殿妙尊音王佛二”；“鹿野苑中法轮塔”、边栏刻写“南无振威德佛”；“给孤独园名称塔”，边栏刻写“南无百亿恒沙决定佛”；“曲女城边宝阶塔”，边栏刻写“南无宝胜藏



佛”；“耆闍崛山般若塔”，边栏刻写“南无宝王火焰照佛”；“菴罗卫林维摩塔”，边栏刻写“南无一切香花自在力王佛”；“娑罗林中圆寂塔”，边栏刻写“八塔七佛名”。

第四节幢身八角座立面刻“八国诸王分舍利”故事图像（图7）。布局相同，均于中央雕一国王，戴王冠，身着长袍，双手捧着内盛释迦牟尼佛舍利的器物，一副公正虔诚之态，正在回国途中，前有侍女，手中持物，后面男侍皆手擎伞盖。边栏刻写国王名号，从南往东依次为：“第一迦毗罗卫国王”，还刻有图案题名“八国诸王分舍利”、“第二摩伽陀主阿闍世王”、“第三毗离外道名王”、“第四阿勒伽罗王”、“第五毗鞠队不畏王”、“第六遮罗伽国王”、“第七师伽那国王”、“第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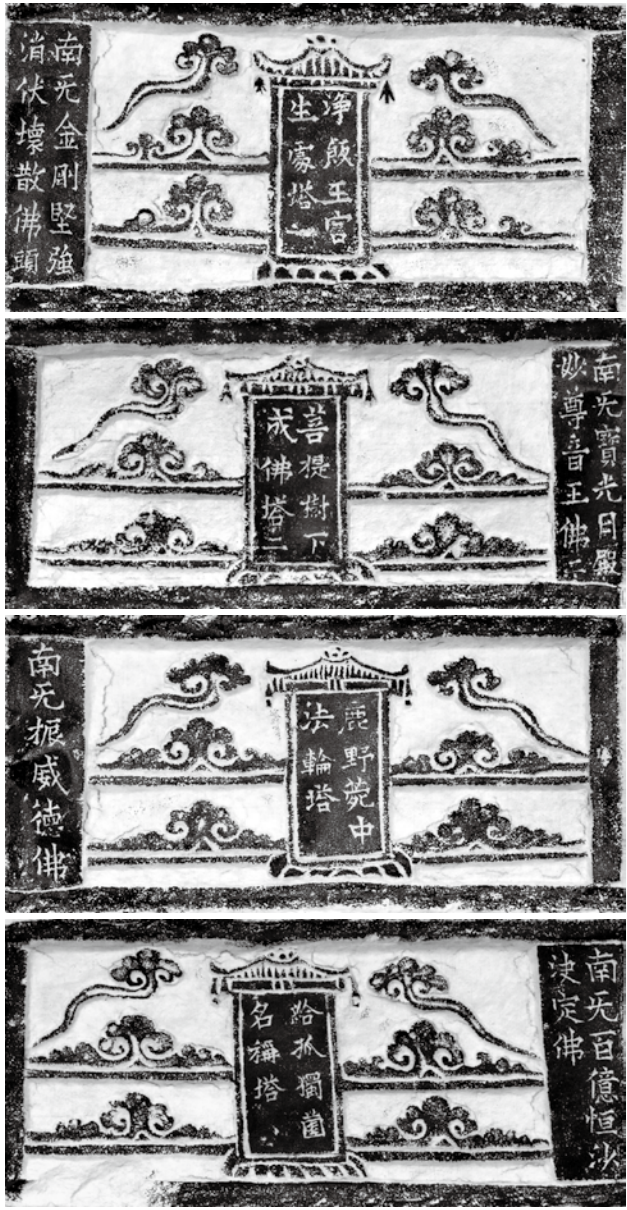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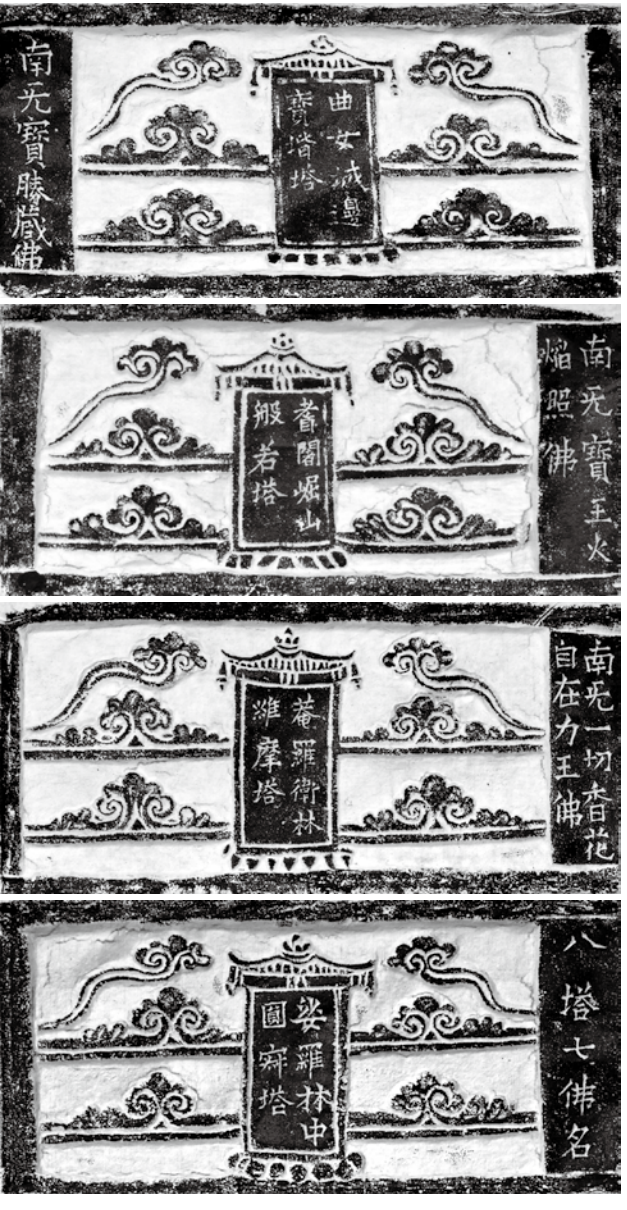


图6 经幢第三节座雕饰八大灵塔和药师七佛拓片

波肩外道名国王”。

第四节幢身之上置八角形莲座和覆莲圆座各一，发现时散置地上。八角莲座上面和侧面均浮雕八瓣莲花纹（图8）。覆莲圆座上面刻内外两层莲瓣，内层莲瓣六瓣，其中两瓣各雕一天神，人首鸟身，手捧供物，另四瓣各雕一朱雀，喙衔莲枝，布局上皆两两相对。莲瓣中央圆心内刻一方形单重檐舍利塔，下有莲座，上有顶珠，塔身上写有“法舍利颂曰：诸法从缘起，如来说是因，彼法因缘尽，是大沙门说。”塔两侧各刻一头部朝下的飞天，上面刻梵文种子及祥云（图9）。

幢身刻写佛经咒语，其中第1节刻《大佛顶如来放光悉怛多钵怛陀罗尼》，第2节刻《大随求陀罗尼》，第3节刻《梵



本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大悲心陀罗尼》《金刚大摧碎延寿陀罗尼》，第4节刻《佛顶尊胜陀罗尼》《菩提场庄严陀罗尼》《大轮陀罗尼》《大乘百字密语》。皆楷书，阴刻，梵文汉字音译或梵汉对翻。第4节幢身末尾题写“司户轩辕亨勘梵书，东班小底张日新书。大契丹国重熙十三年，岁次甲申四月壬辰朔八日己亥午时再葬讫，像法更有七年入末法。石匠作头刘继克镌，孟承裔镌”（图10）。

三 相关问题研究

经幢是唐代开始出现的佛教纪念性建筑。它是随着佛教密教传入中国，由写着经文咒语的经幡发展演变而来。用多



图7 经幢第四节座雕饰八国诸王分舍利故事图拓片

块石头雕刻堆建而成，为八角形或圆形柱状体，上有盘盖，雕刻垂幔、飘带或莲花图案，以须弥座和仰莲座承托，幢身刻经文咒语，座上刻佛教图案，供人们诵读、膜拜。这种宗教石刻也和其他建筑一样，其发展由简单到复杂，即由最初的一层发展为三、五、七等多层，幢座和幢顶雕饰也愈来愈复杂多样，特别是到了北宋和辽代，经幢的发展达到最高峰，形成雕饰日趋华美。经幢不仅放置在佛典前面，也长置于佛

塔地宫中和佛教信徒的面前。据辽代碑刻记载，辽代中晚期佛教发展到鼎盛之时，佛教信徒死后，其子女如果不在墓前立座经幢，就会被人讥为大不孝。正因如此，现在发现之经幢，以辽和北宋的最多，亦最精美。如中国现存最大的经幢便是建于北宋宝元元年（1038年）的河北省赵县的陀罗尼经幢，平面八角形，共七级，高18米。东北地区辽代经幢则以朝阳北塔地宫所发现的最高大、最精美，保存得最好，历史艺



图8 经幢第四节八角形莲座雕饰图案拓片

术价值最高。

1. 关于经幢雕制年代与镌者身份

经幢第四节幢身经文末尾题字“大契丹国重熙十三年岁次甲申四月壬辰朔八日己亥午时再葬讫”，这是关于辽代维修该延昌寺塔时重葬地宫的记载。此外，在地宫发现的记有砌匠作头和僧人名号的题记砖末尾也写有“重熙十三年四月八日记”字样。表明地宫重修并再葬舍利时间是辽兴宗耶律宗真重熙十三年（1044年）农历四月初八，即佛诞日。经幢便毫无疑问是在这一年雕制完成的，而且是特意为此次重藏地宫制作的。该塔天宫所见题记则写“重熙十二年四月八日再葬”，前后相差一年，说明先修天宫，后实地宫。

经幢四节幢身经文汉文书写风格相同，系一人所书，即第四节末尾所题“东班小底张日新书”。由“司户轩辕亨勘梵书”。镌刻者则是石匠作头刘继克和孟承裔二人。

辽代朝会时列在朝廷东侧的朝官称“东班”。“小底”是辽代官中下级侍应官，音转为“小的”，各分职任事，属北面官系统。《辽史·百官志》见有笔砚小底、寝殿小底、佛殿小底、私藏小底、鹰坊小底、汤药小底、尚衣小底等等。“司户”，是掌管土地、户籍、赋税、仓库交纳等事物的官吏。关于“石匠作头”，天宫、地宫碑刻记载修塔工匠有“砌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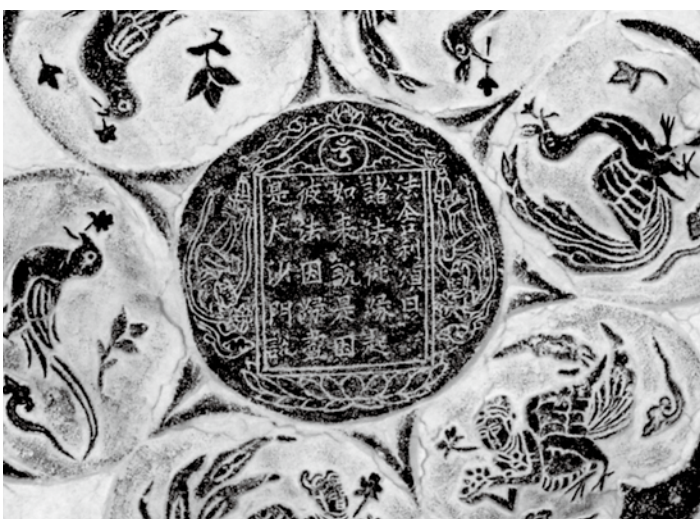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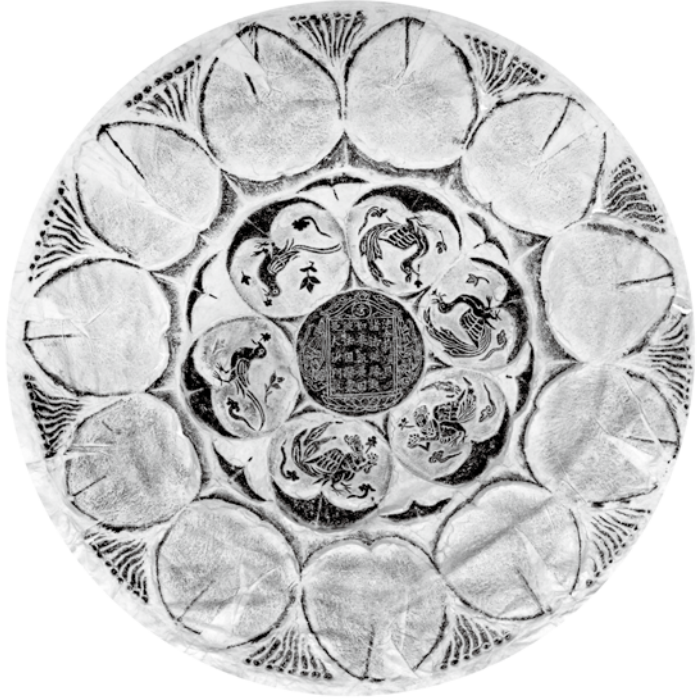


图9 经幢第四节覆莲座雕饰图案拓片

都作头”“砌塔作头”“铁匠作头”“石匠作头”等，他们都是精通技艺、领班干活的工匠师傅，也称“掌作的”。

2. 关于正、像、末三时与世尊生卒年代

第四节经幢经文末尾刻有“像法更有七年末法”句，而重熙十二年天宫物帐题记和地宫石函等分别刻有“像法更有八年入末法”或“像法只八年”字样。这是关于佛教正、像、末三时的记述。

世尊圆寂后，佛教徒便以佛为本，立正法、像法、末法三时。佛祖去世，而法仪未改，有教有行，有证得正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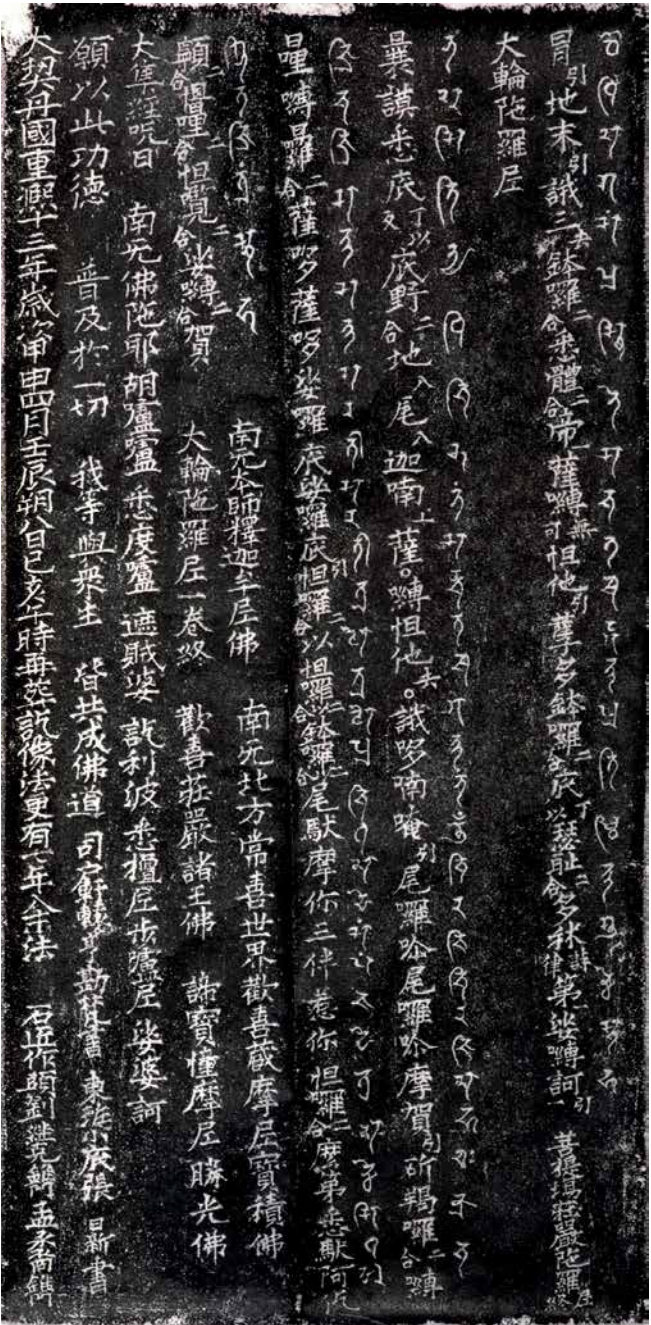


图 10 经幢第四节幢身部分经文

是为正法时。像者似也,道化渐讹替,而真正之法仪行仪不行,无正果者,但有教有行,像似之佛法通行,名为像法。末者微也,佛法转为微末,唯有其教,而无行无正果者,是为末法时。关于三时时限,《大悲经》说末法一万年,别无异说,而正法、像法之时限,佛经说法不一,大体有四种：一、正法、像法各一千年(《大悲经》和《善见律》之说);二、正法、像法各五百年(《大乘三聚忏悔经》之说);三、正法一千年,像法五百年(《悲华经》之说);四、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

年(《大集月藏经》、《贤劫经》、《摩耶经》等之说)。我国中古以来诸德依用的是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之说。辽人亦取此说。辽重熙十二年即公元 1043 年,再加 8 年,或重熙十三年即 1044 年,再加 7 年,到重熙十二年即公元 1051 年,为像法末年。此后开始进入末法时代。如按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年往上推算,则公元 51 年是像法初始之年,公元前 450 年是正法初始之年,亦即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圆寂之年。

关于世尊生卒年代,由于古印度典籍没有明确的记载,各国所传和学者研究,一般都是从佛教本身的史籍去考证,并从卒年推算的。因此说法不一,最早一说和最晚一说相距达数百年。但据朝阳北塔所刻辽代题记推算,辽人关于世尊生卒年代的说法又有不同。如前所述,公元前 450 年是世尊圆寂之年,其生年则是公元前 529 年。天宫门前物帐碑题记刻有“世尊灭□□□□百九十二年,第三□□□”^[3],另在天宫西壁石板上也刻有“……百九十二年,第……”字样^[4],石刻文字虽然剥蚀不清,但结合其他题记内容,原句仍可补充完整,应为“世尊灭【寂后一千四】百九十二年,第三【度重修】”。天宫乃重熙十二年(1043 年)重葬,由此上推一千四百九十二年,为公元前 449 年,那么世尊卒年则是公元前 450 年,生年为公元前 529 年。

由朝阳北塔辽代题记推算出来的辽人关于世尊的生卒年代,为探讨世尊生卒年代增加了一种新的说法。

3. 关于佛、菩萨雕像与曼荼罗问题

经幢八角座雕刻内容为佛、菩萨、飞天、伎乐、八大灵塔等。其雕刻技艺之精湛娴熟,水平之高超,在辽代石雕作品中堪称珍品。

关于佛、菩萨造像。第二节幢身之八角座刻“过去七佛”图像及佛号。七佛有过去九十一劫三佛(毗婆尸佛、尸弃佛、毗舍浮佛)和贤劫四佛(拘留孙佛、拘那含牟尼佛、迦叶佛、释迦牟尼佛)。过去七佛造像在辽代寺庙、塔幢上比较常见,说明辽人对过去七佛的崇拜还是比较普遍的。

关于第一节幢身之第二层八角座刻的八菩萨名号,诸经说法不一。此八菩萨与《八大菩萨曼荼罗经》《八大菩萨经》和《金刚顶经》所载基本相同,而“观世音”称“观自在”,“弥勒”称“慈氏”,“文殊师利”称“曼殊室利”或“妙吉祥”,“执金刚主”称“金刚手”,均属于梵文音译不同或菩萨的异

名。唯“止诸障菩萨”,诸经不载,应为佛经中所称的“除盖障菩萨”,因二者释义相同。“止诸障”当是辽代佛教信徒对此尊菩萨的又一称谓。

辽人将所雕菩萨像称为“八菩萨坛。”“坛”又称“坛城”,“坛场”,是梵语“曼荼罗”的意译,安置诸尊于坛内,以祭供者。曼荼罗坛是密教所特有的仪轨。密教是唐开元年间,从印度传入中国的,并发展成为中国佛教的一个重要流派。辽国境内密教特别盛行,现在北塔所在的延昌寺便是密教寺院。密教修法主要是“三密相应”,即手结契印,口诵真言(咒语),心观佛尊,便可即身成佛。密教仪轨复杂,对设坛(曼荼罗)分为多种,有四种曼荼罗(包括大、三位耶、法、羯磨四种),金刚界又有九会曼荼罗。经幢座上雕刻的图像,不仅八尊菩萨像组成一个曼荼罗坛,第二节幢座的过去七佛和执金刚神众也是曼荼罗坛场。北塔天宫、地宫和舍利塔塔身等所雕刻图像,都是曼荼罗坛。广而言之,朝阳北塔以及大部分辽塔,塔身上雕刻的佛、菩萨像,须弥座雕刻的法器、梵字母(诸佛之种子)等,都是密教曼荼罗坛场。由此可知,密教在辽代特别盛行,得到辽统治者和普通民众的广泛信仰。

4. 关于伎乐图像

第一节幢身之第一层八角座雕刻飞天和伎乐图像。佛经上说飞天象征着吉祥如意,幸福美好,是极乐世界专门传播香气的神,善飞舞能奏乐。但这里所表现的是戴着璎珞和臂钏,挽着彩带,手持莲枝或其他供物,于空中飞舞的飞天。

幢座伎乐图像有乐工 8 人,每人弹奏一种乐器,共 8 种,有大鼓、细腰鼓、横笛、箫(竖笛)、篪、笙、排箫、拍板。北塔须弥座也雕刻伎乐人物,有舞伎 16 人,乐工 16 人,演奏 16 种乐器。除以上 8 种外,还有琵琶、曲颈琵琶、琴、方响、碎子等。这些乐器既有大乐乐器,又有散乐乐器,可按音乐要求组合,演奏辽代的国乐、雅乐、大乐、燕乐、散乐、饶歌、横吹乐等。

然而,这里的乐工演奏的却是佛曲,反映了当时寺庙音乐的繁荣。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僧人为了宣传教义,把音乐当作最有力的宣传工具,采取歌舞形式演奏佛曲梵呗,唱诵佛经。为了吸引更多的中国观众,达到更好的宣传效果,更多的中国僧人在本国传统的宫廷音乐和民间音乐基础上,吸收外来音乐文化,创作新的佛曲,用群众所喜闻乐见的音乐形式去演唱。随着佛教的发展,这种寺庙音乐文化到南北朝

时已经非常繁荣了,如北魏杨衒之在《洛阳伽蓝记》中记载洛阳景元寺“常设女乐,歌声绕梁,舞袖徐转,丝管廖亮,谐妙如神。得往观者,以为至天堂”。唐代佛教盛行,都市中的寺院往往是戏场之所在,成为城市文化生活的娱乐中心。辽统治者视佛教为国教,佛教之发展可以说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寺院梵塔,遍及辽境。由各地遗存的塔、幢伎乐图像可以想象,当时“妙伎杂乐”的寺庙音乐非常之繁荣,吸引听者的魅力非常之大。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这些伎乐图像所表现的正是辽代伎乐的组合、编配的基本形式。《辽史·乐志》第二十三记载:“辽有国乐,有雅乐,有大乐,有散乐,有饶歌、横吹乐。”辽代“八音器数,大抵因唐之旧。”辽代音乐,基本上是在契丹族民族乐舞的基础上,吸收了唐、五代(特别是后晋)和西域的音乐文化传统,创造了契丹民族乐舞体系,即《辽史》所说的“犹先王之风”的国乐。朝阳北塔须弥座和经幢上所雕刻的伎乐,实际上就是辽代一部伎乐队,充分反映了契丹民族乐舞文化的丰富多彩,为研究包括辽代在内的中国古代音乐史提供了实物资料。

注 释

- 张剑波、王晶辰、董高:《朝阳北塔的结构勘察与修建历史》,《文物》,1992 年第 7 期。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北塔博物馆:《朝阳北塔考古发掘与维修工程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 年。
- 朝阳北塔考古勘察队:《辽宁朝阳北塔天宫地宫清理简报》,《文物》1992 年 7 期,第 23～28 页。
-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北塔博物馆:《朝阳北塔考古发掘与维修工程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 年,第 67 页。
- 同[3],第 83 页。

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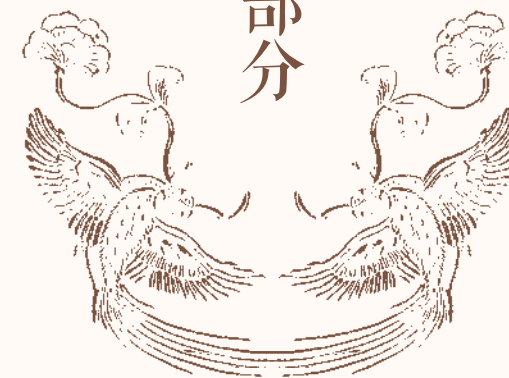
契丹家住云沙中，耆车如水马如龙。
春来草色一万里，芍药牡丹相映红。

契丹，一个中国历史上的北方民族，草绿花红中牵车策马，穹庐毡帐里奏乐起舞；春水秋山，鹞健鹅肥，相地卓歇，以时捺钵。

然而，在如画的边地风光的另一面，是契丹人一段叱咤风云的历史：公元 907 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国，至 1125 年天祚帝耶律延禧为金兵俘虏，其后耶律大石建西辽，于 1218 年亡于蒙古，契丹族的政权延续了三百余年。其盛时，曾势压后晋而得幽云十六州，与宋争锋而屡挫对手，四面所及，一时俱服。大辽“五京”也随之次第而建。

五京并峙，见证了契丹人雄踞北国、虎视中原的历史进程。在大辽五京巍峨宫阙、繁华市井的背后，时代更迭中的天下分合之势、王朝盛衰之由、族群融合之情、礼俗信仰之状等无不贯穿其中。五京，不仅仅上演五京的故事……

第一部分



丨五丨京丨备丨焉丨

“太宗以皇都为上京，升幽州为南京，改南京为东京，圣宗城中京，兴宗升云州为西京，于是五京备焉。”

《辽史·地理志一》

辽代设立五京：上京临潢府、中京大定府、东京辽阳府、南京析津府、西京大同府。又以五京为中心，划分统治区域为五道。《辽史》记载称：“上京为皇都，凡朝官、京官皆有之。余四京随宜设官，为制不一。大抵西京多边防官，南京、中京多财赋官。”这种记录虽有所偏差，但是也反映出五京呈现多中心发展态势，又有所分工。

临潢天府：辽上京

上京临潢府，在今天内蒙古巴林左旗。918年（神册三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以礼部尚书康默记充任版筑使，营建城邑，百日而成，称为皇都。随着辽朝南掠中原、东平渤海战争的节节胜利，俘虏的人口大大充实了新兴的皇都，于是在天显元年（926年）和天显六年（931年）两次大规模扩建皇都。会同元年（938年），辽太宗耶律德光将之更名为上京，府曰临潢。

◎辽上京的地位

《辽史》这样描述辽上京的地位：“上京，太祖创业之地。负山抱海，天险足以为固。地沃宜耕植，水草便畜牧。金甌一箭，二百年之基，壮矣。”

◎上京城规模

《辽史》记载：“（上京）城高二丈，不设敌楼，幅员二十七里。门，东曰迎春，曰雁儿；南曰顺阳，曰南福；西曰金凤，曰西雁儿。其北，谓之皇城，高三丈，有楼橹。门，东曰安东，南曰大顺，西曰乾德，北曰拱辰。中有大内。内

南门曰承天，有楼阁；东门曰东华，西曰西华。”

辽天庆十年（1120年），“金人攻陷上京路，祖州则太祖阿保机之天膳堂，怀州则太宗德光之崇元殿，庆州则望圣、神仙、坤仪三殿，乾州则凝神宣福殿，显州则安元安圣殿，木叶山之世祖享殿、诸陵并皇妃子弟影堂焚烧略尽，发掘金银珠玉器物”，遭受极大破坏的上京城渐渐荒废。

辽上京遗址位于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东南。为了进一步认识辽上京城址的布局和沿革，促进对辽上京遗址的有效保护，推进辽上京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和“辽上京和辽祖陵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二队和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的辽上京考古队于2014年5~10月，组织对辽上京宫城进行了全面的考古钻探，年度勘探面积约80万平方米。本次考古勘探和发掘，首次确认了辽上京宫城的准确位置和四至，更正了以往对宫城范围的错误推测，为研究辽上京城址布局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同时也对辽上京宫城城墙的营建做法、形制结构及其年代等有了初步了解，并明确了辽上京宫城西门的位置、形制结构及其沿革。



辽上京遗址乾德门航拍图



辽上京城示意图

契丹大字银币

直径 3.5 厘米，厚 0.2 厘米
辽上京皇城外西二里出土
巴林左旗辽上京博物馆藏

1977 年 6 月在辽上京遗址出土的契丹银币，正面有四个阳文契丹大字，为原铸，背面有八个阴文契丹大字，每两个字一组，为后刻。与该银币正面铭文完全相同的契丹铜币曾有过出土，但背面无字。该币似不作为流通钱币，而是用作某种盛典的厌胜钱。有专家把银币正面四个契丹大字考释为“天朝万顺”，其顺序是上－下－左－右。



上京都残石

高 20 厘米，宽 15 厘米，厚 8 厘米
辽上京汉城出土
巴林左旗辽上京博物馆藏

陶方砖

边长 40 厘米
征集
巴林左旗辽上京博物馆藏



陶板瓦

高 6 厘米，长 32 厘米，宽 25 厘米
辽上京皇城出土
巴林左旗辽上京博物馆藏



陶筒瓦

高 8 厘米，长 40 厘米，宽 15 厘米
辽上京汉城出土
巴林左旗辽上京博物馆藏



陶滴水

高 8 厘米，长 32 厘米，宽 25 厘米
辽上京汉城出土
巴林左旗辽上京博物馆藏



琉璃建筑饰件

高 7 厘米，长 25 厘米，宽 25 厘米
辽上京皇城出土
巴林左旗辽上京博物馆藏



琉璃建筑饰件

残高 10 厘米，残长 25 厘米，残宽 20 厘米
辽上京皇城出土
巴林左旗辽上京博物馆藏



铜铎

高 19 厘米
征集
巴林左旗辽上京博物馆藏

铎是一种摇奏体鸣乐器，《说文解字》：“铎，大铃也。”在宋辽时期，铜铎还用于仪仗。宋代孟元老在其著作《东京梦华录》冬至日皇帝至太庙时的“驾行仪卫”条目下记载：“或数十人唱，引持大旗而过者，或执大斧者，胯剑者，执锐牌者，持镪棒者，或持竿上悬豹尾者，或持短杵者，其矛戟皆缀五色结带铜铎。”



白釉荷花荡舟盘

直径 25 厘米
查真干哈达苏柏音宝力格嘎查出土
巴林左旗辽上京博物馆藏

白釉印花盘，盘心印荷花荡舟图。也有专家认为此盘为金代。



骨刷（2件）

- ① 长 25 厘米，宽 1.5 厘米，厚 0.8 厘米
- ② 长 13.5 厘米，宽 1 厘米，厚 0.5 厘米

辽上京汉城出土
巴林左旗辽上京博物馆藏

1990 年春，在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辽上京遗址南约 20 公里的山谷中发现一座辽代壁画墓。壁画中有一女性俯身整理矮桌上木盘器具。木盘中有一长柄骨刷，两件扣盖瓷盒和一把木梳。骨刷与梳妆器物放置一处，可能是化妆用具。另一种看法认为骨刷为牙具，宋辽时期有一种称为“刷牙子”的牙刷。北宋人温革撰《琐碎录》载：“早起不可用刷牙子，恐根浮兼牙疏易摇，久之患牙痛，盖刷牙子皆是马尾为之。”而在南宋严用和《严氏济生方》中，作者提到：“每日清晨以牙刷刷牙，皂角浓汁揩牙，旬日数更，无一切齿疾”，可知当时有刷牙和揩牙两种牙齿保护方法。



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辽墓壁画《梳妆侍奉图》（局部）



骨簪（2件）

- ① 长 6 厘米 宽 1.2 厘米
- ② 长 15 厘米 宽 0.8 厘米

辽上京汉城出土
巴林左旗辽上京博物馆藏



击腰鼓人物玉饰

高 4 厘米，宽 4.5 厘米，厚 0.8 厘米

辽上京汉城出土

巴林左旗辽上京博物馆藏

牌饰上线刻一人，盘腿而坐，双手做击打腰鼓状。胳膊上缠绕一飘带。这种腰鼓可见于敖汉四家子镇羊山 3 号墓天井南壁东侧壁画及宣化下八里辽墓。



河北宣化下八里辽墓壁画（局部）



契丹文篆书陶印

边长 8 厘米

辽上京汉城出土

巴林左旗辽上京博物馆藏

辽阳奥壤：辽东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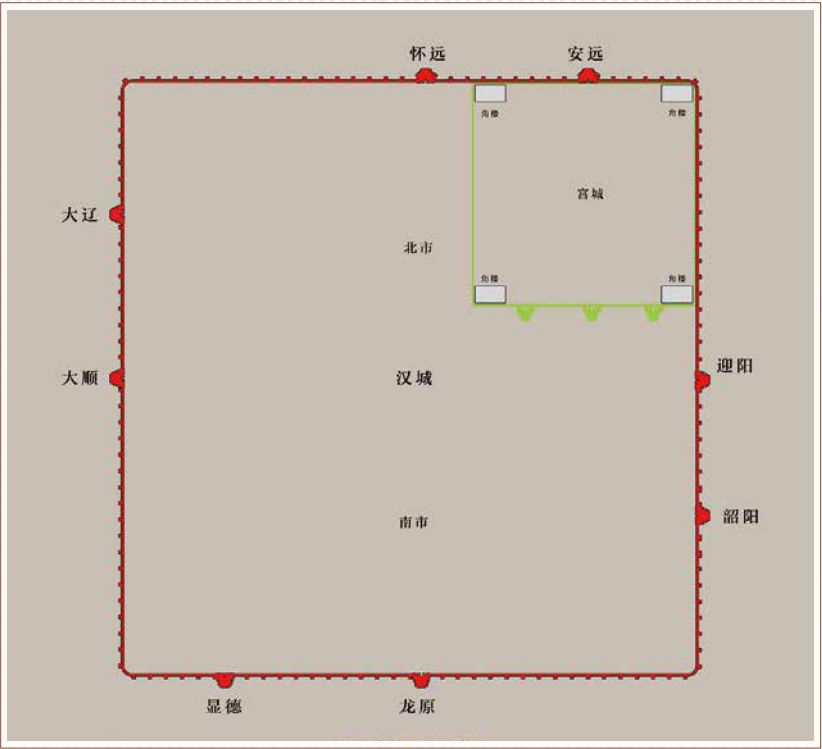
东京辽阳府，在今天辽宁辽阳市。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攻灭渤海国，以渤海故地为东丹国，立长子人皇王耶律倍为国主。神册四年（919 年），修葺辽阳故城，迁入部分渤海人和汉人，建立东平郡。天显三年（928 年），升东平郡为南京。会同元年（938 年），辽太宗耶律德光改东京为南京，府曰辽阳。

据《辽史》记载：“（辽东京）城曰天福，高三丈，有楼櫓，幅员三十里。八门：东曰迎阳，东南曰韶阳，南曰龙原，西南曰显德，西曰大顺，西北曰大辽，北曰怀远，东北曰安远。”

“宫城在东北隅，高三丈，具敌楼，南为三门，壮以楼观，四隅有角楼，相去各二里。宫墙北有让国皇帝（指耶律倍）御容殿。大内建二殿，不置宫嫔，唯以内省副使、判官守之。”

“外城谓之汉城，分南北市，中为看楼，晨集南市，夕集北市。”

天庆六年（1116 年），东京裨将、渤海人高永昌拥兵自立，并占据 50 余州。辽天祚帝先后派张琳、耶律淳募兵镇压。高永昌遣使向金求援，希望联金灭辽，被金拒绝。四月，金太祖命斡鲁统率军进攻高永昌。不久，金军攻占东京。



辽东京城示意图

耶律羽之墓考古发掘

1992 年 7 月 27 日，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罕苏木苏木朝克图山一座大型辽墓被盗，随后确认墓主人为辽东丹国左相耶律羽之。同年 8 月末至 10 月初，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赤峰市博物馆、阿鲁科尔沁旗文物管理所，对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耶律羽之，字寅底晒。辽太祖经营之初，即参与军谋。天显元年，辽太祖平定渤海，立皇太子耶律倍为东丹王，耶律羽之为中台省右次相，管理东丹国。辽太宗即位后，耶律羽之上表章，建议将渤海遗民迁徙到梁水：“渤海昔畏南朝，阻险自卫，居忽汗城。今去上京辽邈，既不为用，又不罢戍，果何为哉？先帝因彼离心，乘衅而动，故不战而克。天授人与，彼一时也。遗种浸以蕃息，今居远境，恐为后患。梁水之地乃其故乡，地衍土沃，有木铁盐鱼之利。乘其微弱，徙还其民，万世长策也。彼得故乡，又获木铁盐鱼之饶，必安居乐业。然后选徙以翼吾左，突厥、党项、室韦夹辅吾右，可以坐制南邦，混一天下，成圣祖未集之功，贻后世无疆之福。”

辽太宗接受他的建议，迁徙渤海遗民于辽阳，并建立东京。

错金鎚形铁器

长 14.4 厘米，宽 1.7 厘米

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鎚形器器身弧圆，略呈“S”形，中部有圆孔。通体镌刻羽翅纹，并镶金丝打磨。该器做工精致，似为仪仗用器。



曲柄铁斧

通长 27.7 厘米，厚 1.4 厘米

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斧身扁平，顶部两端凸起，中部有 4 个“8”

字形穿孔，扇形刃。斧柄曲折，环首。



白釉鸡冠壶

高 30.4 厘米，口径 7 厘米，
腹径 27 厘米，底径 11.7 厘米
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鸡冠壶直流，半口形提梁，扁圆腹，平底，流底部饰一周圆凸棱。



褐釉鸡冠壶

高 28.8 厘米，口径 4.1 厘米，
腹径 27 厘米，底径 13 厘米
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鎏金木雕坐狮（2件）

通高 15.6 厘米，宽 7 厘米
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鎏金木狮端坐于莲座上，下有插杆。雕刻浑然一体，金光四溢。



白釉盘口穿带瓶

高 37.3 厘米，口径 12.8 厘米，
腹径 23.5 厘米，底径 12.5 厘米
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瓷瓶盘口细长颈，圆腹弧收，圈足略外张。两侧肩部与腹底有对称桥形带穿，之间为带槽。肩部饰三周凹弦纹，圈足内底亦施釉。



绿釉方砖

边长 36 厘米，厚 6 厘米
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耶律羽之墓满铺铺地砖，砖分两层，底层用普通青方砖和红色长方砖，表层为带有花卉、昆虫图案的绿色琉璃方砖。



“万岁台”鎏金盃花银硯盒

通高 7.6 厘米，长 18.4 厘米，宽 11~13.6 厘米
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硯盒平面略呈梯形，盒身内套一层素面银片，盒底有花式足 13 个，周边鑿刻忍冬卷草纹。盒盖盪顶，正面下端鑿刻波涛纹，中部模冲腾龙，三枝立莲穿绕于龙身，其中一朵盛开，经龙嘴衔立于龙头顶部，花蕊之上竖刻“万岁台”3 字，上端鑿刻远山浮云，一轮骄阳冉冉升起。盒盖四边鑿刻牡丹、环形花纹，仅在纹样上局部鎏金。盒内装箕形石砚。



摩羯形金耳坠（1对）

通高 4.4 厘米，宽 3.5 厘米
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摩羯形嵌松石金耳坠

通高 4.4 厘米，宽 4.4 厘米，厚 1.6 厘米
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金耳坠模冲成形后对接而成，中空，表面细部镌刻纹饰。摩羯形为双角龙首，鱼身卷曲。镂空处镶嵌绿松石装饰。

摩羯是印度神话中的一种长鼻利齿、鱼身鱼尾的动物，汉译作摩羯、摩伽罗等。4 世纪时，它的形象随着佛教而传入中国。摩羯纹是唐代金银器上常见纹饰：龙首鱼身、带翅带鳍、长鼻上卷、大眼圆睁。契丹人对摩羯纹也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在宋的境内，摩羯纹则相对式微。



龙首缠枝牡丹纹金镯（1对）

直径 6.1 厘米，宽 1.2 厘米，厚 0.1 厘米
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金镯镯体扁宽，正面中心镌刻盛开的牡丹，侧枝蔓延。两旁各有一只振翅莺鸟。两端模冲龙首。

盾形金戒指（5件）

面长 2.4 ~ 3.6 厘米，宽 1.6 ~ 1.9 厘米
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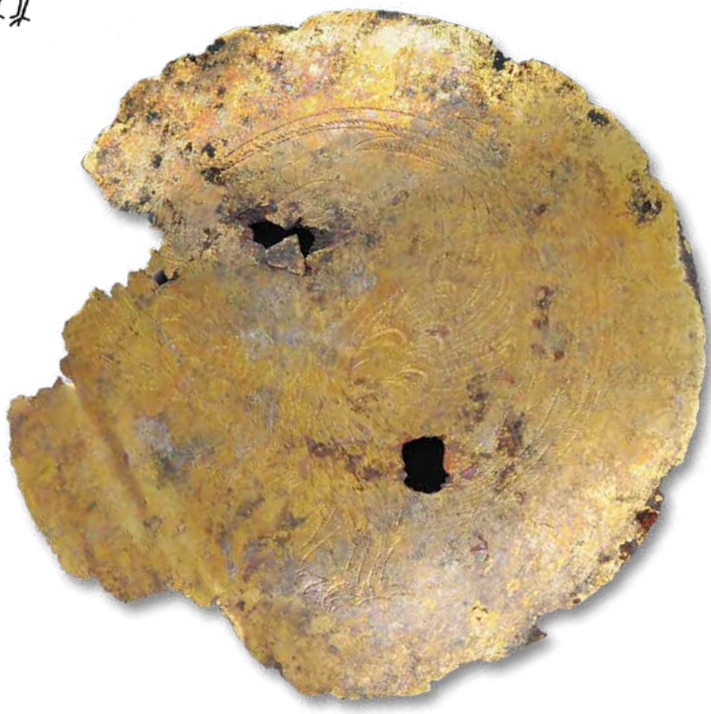


“三足乌” 鎏金铜圆形饰片

直径 9.8 厘米，厚 0.03 厘米
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三足乌” 鎏金铜圆形饰片背面弧凹，中心残留纽痕。
正面中心镌刻 “三足乌”，双翅伸展，修尾弯翘，三足而立。三足乌是中原神话传说中驾驭日车的神鸟。



花式口金杯

高 3 厘米，口径 7.7 厘米，底径 4.2 厘米
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金杯圆口，腹弧分为五瓣，圈足。内外均镌刻纹饰。内沿一周饰宝相莲瓣纹，内底双鱼水波纹。外腹为五组对雁衔花纹。圈足饰宝相莲瓣纹。



鎏金缠枝纹银盘

高 3.5 厘米，口径 18.4 厘米，底径 11.5 厘米
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银盘口沿立折，呈五曲形，内平沿，壁斜垂，内底平缓，圈足外张。内沿镌刻牡丹纹，腹壁饰宝相莲瓣纹，盘底中心双凤飞舞，周围为缠枝花卉。圈足镌刻一周宝相莲瓣纹。

鎏金錾花孝子图银壶

高 14.8 厘米，口径 7.6 厘米，底径 7.1 厘米

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银壶圆唇外卷，高领，肩部出棱，圆腹，平底。通体錾花纹，主体纹饰为八幅孝子故事图，颈、腹部各四幅，周围饰以花卉图案。腹底为如意纹。故事分别为“闻雷泣墓”“刻木事亲”“埋儿奉母”“扼虎救父”“卧冰求鱼”“拾葚供亲”“戏彩娱亲”等。



鎏金錾花人物纹盃耳银杯（1对）

高 6.4 厘米，口径 7.3 厘米，腹径 5.2 厘米，底径 3.9 厘米

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对雁团花纹金花银唾盂

高 14 厘米，口径 18 厘米，
腹径 13 厘米，底径 9.5 厘米
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银唾盂盘口，直领，鼓腹，圈足略外张。盘口边沿錾刻一周三叶花，盘面为四组团花，盘底一周宝相莲瓣纹。器腹錾四组对雁团花。



河北宣化辽墓壁画
持盂、持拂尘侍吏、启箱侍女图



摩羯纹金花银碗

高 7.1 厘米，口径 23.3 厘米，底径 12 厘米
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金花银碗侈口，方唇沿，弧状收腹，圈足外撇。碗身和圈足分别锤揲而成，焊接在一起。碗的口沿内壁錾刻叶瓣纹，盒联珠纹，碗底錾刻摩羯纹。



银匱

高 5.8 厘米，长 20.9 厘米，最宽 12.9 厘米
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鎏金錾花双狮纹银盒

通高 8.9 厘米，口径 14.6 厘米
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银盒方圆形，花式口，曲腹，圈足。腹部錾刻缠枝花卉。器盖顶部圆凸，纹饰以模压为主，局部錾刻。正面主体纹饰分两层：中心双狮腾跃，花枝缠绕，外围以凸线、联珠、花朵等为边；外层为飞鸟、昆虫、云朵、缠枝组合纹饰，以宝相莲瓣纹作边框。侧边为奔驰的双狮、双鹿、双羊及花卉纹。



玛瑙水晶项饰

周长 85 厘米
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项饰 1 组 51 件，玛瑙管与水晶球间隔，加鸡心形金坠及“T”形管状金坠组成。出土时散落，据陈国公主墓璆珞复原。

琥珀水晶项饰

周长 46 厘米，鸡心形金坠长 2.9 厘米，宽 1.7 厘米
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项饰 1 组 31 件，琥珀串饰与水晶球间隔，加鸡心形金坠及“T”形管状金坠组成。出土时散落，据陈国公主墓璆珞复原。



海兽纹铜镜

直径 18 厘米，厚 1.2 厘米
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铜镜窄斜沿，圆纽。镜面光洁，镜背模铸繁密纹饰，以一周凸棱分界，内圈饰海兽纹，外圈为 32 字楷体铭一周，铭曰“练镜神冶，莹质良工，如珠出匣，似月停空，当眉写翠，对脸傅红，绮窗紉（xún）晃，俱含影中”，为四言诗体，意韵俱佳。



辽阳江官屯窑

江官屯窑址群位于辽阳市文圣区小屯镇江官屯村，这是对该窑址群的泛称。分布范围东到小孤家屯、西到英守村、南到山脚下、北到灯塔市西大窑镇的下缸窑村，面积达 10 余平方公里。2013 年 7 月至 2014 年 10 月，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位于太子河南岸台地上的一处窑址（江官屯窑址一号地点）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 700 余平方米。共发现瓷窑 12 座，发掘 11 座、灰坑 80 余个、房址 3 座、作坊址 3 座，发掘出土百万计的瓷片。从产品釉色类别看，除高温的白瓷外，还有低温铅釉器物，后者以琉璃建材为主，可以判断该窑场在辽代当和官府有关；在白瓷、柿红釉瓷、黑瓷中都有一部分精品，说明该窑场的产品不全是粗瓷，这是以往未知的新发现。

白釉梅瓶

高 29 厘米，口径 8.4 厘米，
底径 11.2 厘米，腹径 19.7 厘米
1978 年辽阳江官屯出土
辽阳市博物馆藏



白釉暗花如意云纹花口碗

高 3.2 厘米，口径 8.8 厘米
1959 年辽宁省博物馆拨交
辽阳市博物馆藏

碗口呈花口，斜腹，圈足，胎质细腻，釉面光洁。



白釉花式碗

高 4.8 厘米，口径 12 厘米，底径 4.6 厘米
2010 年辽阳城内彭公馆采集
辽阳市博物馆藏

碗口呈花口，斜腹，圈足，胎体较薄，外施半釉，露出暗红色胎，釉面较为光洁。



白釉铁彩花卉纹钵

高 12.5 厘米，口径 22.4 厘米，底径 10.5 厘米
1978 年辽阳江官屯出土
辽阳市博物馆藏

钵器形状上直下收，胎体薄而轻盈，钵口一弦纹，外施釉不及底，钵身绘铁彩花卉，叶脉舒张，生机盎然。



匣钵

高 11.5 厘米，口径 30.1 厘米，底径 27.1 厘米
2007 年社会捐赠
辽阳市博物馆藏

匣钵，黄褐色釉，直筒，平底，是烧窑的装烧器具。套烧工艺在江官屯窑址使用广泛，较大的碗、罐之类都可作套烧精细瓷器的用具，而匣钵等专门的装烧用具较为少见。



白釉铁彩草叶纹注壶

高 10.7 厘米，口径 2.4 厘米，底径 5.3 厘米
2009 年社会捐赠
辽阳市博物馆藏

注壶壶身压腰，上壶身类半球状，下壶身扁圆球状，断直流口，持柄为双扭绳状，下端与下壶身呈斜切线引出。白釉，施釉不到底。壶身饰铁彩草叶纹。



瓷马

高 3.6 厘米，长 7.7 厘米，宽 3.1 厘米
辽阳江官屯出土
辽阳市博物馆藏

白釉钵

高 15 厘米，口径 20 厘米，底径 9.4 厘米
1978 年辽阳江官屯出土
辽阳市博物馆藏

钵器形状上直下收，圈足，胎体轻薄；钵口一弦纹，外施釉不及底，流釉四下，内施釉仅在口部，露出胎体。



燕台翼京：辽南京

辽南京在今天北京市内。公元938年（天显十三年），从儿皇帝石敬瑭手中获得了燕云十六州后，辽太宗耶律德光升幽州为南京，称幽都府，后以燕地分野“寅”为“析木之津”，而改称“析津府”。南京是辽统治区中最繁荣富庶的区域，有“兵戎冠天下之雄，与赋当域中之半”的说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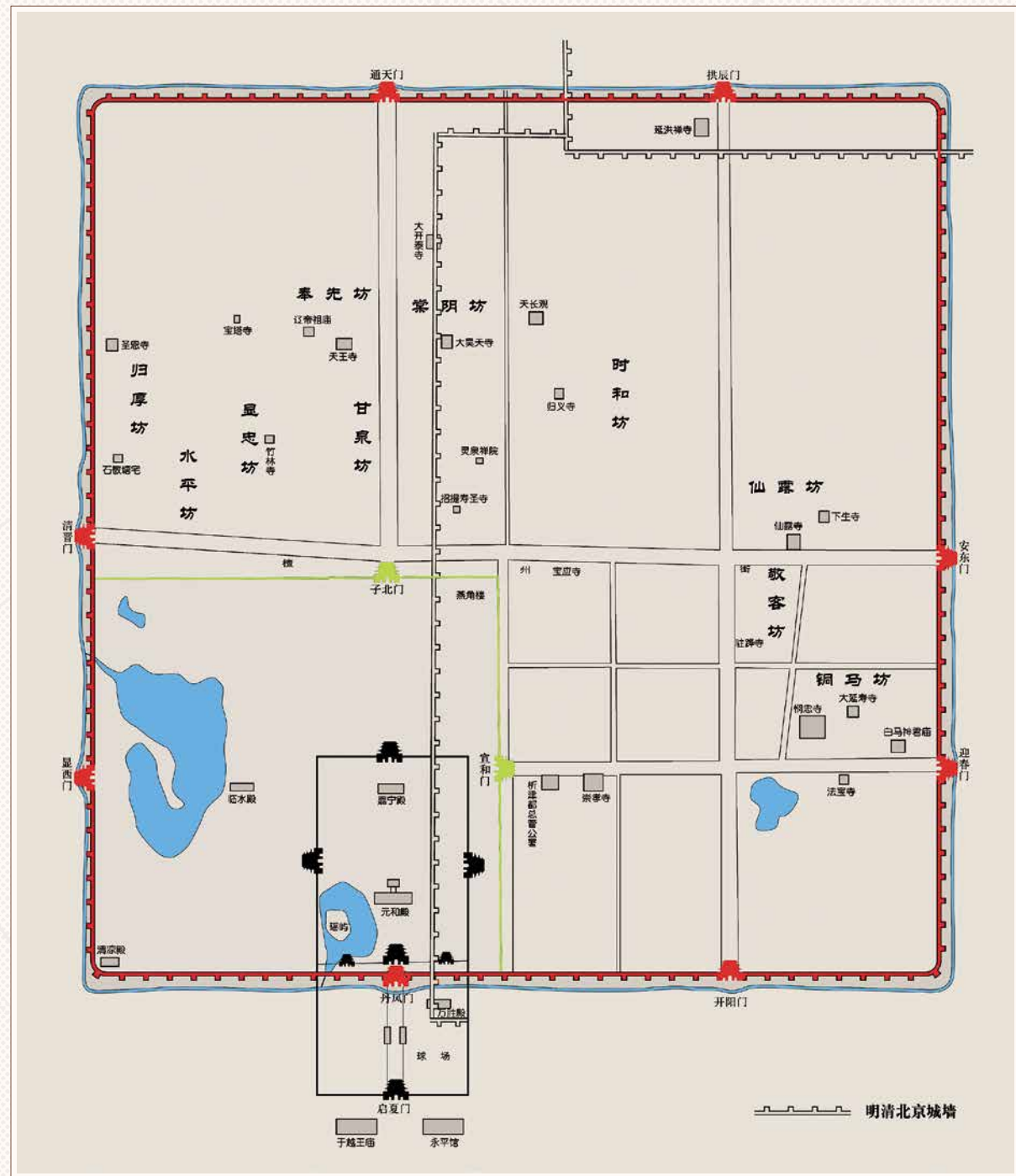
◎ 《辽史》所载南京城

“城方三十六里，崇三丈，衡广一丈五尺。敌楼、战櫓具。八门：东曰安东、迎春，南曰开阳、丹凤，西曰显西、清晋，北曰通天、拱辰。大内在西南隅。皇城内有景宗、圣宗御容殿二，东曰宣和，南曰大内。内门曰宣教，改元和；外三门曰南端、左掖、右掖。左掖改万春，右掖改千秋。门有楼阁，球场在其南，东为永平馆。皇城西门曰显西，设而不开；北曰子北。西城巔有凉殿，东北隅有燕角楼。坊市、廨舍、寺观，盖不胜数。其外，有居庸、松亨、榆林之关。古北之口，桑乾河、高粱河、石子河、大安山、燕山，中有瑶屿。府曰幽都，军号卢龙，开泰元年落军额。统州六、县十一。”

◎北宋使者记载的南京城

1008年，北宋派遣使者路振出使辽国，返回北宋后，他将使辽沿途见闻汇为《乘轺录》并上之于朝廷。他记载南京城说：“幽州幅员二十五里。东南曰水窗门，南曰开阳门，西曰清音门，北曰北安门。内城幅员五里，东曰宣和门，南曰丹凤门，西曰衙北门。内城门不开，止从宣和门入。内城门城中凡二十六坊。坊有门楼，大署其额，有闕(ji)宾、肃慎、卢龙等坊，并唐时旧坊名也。居民棋布，巷端直，列肆者百室。”

保大二年（1122年）十二月，攻陷西京的金军分两路进攻南京。契丹军民撤出南京城，辽知枢密院左企弓、虞仲文等汉官出城投降，金军轻取南京。之后，根据与北宋联金灭辽的盟约，金军将包含南京在内的部分州县交与北宋。北宋短暂治理了三年，在宣和七年（1125年），金与北宋关系破裂，金军兵分两路进攻北宋，东路军再次攻陷南京。



辽南京城示意图

龙泉务窑

手工业是南京城经济发达和繁荣的基础之一，其中陶瓷业非常兴盛。在北京地区有门头沟龙泉务窑、密云小水峪窑和房山磁家务窑等三处窑址。龙泉务窑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龙泉务村，1991 ~ 1993 年，文物部门对该窑址进行了大面积考古发掘，发现窑炉 13 座，七层三期文化层。早期烧造瓷器瓷胎厚、体量大、釉色差且施釉不到底；中期则烧造胎白釉润的细白瓷；晚期出现三彩器。龙泉务窑深受定窑影响，精品与定窑难分轩轻。

白釉花瓣口盏、盏托（2 件）

盏高 4.3 厘米，口径 10.8 厘米，底径 4.7 厘米

盏托高 6.4 厘米，口径 7.2 厘米，底径 5.7 厘米

北京永定门外南苑彭庄辽墓出土

首都博物馆藏



白釉刻菊莲纹葫芦式执壶

高 13.2 厘米，口径 2.5 厘米

北京丰台长辛店辽墓出土

首都博物馆藏

持壶为压腰葫芦形，腹部有斜直短流口，环状回曲把。通体装饰多层菊花与莲瓣纹，釉色白中闪青黄色，是龙泉务窑的精品。



刻花带把蓝玻璃杯

高 18 厘米，口径 9 厘米
旧藏
首都博物馆藏



带把玻璃杯

高 14 厘米，口径 7 厘米
旧藏
首都博物馆藏



乳丁纹白玻璃盘

高 6 厘米，口径 19.3 厘米
旧藏
首都博物馆藏



冶铁遗址

契丹冶金业技术比较发达。据辽史记载：“坑冶，则自太祖始并室韦，其地产铜、铁、金、银，其人善作铜、铁器。又有曷求部者多铁；曷求，国语铁也。部署三冶：曰柳湿河，曰三黜古斯，曰手山。神册初，平渤海，得广州，本渤海铁利府，改曰铁利州，地亦多铁。东平县本汉襄平县故地，产铁矿，置采炼者三百户，随赋贡纳。以诸坑冶多在国东，故东京置户都司，长春州置钱帛司。太祖征幽、蓟，师还，次山麓，得银、铁矿，命置冶。圣宗太平间，于潢河北阴山及辽河之源，各得金、银矿，兴冶采炼。自此以迄天祚，国家皆赖其利。”目前考古界对河北兴隆蓝旗营、河北滦平东沟、河北赤城上仓，辽代饶州城和辽代永安等冶铁遗址进行过田野调查与研究，而对延庆县大庄科乡的矿冶遗址群进行了考古发掘。大庄科乡的矿冶遗址包括矿山5处，冶炼遗址4处，作坊及生活区遗址3处。有学者认为它是目前国内发现的辽代矿冶遗存中保存炼铁炉最多，且炉体保存相对完好的冶铁场所，为认识中国古代冶铁高炉的炉型结构演变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大庄科矿冶遗址群水泉沟居住遗址房址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供图)



大庄科矿冶遗址群水泉沟冶铁炉遗址全景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供图)



铁锄

高 21.5 厘米，长 90 厘米
北京市石景山出土
首都博物馆藏

铁马镫 (1 对)

高 20 厘米，通宽 17.5 厘米
北京市密云出土
首都博物馆藏



云中帝城：辽西京

辽西京在今天大同市内。辽重熙十三年（1044 年），辽兴宗对西夏作战失利后，升燕云十六州之一的云州为西京。据辽史记载：“（西京）广袤二十里。门，东曰迎春，南曰朝阳，西曰定西，北曰拱极。元魏宫垣占城之北面，双阙尚在。辽即建都，用为重地，非亲王不得主之。”

保大二年（1122 年）二月，完颜宗翰率兵追击辽天祚帝。四月，攻陷辽西京。根据华严寺内《大金国西京大华严寺重修薄伽教藏殿碑记》记载，“天兵一鼓，都城四陷，殿阁楼观，俄而灰灭，惟斋堂、厨库、宝塔、经藏、泊守师徒大师影堂存焉。”

“西京仁和坊李让”款八方澄泥砚

长 13.8 厘米，宽 12.3 厘米，厚 2.7 厘米

内蒙古巴林右旗辽庆州城遗址

巴林右旗博物馆藏



澄泥砚墨膛呈椭圆形，周边弦纹一道，砚面微凸；墨池呈扇形花瓣，墨池膛与墨间有流槽。砚底有一椭圆形深槽，中间凹印一题章，两行阳文，右行为“西京仁和坊李让”，左行为“罗土澄湍砚瓦记”。在砚台的发展历史中，端砚、歙砚、洮砚、澄泥砚并称中国四大名砚。



奚地皇都：辽中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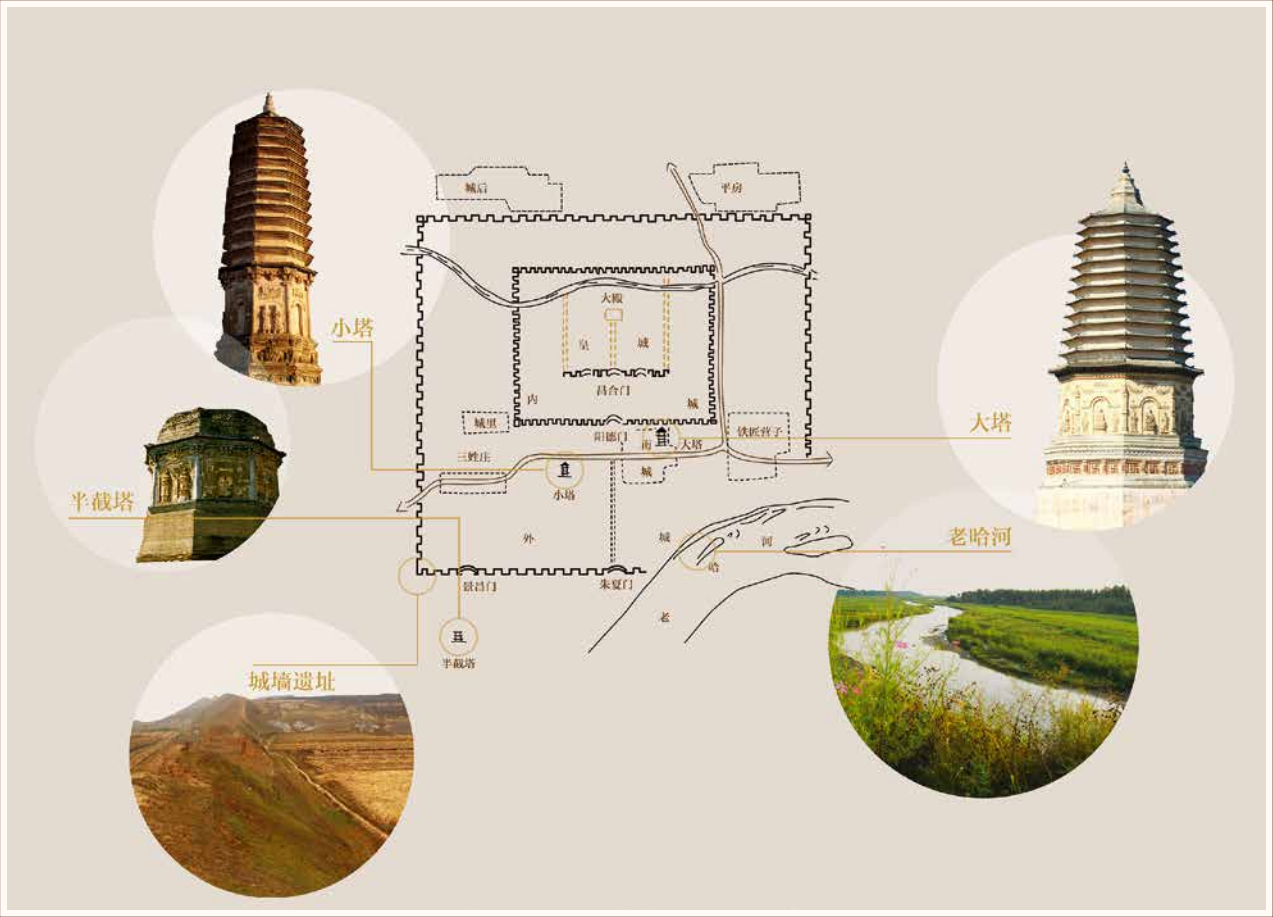
辽中京在今天内蒙古宁城县境内。唐代削平东北割据政权高句丽后，活动于该地的奚人首领可度率众内附，置饶乐都督府。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立政权后，奚人臣服契丹。辽圣宗有一次经过该地的七金山土河一带，向南观望，见云气升腾，仿佛郭（fú）郭楼阙，因而开始讨论建都。从幽州和蓟州两地抽派能工巧匠，经过两年努力，建设了郭郭、宫掖、楼阁、府库、市肆、廊庑等。到统和二十五年（1007年），在奚王牙帐地建立城池，迁徙汉户充实人口，号曰中京，府曰大定。

◎北宋使者路振《乘轺录》记载的中京：

“契丹国外城高丈余……幅员三十里，南门曰朱夏门，

凡三门，门有楼阁。自朱夏门入，街道阔百余步，东西有廊舍约三百间，居民列廛肆庑下。街东西各三坊，坊门相对。……三里至第二重城门，城南门曰阳德门，凡三间，有楼阁，城高三丈，有睥睨，幅员约七里。自阳德门入，一里至内门，曰阊阖门，凡三门。街道东西无居民，但有短墙，以障空地耳。阊阖门楼有五凤，状如京师，大约制度卑陋。东西掖门去阊阖门各三百步，东西角楼相去约二里。”

1121年十二月，金太祖命完颜杲为内外诸军都统，统军南下进攻中京。次年正月，金军连克高州、恩州及回纥城，进至中京城下。辽军不战自溃，金克中京。



陶麒麟走兽

通高 28 厘米，底宽 15 厘米
辽中京遗址出土
内蒙古宁城辽中京博物馆藏

在中国古建筑物的屋顶脊上，常装饰有雕塑。通常屋顶由一条正脊和四条垂脊组成，称为“五脊”；雕塑中又多为兽类，而在汉语中又有六兽的说法。（《玉篇》：“六兽：牛、马、羊、犬、鸡、豕也；养之曰兽，用之曰牲。”）因此，这些脊塑泛指为“五脊六兽”。





龙纹陶瓦当

长 33 厘米，直径 13 厘米，厚 2 厘米
辽中京遗址出土
内蒙古宁城辽中京博物馆藏

瓦当图案为一五爪龙，龙头大颈细，身粗，尾壮而短。
瓦缘与图案以双弦纹分割。

兽面陶筒瓦

长 25 厘米，直径 14 厘米，长 17.5 厘米
辽中京遗址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瓦当纹饰为辽代流行的兽面纹。兽面特征为眉弓高凸，蒜头鼻子，阔口露牙，左右两绺胡须卷曲。在兽面与瓦缘之间以联珠纹和弦纹分割。

瓦当是中国古代建筑上瓦垄的盖头瓦。古代出土文物铭文中自载名为当。前人解释“当”为“底”，瓦当为众瓦之底。实物年代最早的为西周出土瓦当。



莲花纹陶滴水

长 28 厘米，宽 22 厘米
辽中京遗址出土
内蒙古宁城辽中京博物馆藏

滴水瓦当图案为一朵带叶径的花卉。瓦缘与图案以弦纹分割。



莲花纹陶滴水

长 28 厘米，宽 20 厘米，厚 2 厘米
辽中京遗址出土
内蒙古宁城辽中京博物馆藏





陶餮兽

高 36 厘米，宽 37 厘米，进深 19 厘米
辽中京遗址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凤首陶鸱吻

高 17.5 厘米，宽 9.5 厘米，厚 5.5 厘米
辽中京遗址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石雕狮

高 10.5 厘米，长 25 厘米，宽 15 厘米
辽中京遗址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陶文殊菩萨座

高 9.3 厘米，长 11.9 厘米，宽 6.9 厘米
辽中京遗址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三彩刻划石榴纹龟形壶

高 6.2 厘米，通长 29 厘米，龟背直径 24 厘米
辽中京遗址出土
宁城辽中京博物馆藏





100 | 大辽五京

大王记结亲事碑

长 100 厘米，宽 35 厘米，厚 11 厘米

辽中京遗址出土

内蒙古宁城辽中京博物馆藏

这块碑刻于天赞二年（923 年），记载了聘女事 4 件、续聘 1 件、求妇事 9 件，同时又穿插记载了与聘女求妇事有关的买卖牛羊事 4 件。其中所提到的大王可能就是奚王勃鲁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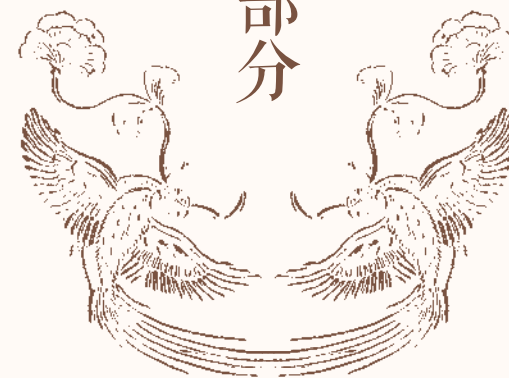
【大王记结亲事碑碑文】

天赞二年五月十五日，记耨免下娉女及求妇据，下却羊马牛等具随头下，分折如后。大王言我年老，我从十六上别父，我弟耨吒年小，并不得父母悉妇，我成长后，遂与弟下羊马牛等，求耨免并儿郎悉妇，并是我与六畜求到，其弟把父母大帐，有好弱物，并在弟处，我处无。记娉安祖哥女与契丹素舍利，所得诸物并在弟耨吒处，合与他者，并还他讫。又记与娄呵阿拔作亲，先娉与女掘劣，所得羊牛马头匹，并是弟耨吒受却据，女掘劣死后，弟耨吒合更与他续亲女，又为自无续亲女与他，我虽是弟兄，我另坐其，娄呵阿不欲绝亲情，遂言与大王羊三百口、牛马卅头匹，求女苏乎酌。大王言，所与我羊马，便准取前掘劣女奥渠吕，元如此言定。昨赤眼年举去来，娄呵阿言，不曾与大王羊马牛，遂却。右赤眼年举与来人眼年窘舍利，同去问苏古阿拔，其苏古阿拔言，实与他大王羊三百、牛马卅头匹，寻大王实言折取前女奥渠吕，今回何讳称不知，如此政对定，遂拈鼻子与瞎年窘舍利把为据。又记娉耨免女挠回折与袍都夷离己，得羊六百口、牛马六十头匹，寻与他金腰带及较具银，衣服绦彩并随女去，诸物并一一还足，并不欠少一件。又记娉啗遐者女与如乎礼太糯羊，得羊五百、牛马五十头匹，合与伊硬软物，衣服绦彩并还足，一无欠少。

（转录自向南、李宇峰：《辽代石刻文续编》，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 年）



第二部分



丨四丨时丨捺丨钵丨

四时捺钵是游牧、渔猎文化在政治领域的一种特殊表现。辽国虽然有五京，但辽国的皇帝并不常住京城，他与重要的朝臣一起，随寒暑、逐水草，巡行于四季捺钵地。捺钵活动除了捕鱼、打雁、狩猎、避暑外，还包括拜天射柳、祭山祀祖、商讨国事、处理政务、接见外国使臣、接纳附属国和附属部族（落）的贡品等政治内容。因此，辽的全国政治中心是流动的，随着皇帝的行踪转移而转移。

◎《辽史》所记载的捺钵

《辽史·营卫志》记载：“辽国尽有大漠，浸包长城之境，因宜为治。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

《辽史·游幸表》记载：“朔漠以畜牧射猎为业，犹汉人之劬农，生生之资于是乎出。自辽有国，建立五京，置南北院，控制诸夏，而游畋之习，尚因其旧。太祖经营四方，有所不暇；穆宗、天祚之世，史不胜数。”北宋使者张舜民所记北人《打围》：“北人打围，一岁间各有所处，正月钓鱼海上，于水底钓大鱼。二、三月放鹞，号海东青，打雁。四月、五月打麋鹿。六月、七月于凉淀处坐。八月、九月打虎豹之类。自此直至岁终，如南人趁时耕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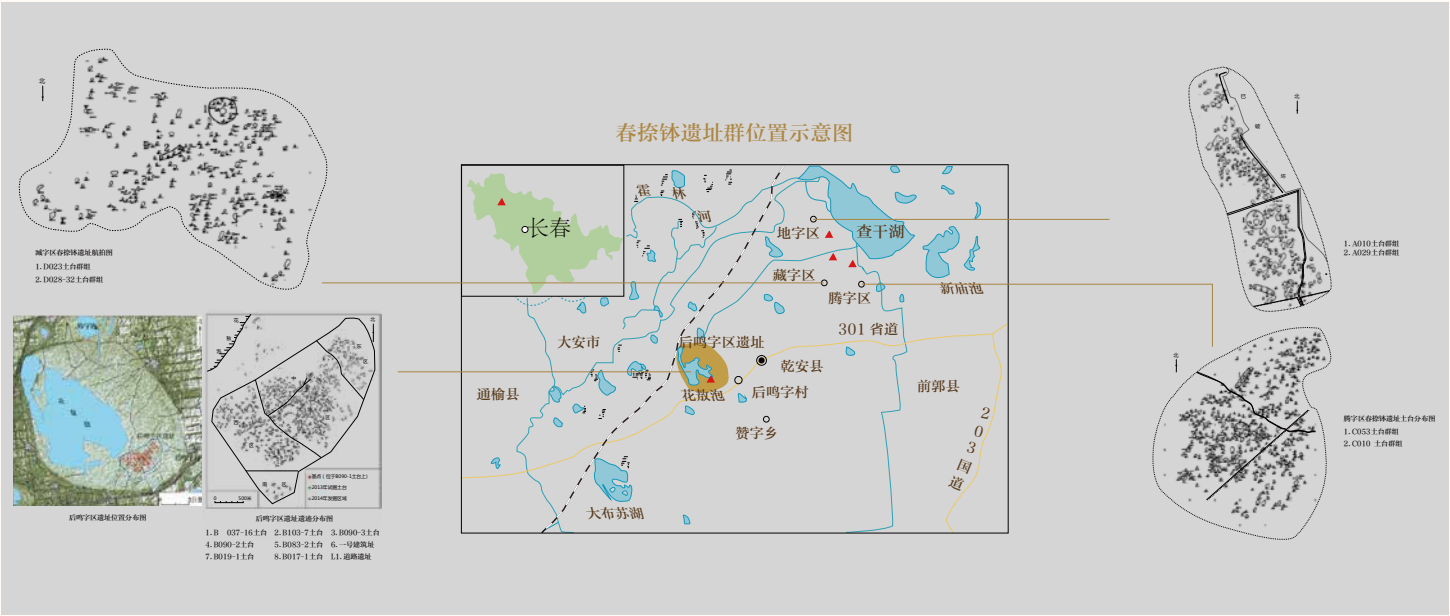
◎辽代四时捺钵地点统计与示意图

吉林省乾安县辽金春捺钵遗址群位于吉林省西北部，于2009 年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时被发现，2012 年，被列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自2013 年以来，后鸣字区春捺钵遗址已进行数次调查和发掘，收获颇丰；2016 年5 月至6 月，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乾安县文物管理所再次对查干湖西南岸的3 处春捺钵遗址进行调查。遗址群共分为后鸣字区、地字区、藏字区、腾

字区四个片区。四个片区均由大小不等的土台组成，后鸣字区遗址发现900 余座土台，遗址东西绵延3 公里，宽1.6 公里，面积约4.7 平方公里；地字区遗址东部遭破坏，残存273 座土台，遗址长约2.2、宽约0.6 公里，面积约1.32 平方公里；藏字区遗址发现292 座土台，遗址长约1.4、宽约0.9 公里，面积约1.26 平方公里；腾字区遗址发现480 座土台，遗址长约1.4、宽约1 公里，面积约1.4 平方公里。

	第一组 (≥16)	第二组(16 > 次数≥8)	第三组(8 > 次数≥4)
春水 主要地点	鸭子江（混同江）鸳鸯 淀、鱼儿冻	春水、春州、 南京、湟河	长冻、土河、东幸、长 春宫、延芳淀、瑞虎原、 千陵、长春河、大鱼冻、 山榆淀
夏捺钵 主要地点	炭山、永安 山	散水原、木叶 山、南京、沿 柳湖、拖古烈、 祖陵、庆陵、 纳葛冻	凉陵、上京、频辔淀、 怀陵、特礼陵
秋山 主要地点	秋山、藕丝 淀、黑岭	庆陵、南京、 平地松林、赤 山、沙岭	木叶山、怀陵、上京、 怀州、中京、祖陵
冬捺钵 主要地点	中京、藕丝 淀	南京、中会川、 木叶山	千陵、上京、太祖庙、 西京、显州、辽河

辽代四时捺钵地点统计



四季山水图

四季山水图绘制于辽庆东陵中室。辽庆陵遗址位于赤峰市巴林右旗博日嘎镇瓦仁乌拉山南麓黑山山谷中，分东陵、中陵和西陵。黑山在辽代称为永庆山，改称庆云山，因而名陵为庆陵。庆陵曾被多次盗掘。1997 年，辽庆陵并入“辽陵及奉陵邑”，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四季山水图壁画绘制于中室，再现了契丹皇室四时捺钵地的优美景色。

春壁画（摹本）

高 310 厘米，宽 240 厘米

辽庆陵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春壁画描绘了大地回春万物复苏的景象，起伏的山坡中间流动着一条刚刚解冻的蜿蜒小溪，溪中游弋着寒鸭、鸳鸯，山间复苏的杂草、美丽的杏花、丛生的嫩柳以及奔跑的小鹿，一派春意盎然、生机勃勃的北国风光。



夏壁画（摹本）

高 310 厘米，宽 240 厘米

辽庆陵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盛夏时节幽深的山谷、郁郁葱葱的树林、湍急奔腾的河水以及身轻体健的梅花鹿和翻飞的燕子，一轮红日在以石青、石绿为主的色调中冉冉升起。



秋壁画（摹本）

高 310 厘米，宽 240 厘米
辽庆陵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秋壁画是保存最好的部分。画面表现山坡，树林、落叶，地上有鹿的追逐与嚎鸣，天空有飞鸟数列，表现了候鸟春去秋归的情景。红色的霜林使秋天的色彩更为鲜艳。



冬壁画（摹本）

高 310 厘米，宽 240 厘米
辽庆陵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寒冷的雪地、寂静的山间、枯树与灌木，在一种灰黄的色调之中，给人“冬山惨淡而如睡”的印象



猎虎图（3件）

- ① 猛虎图：宽 100 厘米，高 65 厘米，厚 11 厘米
 - ② 围猎图：宽 83 厘米，高 40.5 厘米，厚 11 厘米
 - ③ 射猎图：宽 69 厘米，高 39.5 厘米，厚 11 厘米
- 敖汉旗玛尼罕乡七家村 1 号墓出土
内蒙古史前文化博物馆藏

猎虎图绘制于墓葬穹隆顶部，共绘一虎五骑，其中一骑画面脱落，其余四骑中有两骑是在射杀，另两骑只是扬鞭策马，未带弓箭。被围之虎在数骑的围困之下，显得惊恐万状。猎虎为捺钵活动之一。辽道宗曾经射杀过老虎，懿德皇后为作《伏虎林应制》诗：“威风万里压南邦，东去能翻鸭绿江；灵怪大千俱破胆，那教猛虎不投降”，颇有气魄。



①猛虎图



②围猎图



③射猎图

骨鸣镝、铁簇（5件）

铲形通长 15.5 厘米，通宽 3.5 厘米，高 3 厘米

三棱形通长 9 厘米，通宽 4.3 厘米，厚 3 厘米

方头式通长 9 厘米，通宽 5 厘米，厚 1.5 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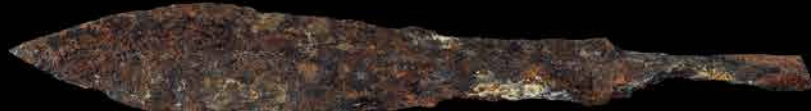
铁簇通长 8.7 厘米，通宽 1.3 厘米

铲形铁簇通长 13.1 厘米，通宽 3.4 厘米

赤峰大营子驸马赠卫国王墓

内蒙古博物院藏

鸣镝，即响箭。西汉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匈奴王冒顿曾经制作鸣镝，以训练士众。有时候也引申代指北方的引弓之民，如《晋书·后妃传论》中说：“中原陷于鸣镝，其兆彰于此焉”，即是一例。



骨鸣镝

残长 7.5 厘米

巴林左旗花加拉嘎乡征集

巴林左旗辽上京博物馆藏



骨鸣镝、箭簇（7件）

残长 2 ~ 11 厘米

巴林左旗浩尔吐、茫图坝等出土

巴林左旗辽上京博物馆藏



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宝山村辽墓壁画（局部）
厅堂图中的鸣镝



带鞘玉柄银锥

锥通长 17.8 厘米，锥鞘长 15 厘米，链长 23 厘米
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镇辽陈国公主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所藏

银锥锥末端圆形中空，圆柱形玉柄嵌入其中。配有鎏金银鞘。史料记载称“国主射猎，领帐下骑，击扁鼓绕泊，惊鹅、鸭飞起，乃纵海冬青击之，或亲射焉。国主皆佩金玉锥，号杀鹅杀鸭锥。”史料还记载了锥子用途及擒获天鹅后的宴会场面：“鹅擒鹅坠，势力不加，排立近者，举锥刺鹅，取脑以饲鹅。救鹅人例赏银绢。皇帝得头鹅，荐庙，群臣各献酒果，举乐。更相酬酢，致贺语，皆插鹅毛于首以为乐。”

带鞘琥珀柄银刀

刀通长 30.4 厘米，刀鞘长 32 厘米，链长 33 厘米
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镇辽陈国公主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所藏

银刀刀身细长，刃部锋利，末端成锥形嵌入琥珀柄中。琥珀柄圆柱形，末端刻一“王”字。配有鎏金银鞘。



铜渔叉

长 35 厘米，宽 10 厘米
巴林左旗白音沟乡出土
巴林左旗辽上京博物馆藏

渔叉为三股式，其不同于农具中的垛叉之处，是叉尖有倒刺，因而可以确认为渔具。《辽史·游幸表》：统和二十年九月，“叉鱼于辽河”。可知捺钵时有以叉捕鱼的活动。除了叉鱼，还有钩鱼活动。法库辽墓出土有铁钩子。张舜民《使北记》说：“正月钩鱼海上，于冰底钩大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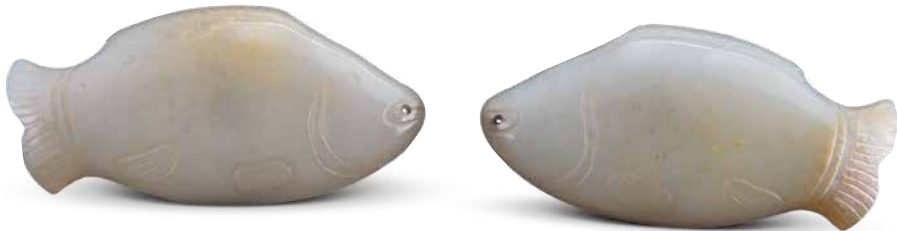
双鱼玉佩

鱼长 6.4 厘米，宽 1.9 ~ 2.3 厘米，厚 0.3 ~ 0.9 厘米
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镇辽陈国公主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鱼形玉盒

盒长 6.5 厘米，宽 3.2 厘米，厚 2 厘米
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镇辽陈国公主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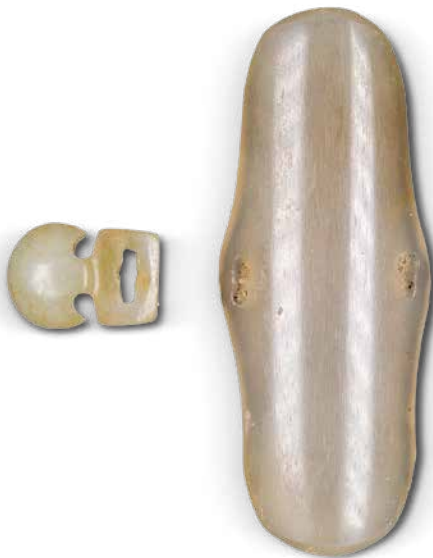
回首鸭形玛瑙饰件

长 3 厘米，高 2 厘米
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镇辽陈国公主墓出土
内蒙古博物院藏



交颈鸿雁玉佩

高 2.5 厘米，长 6.5 厘米，宽 1.6 厘米
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镇辽陈国公主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玉臂鞲

长 7.3 厘米，宽 3 厘米
扣绊长 2 厘米，宽 1.5 厘米
法库县大孤家子乡李贝堡村辽墓
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辽代狩猎放鹰者将臂鞲置于手臂上，以防止被鹰抓伤。
《说文解字》：“鞲，臂衣也”。鞲最早用皮革制作。辽代臂鞲
多为玉石质、金属质。

玛瑙臂鞲

长 8 厘米，宽 5 厘米
赤峰市松山区大夫营子辽墓出土
赤峰市博物馆藏



金线芦雁荷花纹绣片

纵 218 厘米，横 66 厘米
内蒙古巴林右旗短角牛场出土
辽宁省博物馆藏



马球图

高 86 厘米，宽 120 厘米，厚 3 厘米
敖汉旗玛尼罕乡七家 1 号墓出土
内蒙古史前文化博物馆藏

马球运动是捺钵活动之一。我国的“击鞠”活动最早追溯到汉代，三国时期曹植《名都篇》中已经有“连骑击鞠壤，巧捷惟万端”的说法。由于没有物证，无法确定汉代“击鞠”为马球。唐代马球运动盛行，唐章怀太子李贤墓的壁画中有打马球场景。甚至还有女子打球的记载。王建《又送裴相公上太原诗》中载：“千裙白刃兵迎节，十对红妆妓打球”。辽兴，承袭唐风，马球运动同样盛行。金承辽制度，从《金史·礼

志》中记载我们可以知道相关内容，如击球鞠杖的样式：“杖长数尺，其端如偃月”；马球分单球门与双球门：“先于毬场南立双桓，置板，下开一孔为门，而加网为囊，能夺得鞠，击入网囊者为胜；或曰两端对立二门，互相排击，各以出门为胜。毬状小如拳，以轻韧木楞其中而朱之”。这副壁画中可以看到球场左右两侧各有一个球门，以两个红色柱子标示，红色柱子的上端还有尖桃形的雕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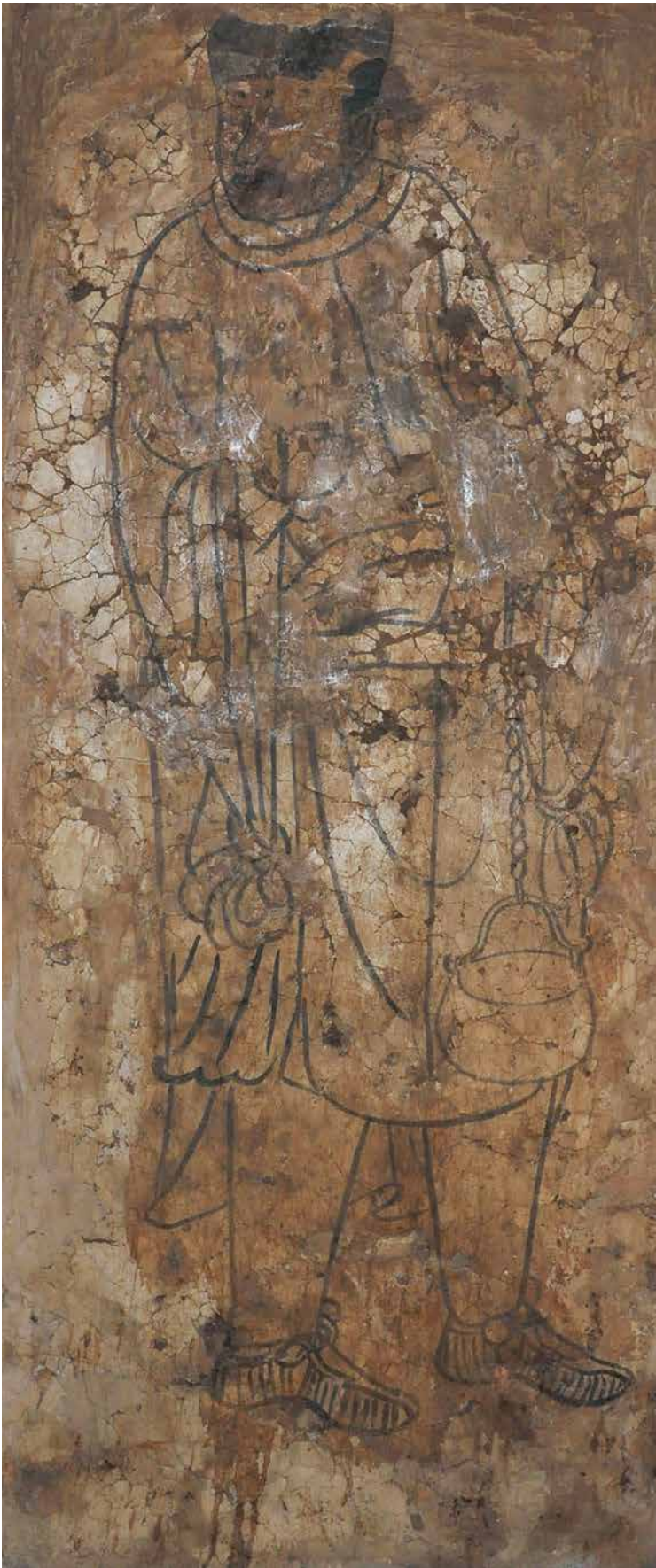
鼓乐图

高 112 厘米，宽 137 厘米，厚 3 厘米
韩家窝铺辽墓出土
内蒙古史前文化博物馆藏



提罐人物图壁画

高 153 厘米，宽 73 厘米，厚 3.5 厘米
敖汉旗羊山辽墓出土
内蒙古史前文化博物馆藏



水晶骨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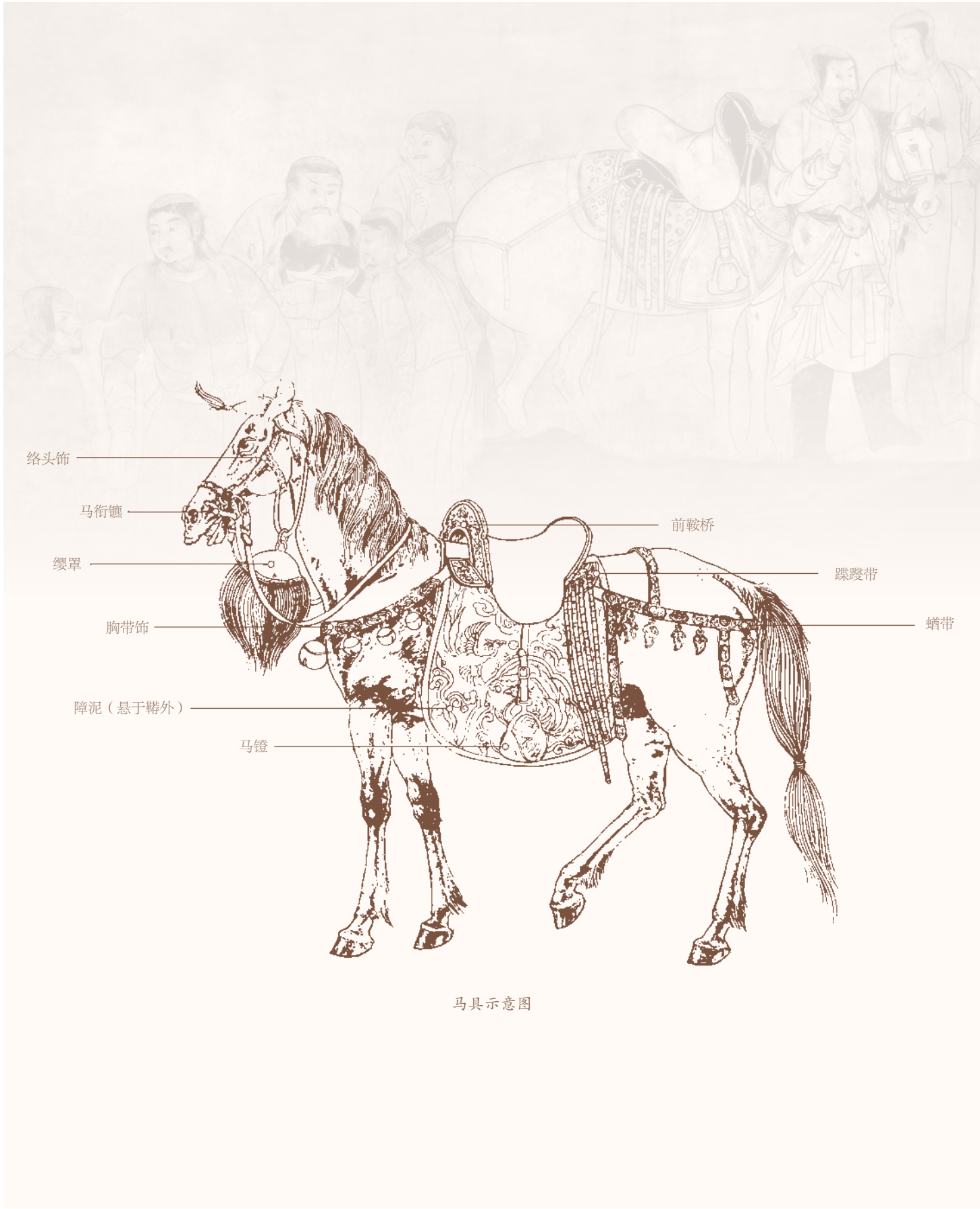
高 5 厘米，直径 6 厘米
赤峰市克什克腾旗二八地辽墓出土
赤峰市博物馆藏

骨朵是宋辽时期常见的仪仗器具，又名杖，瓜（铁质为铁瓜，金色为金瓜），蒜头。宋代就有人考证骨朵名称由来，认为是从“胍肫（或胍肫）”（意思为大腹）讹传而来。



多棱体玉骨朵

高 6 厘米，直径 6 厘米
萨力巴乡水泉辽墓出土
内蒙古史前文化博物馆藏



马具示意图

银马鞍

前鞍桥宽 51.0 厘米，高 31.0 厘米

后鞍桥宽 35.2 厘米，高 25.0 厘米

后鞍翅（2 件）长 29.5 厘米，宽 9.5 厘米

前鞍翅（2 件）长 16.2 厘米，宽 6.0 厘米

赤峰大营子辽驸马赠卫国王墓出土

内蒙古博物院藏

“契丹鞍”号称天下第一。宋太平老人著《袖中锦》中“天下第一”条目下称：“监书、内酒、端硯、洛阳花、建州茶、蜀锦、定磁、浙漆、吴纸、晋铜、西马、东绢、契丹鞍、夏国剑、高丽秘色、兴化军子鱼、福州荔眼、温州挂、临江黄雀、江阴县河豚、金山咸豉、简寂观苦笋、东华门把鮓、京兵、福建出秀才、大江以南士大夫、江西湖外长老、京师妇人，皆为天下第一，他处虽效之，终不及。”



镶玉银马络头

长 50 厘米，宽 30 厘米

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镇辽陈国公主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镶玉银鞅蹀躞带、鞅带

全长 320 厘米

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镇辽陈国公主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镶玉银胸带、鎏金铜马镫

胸带长 168 厘米，马镫高 20 厘米
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镇辽陈国公主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穹庐陶器

高 26 厘米，口径 10 厘米，底径 31 厘米
辽上京塔子沟出土
巴林左旗辽上京博物馆藏

灰陶质地，夹有小颗粒粗砂。形为穹庐，拱顶圆壁。圆壁上有门窗，可活动，穹顶有盖。器物表面刻画十只形态生动的鹿纹，草原民族生活气息浓郁。此穹庐模型本为骨灰罐，应源于契丹人日常居住的穹庐毡帐。捺钵途中常常用到毡帐。

宋代诗人苏颂有诗《契丹帐》：

马牛到处即为家，一卓穹庐数乘车。

千里山川无土著，四时畋猎是天涯。

酪浆膾肉夸希品，貂锦羊裘擅物华。

种类益繁人自足，天教安逸在幽遐。



第三部分



丨南丨北丨面丨官丨

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开始，契丹就开始南下蚕食中原，至辽太宗耶律德光，借着中原后唐政权内讧的机会，帮助反叛的石敬瑭灭唐建晋，从而取得了燕云十六州。面对新获得的土地和人口，契丹统治者依据他们从唐朝学来的经验，创造性地施行南北面官、因俗而治的国策。这种灵活的统治方式，团结了统治区域内的各民族，为民族融合创造了条件。

经略幽燕 坐制南邦

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开始，新崛起的契丹政权就重视南下经略中原，而中原处于残唐五代的动乱时代，各个割据势力内讧不断，这也给了契丹可乘之机。公元 936 年，石敬瑭在太原造反，乞援于辽太宗耶律德光。耶律德光率军南下，帮助石敬瑭消灭后唐政权，建立后晋。石敬瑭将包含北京在内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十六州献于耶律德光。一面是草原地区、一面是燕云十六州、东丹国，如何管理这些不同生产方式、不同风俗习惯的区域，成为契丹统治者需要考虑的政治问题。

宋徽宗时期，北宋联金灭辽，北宋向金提出灭辽后占有燕云十六州，金朝中有人提出：

“南朝无兵戎之备，止以已与契丹银绢，坐邀汉地。且北朝所以雄盛过古者，缘得燕地汉人也。今一旦割还南朝，不惟国势微削，兼退守五关之北，以临制南方，坐受其弊。若我将来灭契丹，尽有其地，则南朝何敢不奉我币帛，不厚我欢盟？设若我欲南拓土疆，彼以何力拒我？又何必跨海讲好？在我俟平契丹，仍据燕地与宋为邻，至时以兵戡境，更展提封，有何不可？”

这一段话充分说明了燕云十六州在人口、财富和军事地理上的重要性。

赵德钧墓

赵德钧是五代时期人物，后唐时期封北平王，镇守幽州。公元 936 年，石敬瑭在太原造反，乞援契丹，赵德钧曾经联络辽太宗耶律德光，希望后者放弃支持石敬瑭，而是帮助他称帝中原。耶律德光考虑再三，加上石敬瑭提供的交换条件比赵德钧优厚，最终没有支持赵德钧。后来，赵德钧投降契丹，封齐王，天福二年卒。1959 年在北京南郊西马场洋桥村发现一座墓葬，1960 年文物部门加以发掘。此前，在该墓南十米发现了《辽故卢龙军节度使太师中书令北平王赠齐王天水赵公夫人故魏国夫人赠齐国夫人种氏合祔墓志》，可知该墓为赵德钧与夫人种氏合葬墓。该墓曾经多次盗掘，剩余随葬瓷器残缺不全，壁画漫灭不清，却保存七万三千余枚较完整铜币。

铜迦陵频伽

长 9 厘米

北京南郊西马场洋桥村赵德钧墓出土

首都博物馆藏

人首鸟身，作飞翔状，背面是平面，上有两个钉痕，可能是其他物品的附件。



砖雕残片

长 25.5 厘米，宽 25 厘米，厚 7.2 厘米

北京南郊西马场洋桥村赵德钧墓出土

首都博物馆藏

砖雕上二残兽。从两兽腿爪及爪趾部看，两兽似为同类。前兽后半身高起，呈飞奔状，后者也似奔跑。两兽之间有祥云纹。



赤峰盘羊沟出土的后唐妃子墓

盘羊沟古墓位于巴林左旗哈拉哈达镇大西沟村小西沟自然村西北的山谷中，因山谷中曾有一只双角盘卷的石羊，当地人便称此地为“盘羊沟”。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巴林左旗文物工作者发现盘羊沟一处古墓葬出现了盗坑。为防止该墓再遭破坏，经上级文物主管部门批准，赤峰市博物馆和巴林左旗辽上京博物馆、文物管理所联合组队，于 2012 年 7 ~ 9 月对该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该墓多次被盗掘，经清理出土的随葬品有瓷器、银器、铜器、铁器、骨器、漆器、建筑饰件和墓志等 208 件（套）。根据墓志可以确定墓主人是后唐庄宗李存勖伊德妃。她是辽太宗耶律德光灭唐立晋，从而获得燕云十六州的女性见证人之一。

德妃墓志、志文（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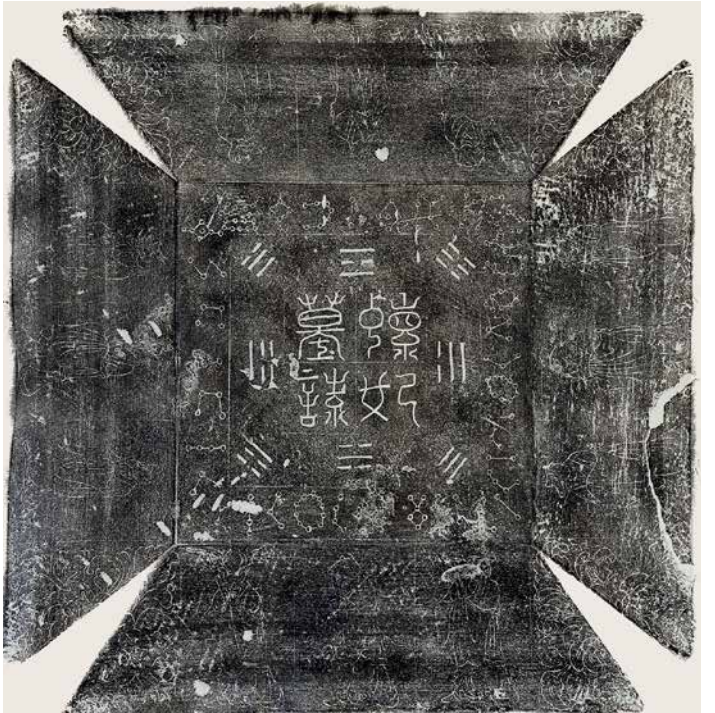
长 63.3 厘米，宽 63.7 厘米，高 33.7 厘米

巴林左旗盘羊沟墓出土

赤峰市博物馆藏

根据墓志记述，伊氏在后唐建立之前嫁给了李存勖，身份是燕国夫人。她才貌双全，在辅佐李存勖建立后唐时发挥了很大作用，同光二年（924 年）被立为德妃。公元 926 年李存勖遇害，后唐明宗即位，庄宗后宫遭到遣散。伊德妃回到家乡汾州。清泰三年（936 年），后唐末帝李从珂派大将张敬达征讨坐镇晋阳的石敬瑭。后石敬瑭向契丹乞援，耶律德光亲率五万骑兵南下，立晋灭唐。战后，德妃随耶律德光来到契丹，受到了厚遇，居住在怀州（墓志称为“怀美州”）。在此生活七年后，在会同五年（942 年）十一月二十日离世。

《旧五代史》记载：“庄宗皇帝嫡夫人韩氏，后为淑妃。伊氏为德妃。契丹入中原，石氏乞降，宰相冯道奉尊册，契丹主张宴席，其国母后妃列坐同宴，王嬙、蔡姬之比也”。也就是说德妃被俘虏后，如同王昭君一样成为契丹皇帝的妾姬。但是，墓志以“故后唐德妃伊氏”称呼，似乎又与《旧五代史》记载不同。



【德妃墓志文】

大契丹国故后唐德妃伊氏玄堂志并铭。

中散大夫守太子詹事赐紫金鱼袋王晓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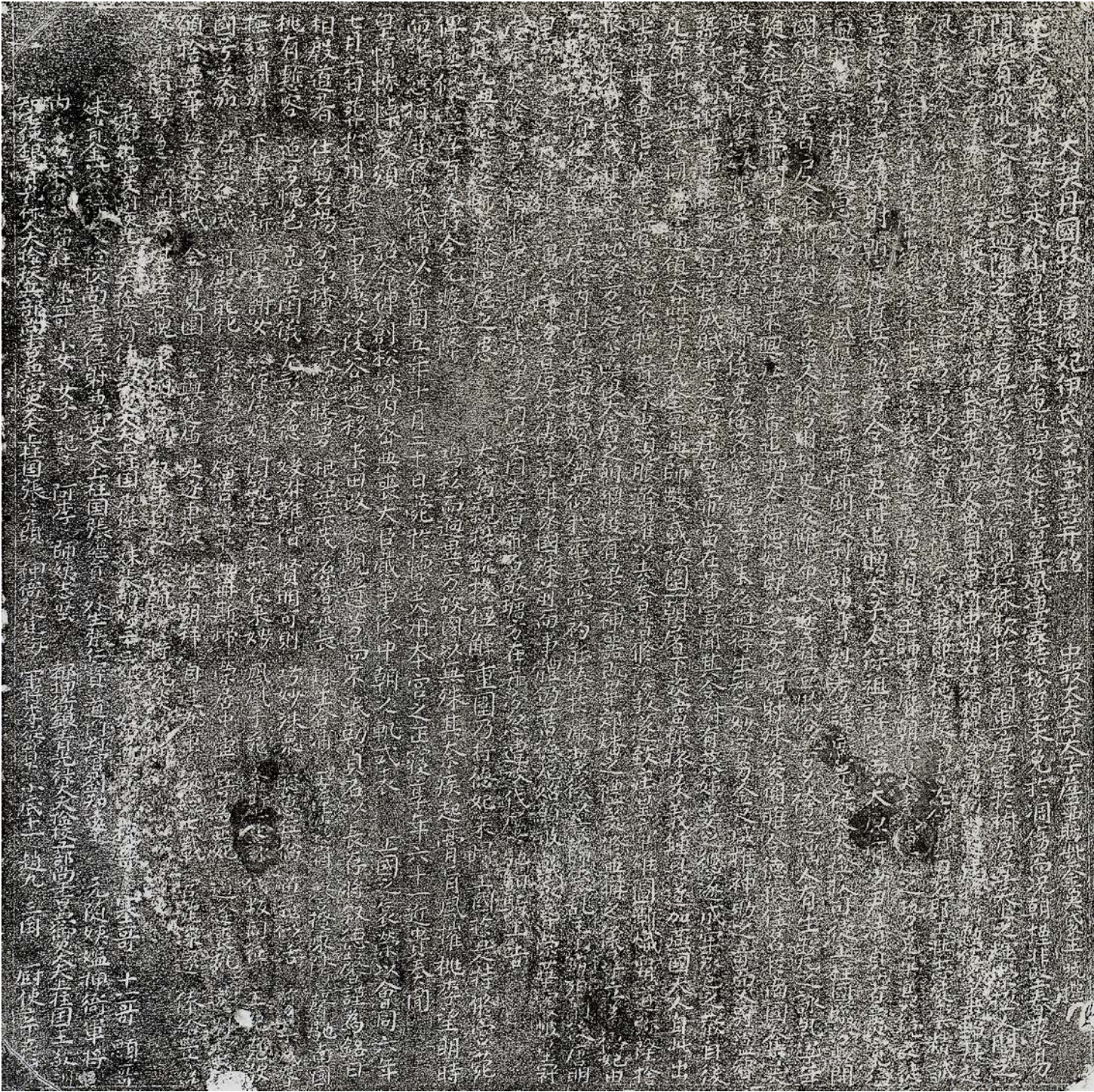
述夫鸟飞出海，兔走沉山，暑往寒来，龟鹤可延于寿筭，风凄露结，松篁未免于凋伤，而况朝槿非坚，春蕤易陨，既有成川之踰，宁逃过隙之悲。至若早陟公宫，旋升帝间，梔殊欢于绮阁，专厚宠于椒房，享天上之辉荣，极人间之贵盛，是凭柔翰，聊纪芳馥。故后唐德妃伊氏，其先山阳人也，自古甲门，中朝右族，相殷负鼎，弼谐庙廷于鸿□，佐蜀乘轺拜起，夙□□令□，瓠瓜难系，橘柚多迁，遂世为晋阳人也。曾祖讳慎，奉义军节度使、检校尚书、左仆射、南兖郡王，壮志凌云，精诚贯日。大历年，哥舒晃乱常岭南；建中年，梁崇义劾逆襄阳。公亲统王师，累膺朝守，大震番廷之势，克平梟獍之徒。寻授守尚书左仆射，朝廷特奖勤劳，令书史册，追赠太子太保。祖讳宗守，太原府少尹，清贞著美、宽猛过时，迁泸州刺史，惠政如春，仁风覆草，考满归，简授刑部尚书。烈考讳广，光禄大夫、检校司徒、上柱国、临汾县开国伯、食邑七百户，又除忻州刺史，考满又除汾州刺史。褰帷布政，遂扇宣风，俗誉多袴之谣，人有生菴之詠。乾宁年从太祖武皇帝问罪幽蓟，经阵不回，庄皇帝追赠太保。德妃即公之女也，姑射殊姿，关雎令德，振佳名于南国，夸美誉于东邻，惠敏非常，聪巧难继，妇仪克脩，女德无亏。玉管朱丝，乃得生知之妙，宝刀金尺，咸推神助之奇，而又别蕴智谋，好攻词术，世重幄环之见，时成赋雪之辞。庄皇帝当在藩宣，闻其令淑，有慕姬姜之德，遂成牢鞮之欢，自后凡有出征，无不同迈。适值大燕背义，全晋兴师，数载攻围，一朝屠下，旋当振旅，爰义钟恩，遂加燕国夫人。自此出坐鱼轩，入专虎幄，忌管弦而不听，贵示忠规，服澣濯以去奢，潜修阴教，遂致庄皇帝雄图渐炽，霸道弥隆，舍恨怀来，吊民伐罪，悉平地豕，方定寰区，复大唐之朝纲，获有梁之神器。既毕郊禘之礼，爰修典册之仪，寻立为德妃，由是服擬祔禘，位隆宫显，虔修内则，克保和鸣，嫔嫗共仰于雍柔，尝初能臻于严洁。后以京师丧乱，主上崩殂，嗣后唐明皇帝表受深恩，特颁睿泽，令归汾晋，厚给俸资，虽家国殊前，而事体仍旧。

德妃始愿披戴，永弃荣华，霞帔星冠，虔奉焚修之事，忘情涤虑，期归清净之门。爰因大晋帝石敬瑭，方在并、汾，忽遭攻伐，屡驰駟骑，上告天庭，乞兴貔虎之师，以救阽危之患。大驾亲提锐旅，径解重围，乃将德妃来归上国。于是特修宫苑，俾遂优遊厚有，又特令充贍给，降鸿私而迴异，方故国以无殊。其奈疾起膏肓，风摧桃李，望明时而难恋，指厚夜以俄归，以会同五年十一月二十日薨于怀美州本宫之正寝，享年六十一。近贵奏闻，皇情弥悼，爰颁诏命，俾创松楸，内密典丧大臣，藏事依中朝之轨式，表上国之哀荣。以会同六年七月六日葬于州东三十里，虑以陵谷迁移，桑田改变，覬遗芳而不泯，勒贞石以长存，将叙德馨，谨为铭曰：

相殷道著，仕蜀名扬，分茅播美，露冕腾芳。根深叶茂，源浚流长，珠生合浦，玉产昆岗。誉掩东邻，声驰南国，桃有惭容，莲多愧色。克稟闺仪，尤彰女德，媛淑难侔，贤明可则。巧妙殊众，聪惠无伦，苗飞似活，芬紫咸祭，抚弦调别，下笔辞新，重生谢女，终作虞嫔，闺范遐彰，藩侯来聘。凤凰于飞，螽斯常詠，伐叛同征，主纪克敬。国号爰加，君恩愈盛，前殿龙化，后宫鸾飞。燔告总毕，典册斯归，荣居中台，尊为正妃。适逢丧乱，遂别宫闱，愿舍荣华，誓思披戴。金汤见围，銮輿远届，是逐车徒，北来朝拜，自达九重，旋经七载，宫苑深邃，俸给丰盈。繁霜陨萼，急景凋英，堪嗟香魄，永閤松扃。叙生存之懿范兮，将琬琰以斯铭！

弟，邓州节度副使、光禄大夫、检校司徒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承杰；妹，张郎妇，三十三娘子；侄男道哥、税哥、塞哥、十一哥、颢哥；妹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左仆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张继员；外甥张仁宝；道门判官刘知远；元随姨媼押衙军将；内知密梁□恩、留住、荣哥、小女、女子、记记、阿李；师姨志坚；都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上柱国王敬珣；知宅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兵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张彦郡；押衙张廷海；军将李从宝；小底十一、赵九、三闰；厨使辛彦军。

（马凤磊标点，发表于2016年《草原文物》第二期）



龙纹银盒

高 15.8 厘米，口径 21 厘米
巴林左旗盘羊沟墓出土
赤峰市博物馆藏

银盒模锻成形。盒体平面呈五曲连弧形，直口，浅腹，平底，圈足。盒盖、盒身形制相近，上下大体对称，以子口扣合。盖面纹饰模锻而成，边缘饰一周简化的莲瓣纹，又以连珠纹带组成一个五出的连弧形，内錾刻一龙，周围錾饰云纹。内连弧与外连弧之间的斜面饰飞禽和缠枝蔓草，角隅饰五瓣花卉。盒盖和盒身腹壁各錾饰一周莲叶和蔓草。盒身下腹錾饰折枝牡丹五朵。圈足外撇，与盒底焊接。底缘錾一周简化的莲瓣纹。



银持壶

通高 20.6 厘米，口径 6 厘米，底径 6.6 厘米
巴林左旗盘羊沟墓出土
赤峰市博物馆藏

银持壶分体打制，焊接成形。整体打磨抛光，素面。壶盖带钮，一侧焊接有扁方形环。壶身侈口，束颈，圆肩，斜腹下收，平底稍内凹。肩一侧有焊接的圆形管状流，下端做成梅花状贴饰。肩另一侧为壶执柄，执柄宽平，有两道凹槽，上端焊接于壶颈部，下端呈云头状焊接于腹下。底部一侧边缘处錾刻“德妃宅”三字，底中部刻有“伊”字。



花口银尊

高 12.3 厘米，口径 14.4 厘米，圈足 8.4 厘米
巴林左旗盘羊沟墓出土
赤峰市博物馆藏

分体打制，焊接成形。敞口，深腹，折壁，平底，高圈足外撇。口部为五曲葵花形，花口至折腹处的内腹壁有五道竖列凸棱，将器腹上部均匀分成五瓣。器内外壁打磨抛光。

葵口银盏托（2件）

高 8.4 厘米，口径 10 厘米，盘径 17.5 厘米，足径 8 厘米
巴林左旗盘羊沟墓出土
赤峰市博物馆藏

盏托分体打制，焊接成形。由盏、托盘和圈足三部分组成。盏为敞口，曲腹内收，平底。托盘为敞口，弧腹，五瓣葵花形口沿，口沿至底部有五道凸棱将盘面均匀分成五瓣。圈足较高，稍外撇。



鎏金银盏托（2件）

盏口径 6.8 厘米，底径 3.8 厘米，托口径 11.6 厘米
底径 8 厘米，通高 8.8 厘米
巴林左旗盘羊沟墓出土
赤峰市博物馆藏

分体打制，焊接成形。素面，通体鎏金。由盏、托盘组成。盏为敞口，弧腹，平底，圈足稍外撇。口沿一侧有云头状垫指，下焊接环形把，把宽扁，有两道凹槽。口径 6.8 厘米、底径 3.8 厘米。托盘为直口，中间有一凸起，凸起正中向下凹陷，使盏的圈足正好置于其中，高圈足外撇。



银匜

高 7.5 厘米，长 22.4 厘米，宽 16.4 厘米
巴林左旗盘羊沟墓出土
赤峰市博物馆藏

分体捶打，铆接成形。口微敞，宽沿，卵形腹较浅，圆底。口部带有一折棱箕形短流，一侧装有柄，与流垂直。柄呈扁方形盞状，用铆钉铆接于口沿下，前端略窄，后端稍宽并带有一周凸棱，整体光素。



银茶匙

长 25.8 厘米
巴林左旗盘羊沟墓出土
赤峰市博物馆藏

茶匙打制而成。匙口呈四曲花瓣形，浅弧腹半球状，内有四道竖列短凸棱。匙柄扁长，向上弯曲，柄端宽，呈三角形。



鎏金银尺

长 34.1 厘米，宽 2.2 厘米，厚 0.1 厘米
巴林左旗盘羊沟墓出土
赤峰市博物馆藏

鎏金尺出土时置于一长方形铁盒内，用织物包裹。一面用双线加圆圈纹将尺身十等分，另一面则用四线加圆圈纹将尺身二等分。格纹处有鎏金痕迹。



开运之事

后晋天福七年（942年），后晋皇帝石敬瑭病死，石重贵即位。他听信大臣景延广的建议，对辽称孙不称臣。耶律德光遂三次南下，最终在开运三年（947年）攻陷后晋都城汴京，石重贵系首投降，后晋灭亡。耶律德光在汴梁称帝前，封石重贵为“负义侯”，并将之北迁到辽阳、霸州、建州等地。与其一起北迁的还有太后李氏（石敬瑭之妻，后唐明宗李嗣源之女）、安太妃（重贵生母）、皇后冯氏、石重睿（重贵之弟），以及重贵之子延煦、延宝及部分宫人。后晋灭亡与石重贵北迁被称为“开运之事”。石重贵墓志出土于辽宁省朝阳县乌兰河硕蒙古族乡黄道营子村附近，1998年冬被朝阳市博物馆征得，并于2000年春入藏辽宁省博物馆。2011年5月，在同一村落再次出土辽代后晋李太后、安太妃墓志，被村民藏匿于家中，2012年被朝阳县公安局收缴并于10月移交朝阳县博物馆收藏。

石重贵墓志铭（拓片）

长 97 厘米，宽 97 厘米，厚 9.3 厘米

辽宁省朝阳县乌兰河硕蒙古族乡黄道营子村出土

辽宁省博物馆藏

石重贵墓志由卢龙军节度推官、将仕郎、守右拾遗牛藏用奉命撰写，在墓志中，首先叙述石氏之源和石重贵即位，墓志中称“王姓石氏，讳重贵，赵王勒之裔，晋高祖之嗣也。天福七年，高祖崩，即皇帝位于柩前，改元为开运。”接着叙述石敬瑭乞援契丹灭唐，并保持良好关系：“初高祖之龙飞晋阳也，苦于清泰之兵，有悬釜析骸之窘，殆将不振。大契丹嗣圣皇帝排大难而帝之于中夏，高祖德之，担以子道自居，世世不绝。”然后叙述后晋与契丹关系破裂，致使契丹南下灭后晋并俘虏石重贵的过程，“至六载，王惑于奸权之说，有大恩不报之义，乃弃约而息贡。嗣圣皇帝再耀武于夷门，遂迁王于辽左之东京。”最后叙述石重贵病死、安葬的情形并为做赞语：“暨天授皇帝徙居建州而城之，天顺皇帝策为晋王，名其城为安晋焉。以天赞皇帝保宁六年六月十八日遭疾，薨于寝，享年六十有一。皇上轸悼，赠赙加等，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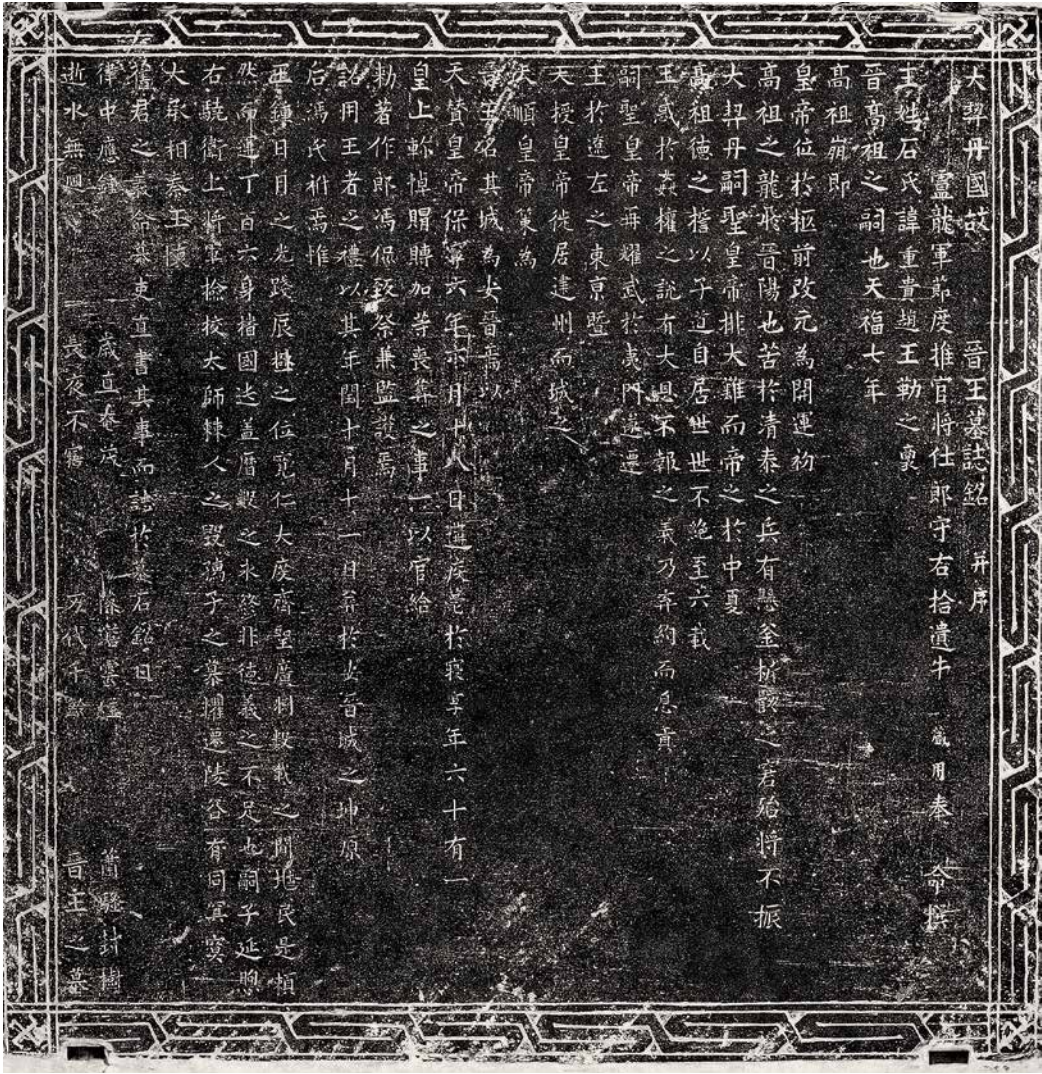
葬之事，一以官给，勅著作郎玛侃致祭，兼监护焉，诏用王者之礼，以其年闰十月十一日葬衿安晋城之坤原。后冯氏焉。惟王锺日月之光，践辰□之位，宽仁大度，齐圣广渊，数载之间，□民是口。然而运丁百六，身播国□，盖厝口之永终，非德义之不足也。嗣子延煦，右骁卫上将军，检校太师，棘人之毁，孺子之慕，擢迁陵谷冥口。大丞相秦王怀旧君之义，命幕史直书其事，而志衿墓石，铭曰：口钟应钟，岁直奄茂，口落云口，萧瑟封树，逝水无回，长夜不寐，万代千秋，晋主之墓”。墓志中有缺字。

【石重贵墓志文】

大契丹国故晋王墓志铭并序

卢龙军节度使推官、将仕郎守右舍遗牛藏用奉命撰

王姓石氏，讳重贵，赵王勒之裔，晋高祖之嗣也。天福



七年高祖崩，即皇帝位于柩前，改元为开运。初，高祖之龙飞晋阳也，苦于清泰之兵，有悬斧析骸之窘，殆将不振。大契丹嗣圣皇帝排大难，而帝之于中忧，高祖德之，誓以子道自居，世世不绝。至六载，王惑于奸权之说，有大恩不报之义，乃弃约而息贡。嗣圣皇帝再耀武于夷门，遂迁王于辽左之东京。暨天授皇帝徙居建州而城之。天顺皇帝策为晋王，名其城为安晋焉。以天赞皇帝保宁六年六月十八日遭疾薨于寝，享年六十有一。

皇上轸悼，赠赙加等。丧葬之事，一以官给。敕著作郎玛侃致祭兼监护焉，诏用王者之礼。以其年闰十月十一日葬

于安晋城之坤原,后冯氏祔焉。惟王钟日月之光,践辰极之位，宽仁大度，齐圣广渊，数载之间，地民是赖。然而运丁百六身□国□，盖历□之永，终非德义之不足也。嗣子延煦，右骁卫上将军、检校太师，棘人之毁□子之墓，擢迁陵谷，有同冥冥。大丞相秦王，怀旧君之义，命幕史直书其事而志于墓石，铭曰：

律中应钟，岁直奄茂，□□云烟，萧骚封树。

逝水无回，长夜不寐，万代千龄，晋王之墓。

官分南北 因俗而治

面对统治区域内不同生产生活方式的臣民，辽太宗耶律德光建立了“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管理体系。在中枢官制上分为北面官和南面官两大系统，在地方上，部族制和州县制并存，即契丹人和其他游牧民族用部族制，而汉人和渤海人则使用唐朝时用的州县制。而且，辽的法律制度也不断完善，在辽兴宗时期颁布过《重熙条制》，契丹法和汉法分别应用于不同地区。

◎《辽史》所记南北面官制度的创立原因和原则

契丹旧俗，事简职专，官制朴实，不以名乱之，其兴也勃焉。太祖神册六年，诏正班爵。至于太宗，兼制中国，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国制简朴，汉制则沿名之风固存也。辽国官制，分北、南院。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

◎《辽史》记载的辽代北面官与南面官

“初，太祖分迭刺夷离董为北、南二大王，谓之北、南院。宰相、枢密、宣徽、林牙，下至郎君、护卫，皆分北、南，其实所治皆北面之事。语辽官制者不可不辨。凡辽朝官，北枢密视兵部、南枢密视吏部，北、南二王视户部，夷离毕视刑部，宣徽视工部，敌烈麻都视礼部，北、南府宰相总之。惕隐治宗族，林牙修文告，于越坐而论议以象公师。”

——《辽史·百官志一》

“（辽）既得燕、代十有六州，乃用唐制，复设南面三省、六部、台、院、寺、监、诸卫、东宫之官。”

——《辽史·百官志三》

南北面官在服装上的区别

辽代由于在政治上“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官员根据担任官职所在系统穿着相应官服。在南面官体系内的契丹人也需要穿南面官服装。辽代官服中，大体可以根据有无蹀躞分为蹀躞带和无蹀躞带。蹀躞是指腰带上垂下来的饰物。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明确指出蹀躞并非中原传统服装：“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窄袖绯绿，短衣，长靽鞞，有蹀躞带，皆胡服也……带衣所垂蹀躞，盖欲以佩带弓箭、帔帨、算囊、刀砺之类。”



南北面官服装



鎏金独角兽纹银腰带具

含方形带铃 10 件，各长 4.8 厘米，高 4.4 厘米

桃形带铃 5 件，各长 2.5 厘米，高 2.8 厘米

铤尾 2 件，各长 8.5 厘米，高 4.9 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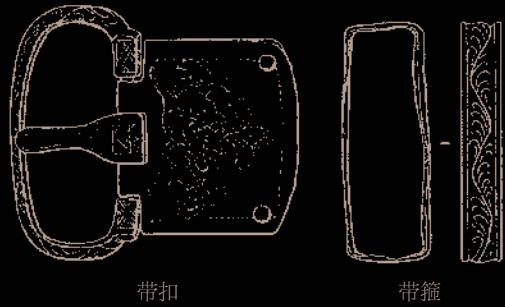
带扣 2 件，各长 7 厘米

带箍 2 件，各长 6.2 厘米，宽 2.4 厘米

凌源小喇嘛沟辽墓出土

凌源博物馆藏

此为双扣双铤尾带具，一套 21 件。方形带铃 10 件，大小相同。每个带铃背后各有四个铆钉，并用小圆片固定在皮带上。带铃正面装饰独角兽，下部有狭长古眼。长毛利爪的独角兽呈浮雕状，单个制成后焊接到带铃上。桃形带铃 5 件，每个带铃背后有三个铆钉，用于钉缀。带铃边缘为曲边，中心小孔，正面上下装饰如意纹。双铤尾。每个铤尾背后五个铆钉，用于钉缀。铤尾正面装饰独角兽。双带扣，每个带扣有扣针、椭圆形扣环和方形扣板，表面均錾刻花纹。双带箍，三面錾刻缠枝纹。



带扣

带箍



带箍

带扣



铤尾

方形带铃



方形带铃

铤尾



桃形带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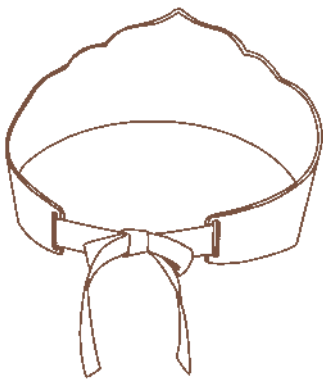


桃形带铃

鎏金莲花纹银捍腰

凌源小喇嘛沟辽墓出土
凌源博物馆藏

鎏金银薄片制成。两端低而中间高。底部平齐，上部连弧状，呈山字形。联珠纹一周区分内外。边棱与联珠纹中间分布如意云纹，余白处填补鱼子纹。联珠纹内中间是一朵盛开莲花，莲瓣错落，中间莲蓬，莲子可数。莲花下部为一株芡实，以中心为轴，莲花、荷叶左右对称分布。根据叶茂台辽墓出土捍腰位置可知，捍腰是背部饰，前面连接袍带，系于腰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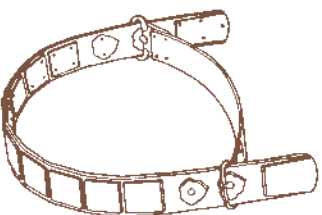
捍腰使用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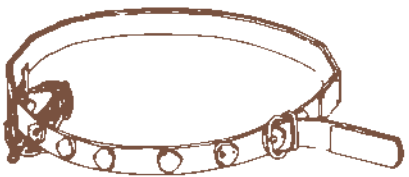
玉铐银带（附短腰带）

带长 163.7 厘米，宽 4.4 厘米，短带长 28.4 厘米
内蒙古通辽市哲里木盟奈曼旗青龙山镇陈国公主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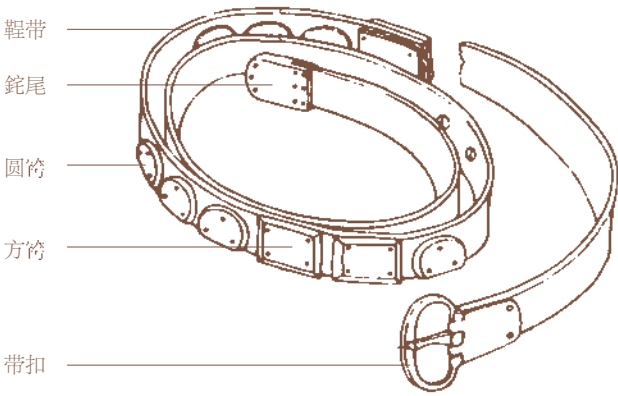
玉铐银带上缀方形和长方形白玉带铐 14 件、桃形有孔白玉铐 1 件、圭形白玉銚尾 1 件、长方形金带扣 1 件。带铐和銚尾均无纹饰，用银钉铆合在带上。同出一短银带，一端有金带扣，有 6 个扣眼，大概是与前者配合使用。



双扣、双銚尾带系法示意图



单銚尾带系法示意图



此种带铐由长短两根组成，短根专为衣服加厚时使腰带加长而备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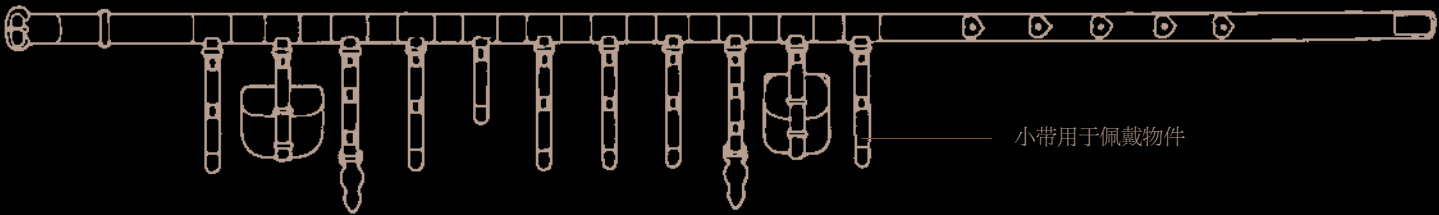




金铐银鞢蹀躞带

带长 156 厘米，宽 3 厘米
内蒙古通辽市哲里木盟奈曼旗青龙山镇陈国公主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金铐银鞢蹀躞带上缀方形金带铐 1 件、桃形有孔金铐 5 件、圭形金铈尾 1 件、长方形金带扣 1 件、金带箍 1 件。方形金带铐正面饰兽面纹，桃形有孔金铐上饰云纹，金带扣和金铈尾饰花卉图案，均用银钉铆合在带上。方形带铐的下部有长方形“古眼”，其下悬垂 11 条小带，7 条小带上各有 2 件长方形金铐和 1 件圭形金铈尾；2 条小带上各有 2 件长方形金铐，并佩挂 1 件略呈方形、正面镌刻双凤、祥云的金花银囊；还有 2 条小带上各有 3 件长方形金铃，带下端各悬 1 件饰有兽面纹的倒置葫芦形金饰件。



小带用于佩戴物件

玉铐丝鞢蹀躞带

带长 156 厘米
内蒙古通辽市哲里木盟奈曼旗青龙山镇陈国公主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玉铐丝鞢蹀躞带有方形玉带铐 11 件、大小不一的桃形玉带铐 18 件、圭形玉铈尾 1 件，圭形玉饰 8 件。还有镶玉鎏金铜带扣 1 件、鎏金铜带箍 10 件、鎏金小铜带扣 4 件、鎏金葫芦形铜带饰 2 件。9 件方形玉铐下部有长方形“古眼”。玉带饰上均附有银铆钉。



玉田韩氏家族

1994 年，巴林左旗白音勿拉苏木依斯力格嘎查的一位牧民在附近山脚下洪沟中发现韩德威墓志。1995 年 5 月，白音勿拉苏木白音罕山的一座古墓被盗，当地文物部门随即前往调查，在被盗古墓中发现石墓志两合，根据志文记叙，确认该墓为韩德威父母——韩匡嗣夫妇合葬之墓。1995 年 8 月，当地公安机关又从盗墓者手中收缴来韩德威之孙耶律元佐的墓志。这些墓志出自同一家族墓地，引起了文物部门的高度重视。2000 年 8 月至 9 月，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巴林左旗博物馆，对位于白音罕山的辽代韩氏家族墓地进行了调查，发现被盗古墓近 40 座，并对其中的 3 座进行了发掘清理。

韩匡嗣是辽代开国功臣韩知古之子，其家族世居蓟州玉田县，为辽代望族。据韩匡嗣墓志记述，韩匡嗣九子均有建树，这与《辽史》记载韩匡嗣有五子不同。其中五子韩德让（耶律隆运）名声最为显赫，官拜大丞相，因其功绩卓著，在 1004 年（统和二十二年），被赐国姓耶律，使韩氏一族附籍“横帐”。作为辽政权的忠实捍卫者，韩氏家族与辽朝兴衰休戚相关。韩氏家族墓地是一处典型的、聚族而葬的家族墓地，不仅为研究辽代汉族家族墓提供了丰富资料，也为研究辽代政权南北面官提供了宝贵佐证。

契丹石俑（1 对）

男俑高 62 厘米，女俑高 63.5 厘米
巴林左旗白音乌拉苏木白音罕山韩氏家族墓地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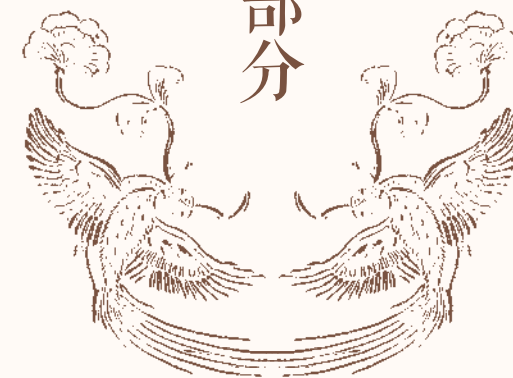
男俑方脸大耳，垂目下视，鼻头略残，髡发，额前留有整齐的刘海，两鬓各留一缕长发垂于耳前。双耳带环。著右衽圆领窄袖袍服，左肩靠颈部有疙瘩襟扣，在臀后开楔。腰系布带，结双环同心抽扣。左侧垂一刺鹅锥，悬挂于腰之上。足着尖头皮靴。叉手而立。

女俑方面丰颐，秀眉大眼，直鼻小口，大耳垂肩，双耳戴环，发梳双辮，左侧发辮从颅后经右耳上方绕至额前上方，右侧发辮自颅后经左耳上面绕至前额与左侧发辮相搭，以一宽帛发带结扣于额正中。发带下所露额发梳经头顶至颅后于发辮之中。著交领右衽窄袖团衫，衫长及足面。系布帛带，结双环同心抽扣。足着尖头皮靴，双手捧一洗巾。





第四部分



丨华丨夷丨同丨风丨

辽代在制度和管理方面多有创新和特点，其在最根本的政治制度上——皇帝制度与同时期的北宋保持一致。南北双方都是皇帝制度，因而又有北朝、南朝之称。根本制度的一致与趋同使得南北双方在政治理想、社会价值、道德风尚等方面表现出类似。辽代统治者对中原文化采取宽容及吸收的态度，极大地促进了民族融合。

君臣同志 华夷同风

在兴起之初，耶律阿保机通过血腥的斗争，完成了从部落推选制到世袭制的转变。公元 907 年，耶律阿保机即皇帝位，上尊号曰天皇帝。之后，他数次平定自己兄弟们发动的叛乱，又经过辽太宗、世宗、穆宗、景宗数朝，最终确立了皇位的嫡长子继承制。实行君主制的辽国统治者，也把儒家标榜的大同社会作为理想。

◎ “君臣同志，华夷同风”典故由来

（懿德皇后萧氏）小字观音，枢密使萧惠之女，以重熙九年五月五日生。姿容端丽，为萧氏首。能歌诗弹筝，琵琶尤为当时第一。清宁元年，册为皇后。……三年秋，上作《君臣同志华夷同风》诗，后应制属和曰：“虞廷开盛轨，王会合奇琛。到处承天意，皆同捧日心。文章通谷蠡，声教薄鸡林。大寓看交泰，应知无古今。”

——（清）周春辑《辽诗话》转写王鼎《焚椒录》

◎ 建立世袭制

《契丹国志》在“并合部落”条目下记载了阿保机建立

世袭制过程中的一次血腥屠杀：“初契丹有八部，族之大者曰大贺氏。后分为八部，部之长号‘大人’，而常推一人为王，建旗鼓，以统八部。每三年则以次相代，或其部有灾疾而畜牧衰，则八部聚议，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被代者以为元约如此，不敢争。及阿保机，乃曰‘中国之主无代立者。’由是阿保机益以威制诸国，不肯代。其立九年，诸部共责诮之。阿保机不得已，传其旗鼓，而谓诸部曰：‘吾立九年，所得汉人多矣。吾欲别自为一部以治汉城，可乎？’诸部将许之。汉城在炭山东南滦河上，有盐铁之利，乃后魏滑盐县也。其地可植五谷，阿保机率汉人耕种，为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汉人安之，不复思归。阿保机知众可用，用其妻述律策，使人告诸部大人曰：我有盐池之利，诸部所食。然诸部知食盐之利，而不知盐有主人，可乎？当来犒我。诸部以为然，共以牛酒会盐池。阿保机伏兵其旁，酒酣伏发，尽杀诸部大人，复并为一国，东北诸夷皆畏服之。”

耶律阿保机听从妻子述律平的建议，通过牛酒会攻杀诸部大人，建立起世袭制。有学者认为，耶律阿保机攻杀诸部大人这一事件发生的年代在公元 915 年前后。

韩延徽和韩佚

在建立世袭制的过程中，耶律阿保机也受到汉人影响。赵志忠《虏廷杂记》中记载：“有韩知古、韩颖、康枚、王奏事、王郁皆中国人，共劝太祖不受代。”韩颖即韩延徽，他是幽州人。天祐四年（907 年），刘守光囚禁父亲刘仁恭，自立为卢龙节度使，刘守光掌权后连年征战，实力日渐衰弱，想结契丹为后援，就派遣韩延徽出使契丹。辽太祖召见韩延徽后认为他很有才能，于是委以重任。《辽史》记载：“太祖初元，庶事草创，凡营都邑，建宫殿，正君臣，定名分，法度井井，延徽力也。”还记载说：“夫赋税之制，自太祖任韩延徽，始制国用。”1981 年，在北京八宝山发现了韩延徽孙子韩佚墓，此前还出土了的《韩资道墓志》《王师儒墓志》等与韩氏相关墓志，它们的发现对于研究韩氏家族、北京史、辽史均有补益。韩佚墓出土的部分精美器物可能为皇室对其先祖的赏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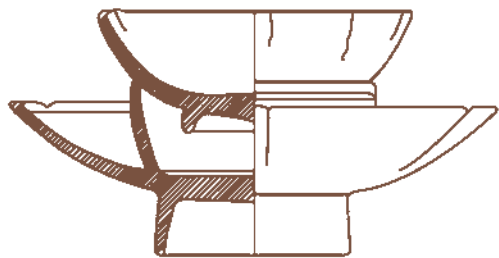
青釉盞及盞托（2 件）

盞高 4 厘米，口径 10.4 厘米，底径 4.8 厘米

盞托高 8.1 厘米，口径 16.5 厘米，底径 6.5 厘米

北京市八宝山韩佚墓出土

首都博物馆藏



盞沿荷叶形，盞心钵形，高圈足，底部有五个长条形支烧痕迹。盞外沿刻蜜蜂和草叶纹。盞碗作荷叶形，敞口，平底，小圈足，底部亦有支烧痕。内底刻环带纹。胎薄而坚密，釉色青翠。



越窑青釉刻划鹦鹉纹温碗

高 8.5 厘米，口径 18 厘米
北京市八宝山韩佚墓出土
首都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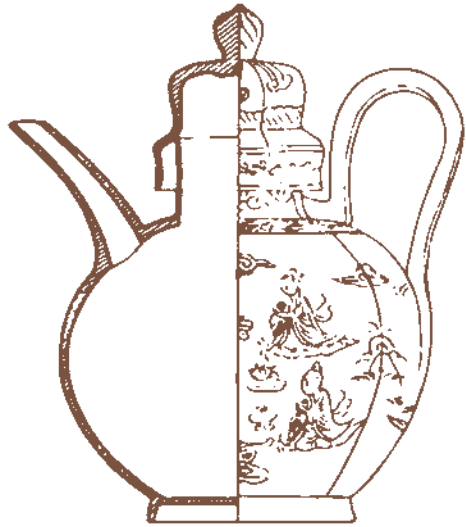
温碗敞口，深腹，平底，圈足微外撇。底部有五个条形支烧痕迹。挂满釉，釉色青绿，光泽莹润。口沿内饰凹弦纹一周，内底心划鹦鹉一对，头尾相对，形成团形图案。出土时青瓷水注置于碗内，应是一套温酒器。



越窑青釉刻划宴乐人物纹注壶

通高 18 厘米，口径 4.5 厘米
北京市八宝山韩佚墓出土
首都博物馆藏

葫芦形钮盖，盖壁有二孔。花瓣形直口，瓜棱状圆腹，矮圈足，直流，曲把。器底刻“永”字款识，有长条形支烧痕。薄胎致密，釉色青灰。划花，盖饰云纹或羽纹，把与流饰花草纹，身两面饰四对人物坐饮图。流云、酒搏、果盘等杂置其间。



青釉碟（2件）

高 3.5 厘米，口径 13.7 厘米
北京市八宝山韩佚墓出土
首都博物馆藏



青釉碗

高 5.2 厘米，口径 14 厘米
北京市八宝山韩佚墓出土
首都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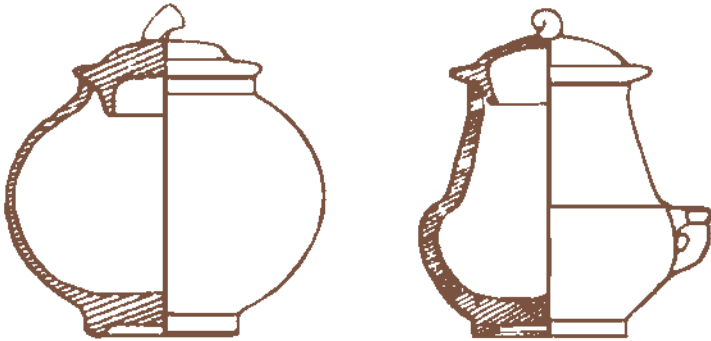
白瓷碗（2件）

- ① 高 4 厘米，口径 9.7 厘米
 - ② 高 4.5 厘米，口径 11.5 厘米
- 北京市八宝山韩佚墓出土
首都博物馆藏



白瓷罐（3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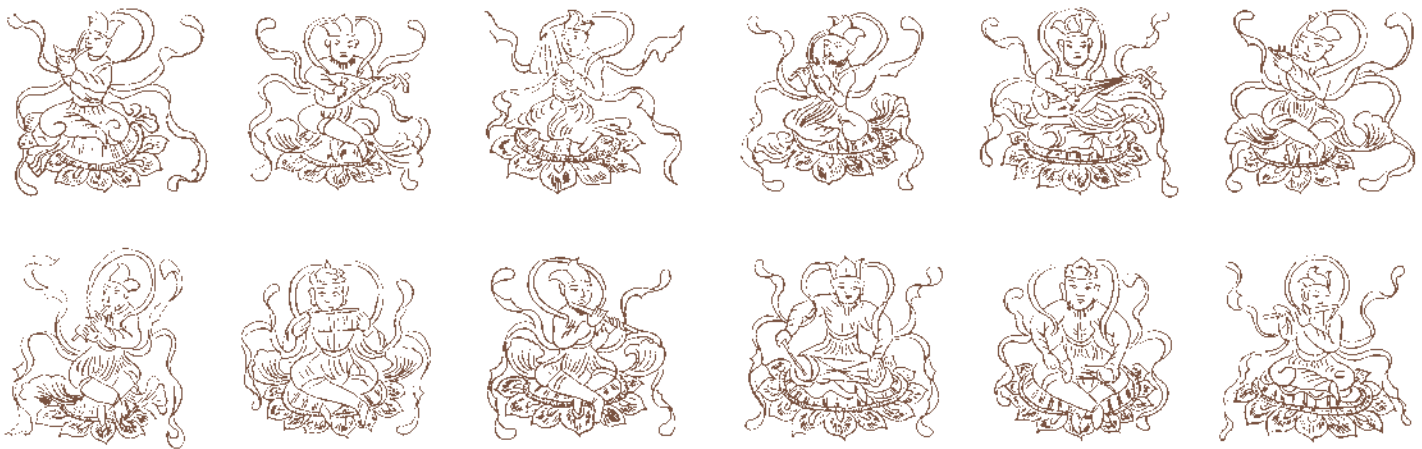
- ① 通高 8.5 厘米，宽 5.5 厘米
 - ② 通高 9.5 厘米，底径 4 厘米，通宽 8 厘米
 - ③ 高 9.5 厘米，通宽 8.5 厘米
- 北京市八宝山韩佚墓出土
首都博物馆藏



通辽市吐土尔基辽墓

2003 年 3 月，吐尔基山采石矿在采石过程中发现了一座墓葬，通辽市博物馆及科尔沁左翼后旗文管所人员得知后赶到了现场进行保护，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得知消息后派人员到现场进行勘察。随后组建了由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通辽市博物馆、科尔沁左翼后旗文管所组成的考古队，于 3 月 21 日对该墓葬进行正式发掘，5 月 16 日发掘结束，共出土文物 388 组件。

由于在墓葬主人的内衣左右肩上发现了一对代表太阳的三足乌金牌和代表月亮的玉兔银牌，加之墓中随葬品还有铜铃、鼓、号角、鞭子等女巫用的法器，多数学者认为墓主人生前应该是一位身份高贵的女萨满。但是，吐尔基山辽墓没有出土墓志，学者对墓主人具体身份存在争论。有学者认为墓主人是太祖之妹、萧室鲁之妻余庐睹姑公主。萧室鲁夫妻因反对太祖破坏契丹传统世选制，参与太祖诸弟之乱而受到严惩。《辽史》记载，辽太祖曾经说过：“余庐睹姑于国至亲，一旦负朕，从于叛逆，未置之法而病死，此天诛也。”辽太祖宣称余庐睹姑公主是病死，这其中或有隐晦。余庐睹姑公主可能是遭到述律皇后的迫害而亡。



乐舞鎏金银带具

通长 70 厘米，通宽 50 厘米
通辽市吐尔基山辽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鎏金镌花龙纹银盒

通高 11.2 厘米，盖口径 19 厘米，盒口径 18.4 厘米

通辽市吐尔基山辽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银质鎏金。十曲花口。子母口盒盖与盒身扣合，圈足。
盒盖中央模压出一条金龙。龙身团旋，张口吐舌。龙身四周
模压四朵云纹。空处镌刻细云纹。盒盖肩部模压十只张翼飞
翔的鸟，下刻牡丹。盒身镌刻五只狮子，五只凤凰。



鎏金錾花双狮纹银盒

高 16 厘米，盖口径 23.5 厘米，底径 22.1 厘米，
盒口径 23.1 厘米，底径 18.4 厘米

通辽市吐尔基山辽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银盒由银板打制成盖、器身、足底，再经焊接而成。盖顶隆起，盖及器身呈五曲菱花式，子母口，高圈足。工匠先以捶揲技法做出凸起的双狮，再以錾刻法刻画细部。两狮均张口，跳跃，鬃毛浓密，卷曲上扬，长尾飘扬。在双狮的外廓饰十朵缠枝花卉纹，一种为牡丹样的团花，另一种为带长花蕊的缠枝。在器盖侧面与器身立壁上用五组图案装饰，在每组的开光内，以器身尖棱为对称轴，饰缠枝花卉纹。整个盒面装饰均以鱼子纹作地。



嵌宝石鎏金包银漆盒

长 26 厘米，宽 25 厘米，高 13 厘米
通辽市吐尔基山辽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嵌宝石鎏金包银漆盒采用了银衬多宝嵌技术，盒内部为黑色漆木胎，外包鎏金银片，然后在银片上或者银片镂空部位镶嵌各种玉、宝石、松石、水晶组成精美的图案，制作复杂，工艺精湛。漆盒内有一面铜镜，镜面铸“李家供奉”字样。

银衬多宝嵌是银衬技术与多宝镶嵌技术结合的工艺。银衬是一种将银片直接锤揲在漆胎外的工艺，起到固定、美观的作用；多宝嵌即集玉石、象牙、玳瑁、云母、金银等宝物为一器的工艺。



“李家供奉” 铭铜镜

直径 22.4 厘米
通辽市吐尔基山辽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双鱼纹金花银盖碗

盖口径 20.5 厘米，盒径 20 厘米，底径 10.3 厘米

通高 20 厘米

通辽市吐尔基山辽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银质鎏金。碗弧形腹，圈足，带盖。盖类似倒扣的浅腹碗。盖中央模压双鱼纹，双鱼周边为波浪纹。盖身均匀镌刻五朵花卉纹，碗身同样镌刻五朵花卉纹。



金银平脱扇形漆盒

长 17.5 厘米，宽 12.3 厘米，高 3.8 厘米

通辽市吐尔基山辽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漆盒为木胎，表里髹暗红色漆，颜色深浅略有不同，盖和盒身均呈扇形，子母口扣合，盖上部边缘微内凹，器表为金银平脱花卉纹和云纹。内蒙古通辽市吐尔基山辽墓出土了 8 件完整的漆器，代表了辽代漆器的最高工艺水平。



金银平脱异形漆盒

长 15.8 厘米，宽 5.6 厘米

通辽市吐尔基山辽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漆盒表里均髹暗红色漆，盖与盒身呈菱形，以子母口扣合，圈足，盖表为银平脱花卉纹和绶带纹，全器边缘均包银片。金银平脱的制作方法是将镂刻了花纹的金片或银片嵌贴到漆胎上，经打磨后片饰与漆地相平。



蟾蜍松石金戒指（2件）

长 4 ~ 4.7 厘米，宽 2.1 厘米，高 4.3 厘米

通辽市吐尔基山辽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吐尔基山墓女主人两手手指上都戴有戒指。戒指有捶揲扳打成形的金质托座，托座上覆薄薄一层水晶。托座中间饰一蟾，蟾蜍作匍匐状，爪部蜷缩，头部稍昂。在蟾蜍背部镶嵌上刻弧线的绿松石，身体两侧肩头部也各镶一颗。



摩羯形金耳坠（1对）

宽 5 ~ 5.2 厘米，高 5 ~ 5.1 厘米，厚 2.2 厘米

通辽市吐尔基山辽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三足乌纹金牌饰

直径 3.2 厘米

通辽市吐尔基山辽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圆形，微凸起。周边有三个小孔，方便用线缝制在衣服上。镌刻一只三足乌，一足翘起。四周装饰云纹。三足乌为太阳神鸟。

月宫伐桂纹银牌饰

直径 3.6 厘米

通辽市吐尔基山辽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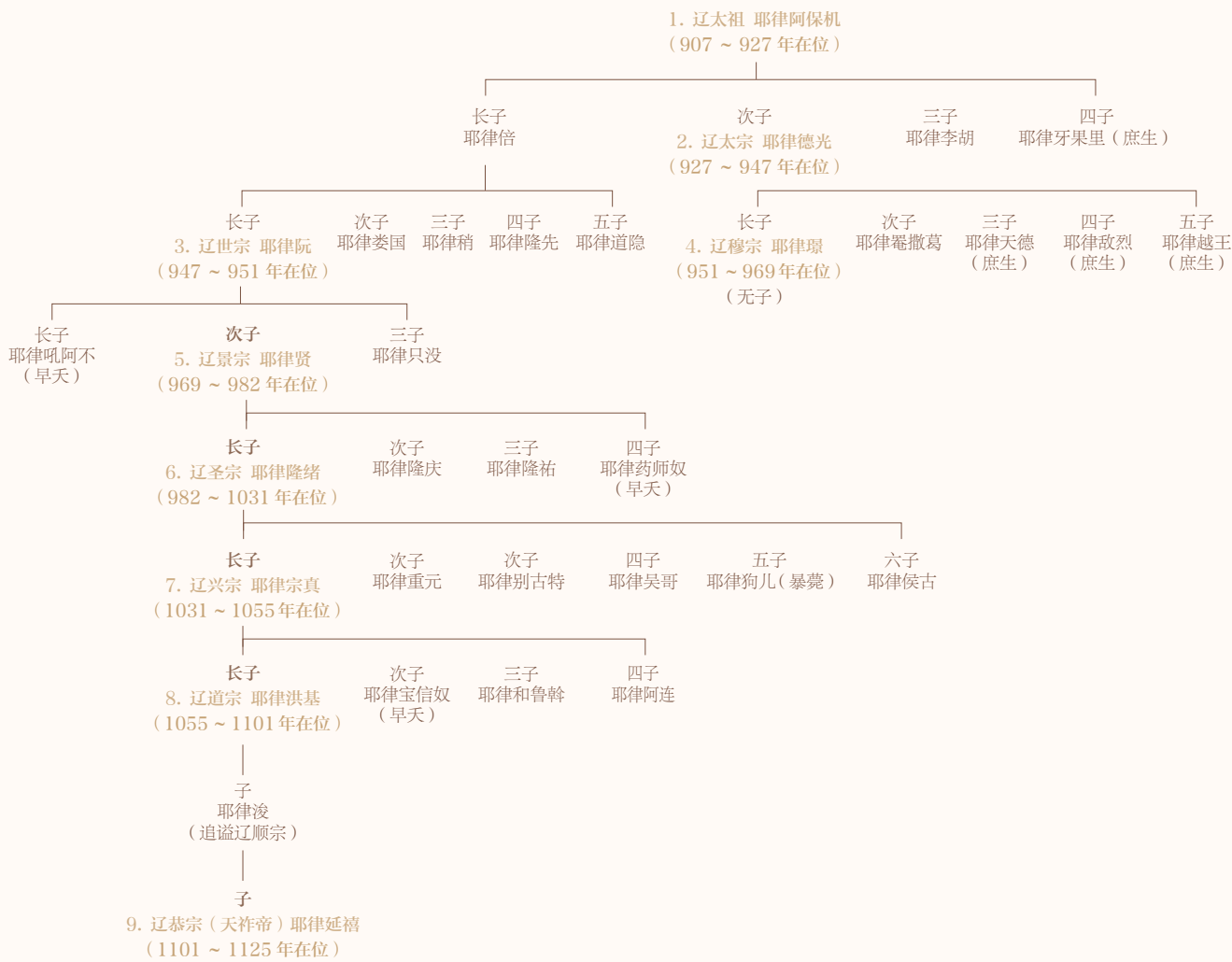
圆形，微凸起。周边有三个小孔，方便用线缝制在衣服上。镌刻图案中央为一棵树，树下一人，树右一只长耳兔，可知反映月宫吴刚伐桂的神话。这一牌饰与三足乌牌饰都出土于亡者肩部。



辽代嫡长子继承制的确立

在君主制时代，“家天下”的实质为天下是一家一姓的私产，于是产生代际继承问题。从商周开始，农耕的中原地区逐渐确立起嫡长子继承的规则。这一规则核心理念是“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春秋公羊传》）。古代君主一般有多位妃嫔，按照礼制，她们又各有名分等级。例如唐代后宫分有皇后、贵妃、淑妃、贤妃（德妃、惠妃）、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婕妤、美人、才人、宝林、御女、采女等。在这些众多妃嫔中，皇后为嫡妻，她的儿子们为嫡子；其余都是庶人，她们的儿子们为庶出。在嫡长子继承规则下，母亲地位的高低是最主要的考量因素，而年龄和才能条件相对权重不高。于是，在继承上，嫡子优先,而且嫡长子最先。嫡长子继承制为皇位代际更替确立了规则,有助于平稳交接权力。辽代的皇位继承多有波折：辽太祖去世后，帝位在长子耶律倍和次子耶律德光两房之间交替，直到辽景宗时期，才真正确立为嫡长子继承。

辽帝世系图



文物彬彬 不异中华

辽代是中华民族融合发展与形成的重要时期和典型之一，而文化认同是民族融合的前提和基础。它分不同层次，从最基本的、物质层面的认同，继而深化提升到图腾、英雄人物、价值观、族源上的认同等等。通过了解辽代契丹族在物质和精神层面的种种表现、变化与演进，对我们理解文化认同在民族融合中的作用更加清晰、明了。

◎“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的典故由来

洪皓《松漠纪闻》中记载:大辽道宗朝，有汉人讲《论语》，至“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宗曰：“吾闻北极之下为中国,此岂其地耶？”至“夷狄之有君’,疾读不敢讲。（道宗）则又曰：“上世獯鬻、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卒令讲之。

内蒙古多伦县小王力沟辽代墓葬

多伦县小王力沟辽代墓葬位于锡林郭勒盟多伦县蔡木山乡铁公泡子村五组西南约五公里的一处山谷中，当地称为“小王力沟”。2015 年 5 月，该墓葬被盗。文物考古部门对该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清理辽代大型墓葬两座（编号 M1、M2）。M1 被盗严重，随葬品残缺不全，且无墓志。M2 发掘前已被盗掘，部分随葬品被收缴追回，其他随葬品因为被坍塌的砖石、淤土掩埋得以幸存。另外根据 M2 出土的墓志可知，墓主人是辽圣宗贵妃萧氏。她曾为辽圣宗生育一男二女，统和十一年（993 年）六月病逝，年仅二十四岁。

玻璃杯

残高 8 厘米，口径 8.8 厘米
内蒙古多伦县小王力沟辽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越窑青釉刻划双凤纹碗

口径 21 厘米，底径 9.5 厘米，高 7.4 厘米
内蒙古多伦县小王力沟辽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越窑青釉刻划摩羯纹盆

高 9.5 厘米，口径 30 厘米，底径 12.5 厘米
内蒙古多伦县小王力沟辽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青釉银钵器盖

高 6.5 厘米，直径 19.8 厘米
内蒙古多伦县小王力沟辽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器盖破损，后经过铜瓷工艺加以修复，可见主人对该种瓷器的重视。铜瓷工艺是把打碎的瓷器，用银、铜、铁等金属钉钉起来，使之得以修复并重新使用。反映宋代生活的《清明上河图》里，可以看到街边“铜瓷”的场景。

越窑青釉银釦盏托

通高 8 厘米，盏口径 8 厘米，盏托口径 17 厘米
内蒙古多伦县小王力沟辽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盏为直口，弧腹，平底。托盘口沿作五曲花瓣形，敞口，斜腹。高圈足略外撇。托盘内壁饰折枝花草纹。盏口、托盘口、圈足底缘处均用鎏金银片包饰，为釦器。

越窑青釉刻划鹦鹉纹银钁注壶

通高 18.8 厘米，口径 5.6 厘米，足径 7.5 厘米
内蒙古多伦县小王力沟辽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执壶盖面隆起，圆形钮，母口。壶身为子口，短粗颈，广肩，鼓腹，矮圈足；肩部有圆形长曲流；两道扁圆泥条相合弯折成曲柄。盖钮部饰内卷菊花纹，盖面饰流云纹，母口处饰叶瓣纹和半花纹。壶身颈部饰草叶纹，肩部饰流云纹；腹部饰四组团窠鹦鹉纹，等距分布，两两相对，鹦鹉口衔折枝花草做展翅飞翔状，团窠纹之间上下辅以云纹。曲流两侧各以双弦纹分隔，其间饰卷草纹。曲柄饰穗纹，与腹贴合处饰四瓣花纹。曲流口部以银片包饰，上部焊接银盖，银盖恰与流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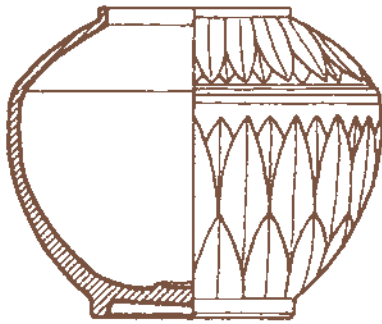
相扣，开合自如。灰白色瓷胎，胎质细密坚硬。通体施釉均匀，釉色明亮光洁。



白釉刻莲瓣纹罐

高 12 厘米，口径 7.8 厘米，底径 7.6 厘米
内蒙古多伦县小王力沟辽墓出土
多伦县文物局藏

直口，斜肩，腹部向下斜收，圈足。肩与腹部用凹弦纹相隔，肩部饰双重覆莲纹，腹部饰三重仰莲纹，均在胎模上剔刻出花纹，然后施釉。白色胎，胎质细腻。釉层较厚处略泛青黄色。圈足内刻“官”字款，刻痕较深。



白釉盖罐

高 8.7 厘米，口径 4.6 厘米，底径 4.1 厘米
内蒙古多伦县小王力沟辽墓出土
多伦县文物局藏

盖罐的盖面隆起，蒂状钮，子口。罐身母口，球形腹，圈足。
胎质较疏松，施釉较薄，胎壁有轮旋痕迹。



白釉钵

高 14.2 厘米，口径 13.2 厘米，底径 14.2 厘米
内蒙古多伦县小王力沟辽墓出土
多伦县文物局藏



三节莲花形铜烛台

通高 50 厘米
内蒙古多伦县小王力沟辽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烛台保存完整。置于后室西部。中间为圆柱状杆，可分三节。附件及装饰可分三层，顶部第一层烛台为筒形口，仰莲托。中间第二层在莲叶托中部有方形花蕾，花蕾下三个方形卡槽内嵌入三枝曲柄烛台；烛台的形状、大小基本相同，均为筒形口，仰莲托。第三层为大片莲叶，有两处经过填补的砂眼。圆柱状杆的底部连接三个弯弧蹄形足，足尖呈如意云头状。烛台的各部件分体铸造，焊接成形，然后套接、插嵌组合而成，拆装自如。



人面纹陶瓦当（2件）

- ① 残长 11 厘米，残宽 8 厘米
- ② 直径 13 厘米，厚 1 厘米
- 内蒙古多伦县小王力沟辽墓出土
-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①



②

铜渣斗

- 高 22.7 厘米，口径 32.2 厘米，底径 17.2 厘米
- 内蒙古多伦县小王力沟辽墓出土
- 多伦县文物局藏

出土时保存完整。置于后室东部。铸造、焊接成形。盘口，束颈，鼓腹，凹底。颈部一周鎏金，部分已脱落。





金戒指（3件）

戒面长 2.1 厘米，宽 1.8 厘米
内蒙古多伦县小王力沟辽墓出土
多伦县文物局藏

锤揲成形，戒面略呈椭圆形，两端为长方形。戒面模压一朵六瓣莲花，纹饰内衬以相同大小的金片使之光滑；两端镌刻缠枝蔓草纹，边缘内折。戒指十分轻薄，似为明器。



金垂饰（5件）

长 2.2 厘米，上宽 0.4 厘米，下宽 0.7 厘米
内蒙古多伦县小王力沟辽墓出土
多伦县文物局藏



银匙

长 27.1 厘米
内蒙古多伦县小王力沟辽代墓出土
多伦县文物局藏

锤揲成形。匙头呈扁平椭圆形，细长柄由圆柱状向后逐渐变宽扁，整体向后弯曲，柄端圆弧形。素面。



银箸（1双）

长 20.8 厘米
内蒙古多伦县小王力沟辽代墓出土
多伦县文物局藏

锤揲成形。呈圆条状，一端略细。

银勺

长 26.2 厘米
内蒙古多伦县小王力沟辽代墓出土
多伦县文物局藏

锤揲、焊接成形。勺头略呈圆形，浅弧腹，一侧形成流口，细长柄向后弯曲，柄端圆弧形。素面。



陈国公主墓

1985 年 7 月，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镇修建大苹果基地水库时，发现一处辽代墓地，当地文化部门及时派员进行了调查和保护。1986 年 6 至 8 月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已暴露的墓葬进行了清理发掘，其中第 3 号墓为辽陈国公主与驸马萧绍矩合葬墓。陈国公主在《辽史》中没有记载。根据墓志可知，她是辽景宗皇帝的孙女，辽圣宗的弟弟秦晋国王耶律隆庆的女儿。生于辽统和十九年（1001 年），死于开泰七年（1018 年），薨年十八岁。陈国公主的驸马萧绍矩，是辽圣宗仁德皇后萧菩萨哥的兄长，官职为泰宁军节度使、检校太师。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随葬品 3227 件，许多是用贵重材料制作而成，是极为罕见的珍贵艺术品，被评为“七五”期间全国重大考古新发现和“20 世纪中国重大考古发现”。

银盏托

通高 7.8 厘米，口径 8.4 厘米，
盘径 16 厘米，足径 6.8 厘米
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镇陈国公主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银壶

通高 10.1 厘米，口径 4.6 厘米，
腹径 9.2 厘米，底径 5.6 厘米
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镇陈国公主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直口，折肩，鼓腹，肩部接椭圆形流，柄宽扁，盖上有宝珠式纽，纽与柄间系银链。



蟠龙纹金花银奁

口径 25.4 厘米，底径 21.8 厘米，通高 21 厘米
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镇陈国公主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金花银奁子母口，平顶，圈足外撇。盖上锤錾蟠龙戏珠图案，盖外侧及盒外壁錾凤凰牡丹纹饰，錾花处均鎏金。



缠枝花纹金镯（1对）

展开长 21.2 厘米，面宽 1.6 厘米，厚 0.3 厘米
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镇陈国公主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金镯为椭圆形，镯体扁宽。正面契刻缠枝花纹，末端为两兽头相对。



双龙纹金镯（1对）

展开长 18.2 厘米，面宽 1.1 厘米，厚 0.5 厘米
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镇陈国公主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双龙纹金镯椭圆形，正面錾刻盘绕在一起的双龙，末端为两龙头相对。



带把玻璃杯

高 11.4 厘米，口径 9 厘米，底径 5.4 厘米
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镇陈国公主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玻璃杯透明，深绿色，外表有风化层。口微敛，器壁做圆筒状，肩部外鼓，腹部陡收，假圈足。在口与肩部连接扁圆形把手，把手上端有突起乳角便于把持，底外部有吹塑疤痕。原出土两件，一件已残。辽圣宗统和二十六年（1008 年）燕京留守耶律隆庆遣人设宴招待北宋使臣路振，所用“盏、罍（jiǔ）”皆颇（玻）璃、黄金、釳器”。

乳钉纹玻璃盘

高 6.8 厘米，口径 25.5 厘米，底径 10 厘米
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镇陈国公主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无色透明，表面有风化层。敞口，弧腹，圈足。此器最显著的特点是在腹部用砂轮磨出 28 个小四棱锥钉作为装饰。

乳钉纹高颈玻璃瓶

高 17 厘米，口径 6 厘米，腹径 9.5 厘米，底径 8.7 厘米
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镇陈国公主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无色透明，表面有风化层。敞口，细颈呈漏斗形，鼓腹，喇叭状高圈足，花式镂空把手。腹壁磨雕五周小乳钉纹，口沿上一周为淡蓝色，底外部有吹塑疤痕。日本大原美术馆收藏一件伊朗出土的玻璃把杯，在器形上与此杯相似。此杯把手特色之一是，把手在玻璃熔液尚未凝固前堆砌而成花式镂空的效果。

玉砚

高 2.1 ~ 2.8 厘米，长 8.5 厘米，宽 5.2 厘米
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镇陈国公主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玉砚为青白色软玉。平面呈风字形，墨池为斜面，前部有两矮足。



龙、凤、鱼形玉佩

通长 14.8 厘米
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镇陈国公主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玉佩 1 组 6 件，均为白玉。上端为一透雕长方形玉饰，下端用金链连缀透雕双龙、双凤、双鱼、飞鱼、鱼形玉饰件。

动物形玉佩

玉璧饰长 5.35 厘米，宽 4.7 厘米，厚 0.5 厘米
蛇长 5.5 厘米
猴长 2.4 厘米，宽 1.4 厘米
蝎长 3.2 厘米，宽 2.5 厘米
蟾蜍长 3.6 厘米，宽 1.6 厘米
蜥长 5.4 厘米，宽 1 厘米
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镇陈国公主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玉佩 1 组 6 件，均为白玉。上端为一花边方形玉雕，下用金链垂挂蛇、猴、蝎、蟾蜍、蜥等动物玉饰件。方形玉雕正面花边内雕一圆形，其中以极细的线条刻划十二生肖。



工具形玉佩

通长 18.2 厘米
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镇陈国公主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玉佩 1 组 7 件，均为白玉。上端为一透雕玉莲花，下用金链垂挂刀、锥、锉、勺、剪等工具形玉饰件。



青釉花口碗

高 7 厘米，口径 19 厘米，底径 6.4 厘米
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镇陈国公主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口沿较薄，外侈，弧腹，作十曲花瓣形，圈足。青釉呈暗绿色。共出土五件。



凌源小喇嘛沟贵族墓

1993 年 4 月，凌源市博物馆接到城关镇村民电话，得知小喇嘛沟发现一座墓葬，于是派人到现场勘查。月底，该墓葬遭私挖。4 月 28 日至 5 月 5 日，对该墓进行了抢救性清理。为避免墓地再次被盗，1994 年 9 月，辽宁省考古研究所对墓地进行勘查后，进行了全面的抢救性发掘，总共发掘 11 座墓葬和 2 座殉马坑。11 座墓葬中，8 座早期被盗，随葬品所剩无几。有三座墓葬未被盗扰，结构保存完整，随葬品丰富。

小喇嘛沟墓群，分布集中，排列有序，是一处家族墓。其中 M1 出土银鎏金面具和鎏金银冠等，虽然不及陈国公主墓出土金质面具所代表的等级，但是也表明墓主人身份和地位为重要的节度使或高级贵族家族的重要成员。其余十墓等级均低于 M1，推断它们的墓主人应为一般节度使或高级贵族家族的普通成员。

银鎏金怪兽纹牌饰

长 21.3 厘米，宽 13.7 厘米

凌源小喇嘛沟辽墓出土

凌源市博物馆藏

牌饰正面边缘起棱，中间一周凸棱，棱上连珠纹。外圈分布十朵如意云纹，左右各三朵，上下两端各两朵。中间补鱼子纹。内中纹饰为一怪兽，单足直立，身躯扭转，张牙舞爪，回首戏珠。身躯、四肢和尾部覆盖毛发，背部有脊线，四肢带肘毛，四爪锋利。兽左下为如意云纹，右下为山石。其余空白处细镌卷草纹。

摩羯纹银长盘

高 2.4 厘米，盘口长 23.4 厘米，宽 10.9 ~ 12.6 厘米

凌源小喇嘛沟辽墓出土

凌源市博物馆藏

盘口两端宽，中间略窄。平沿，边上折。沿上镌刻八朵如意云纹。盘底镌刻双摩羯鱼戏珠纹。摩羯鱼身侧双翅，上布短弧线纹。竭鱼头顶有新月形角，长目而圆睛，鼻子上卷，张口露利齿，长下颚，颚下短须。

鎏金银冠

通高 27 厘米，通宽 20.1 厘米，冠圈径 19 厘米
凌源小喇嘛沟辽墓出土
凌源市博物馆藏

高筒式，圆顶，两侧有对称的立翅。



鎏金银冠

通高 30 厘米，最宽处 35 厘米，冠圈径 19 厘米
凌源小喇嘛沟辽墓出土
凌源市博物馆藏

金冠结构复杂，由镂雕鎏金银片制成，鱼鳞镂空。中间为圆拱形帽圈，周围银片装饰。装饰片上用银丝缀卷云步摇。步摇片分在正面和两侧，每面各九件，三层排列。冠顶中间有一立莲花座，座上一只凤凰，芝冠长尾，张翅欲飞。冠中

间两片银片，曲花边，上镌飞鹤纹，两者中间立一人。正面两侧伸出卷云镂空银片，左右对称。帽圈背后立置两片银片，尖拱形，后片中间镌刻飞凤纹，下部云纹承托火焰纹，两侧为对称凤纹。



银鍍金男面具

长 21.5 厘米，宽 16.2 厘米
凌源小喇嘛沟辽墓出土
凌源市博物馆藏

此为男面具，长圆脸，浓眉细目，丰准阔口，法令纹深长。银鍍金面具采用锤揲工艺，形成浅浮雕的效果。



银鍍金女面具

长 21 厘米，宽 16 厘米
凌源小喇嘛沟辽墓出土
凌源市博物馆藏

此为女面具。尖长脸，长眉细目，隆颧直鼻，深中小口。面容沉静。

金属面具和网络是契丹特色的葬具。就现在考古发掘的辽代契丹人墓葬看，早期墓葬没有出土这样的面具，辽代中晚期面具出土增多，但不是所有墓主人都戴面具。具体缘由，仍待考证。



银勺（2件）

长 25.2 厘米，勺最宽 3.4 厘米

凌源小喇嘛沟辽墓出土

凌源市博物馆藏



银鎏金盘龙戏珠纹泡饰

高 2.6 厘米，底径 6.4 厘米

凌源小喇嘛沟辽墓出土

凌源市博物馆藏

泡饰为半球形。表面饰三爪盘龙戏珠纹，周围环绕波浪纹，底边以云纹和连弧纹。龙首居中，回首戏珠，身躯盘旋，龙尾从后腿一足穿过。戏珠龙身的周遭波浪翻涌，于方寸之间呈现龙腾天海之间的壮阔。



白釉小口瓶

高 35.6 厘米，口径 5.6 厘米，底径 11 厘米

凌源小喇嘛沟辽墓出土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瓶小口，短颈，溜肩，长弧腹，底部内挖成圈足。黄白色胎，质地较为疏松，胎体较厚。通体施釉，圈足部釉色脱落，并有支烧痕迹。



白釉盘口长颈瓶

高 47 厘米，口径 13.6 厘米，底径 12.4 厘米

凌源小喇嘛沟辽墓出土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瓶口部为大口盘状，颈细长，饰竹节纹，溜肩部三道弦纹，长腹，底部稍稍外展，内挖成圈足。胎质较疏，表层涂化妆土后施透明釉。局部露出胎色。



白釉盘口长颈瓶

高 39.5 厘米，口径 9 厘米，底径 9 厘米

凌源小喇嘛沟辽墓出土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瓶口部为深口盘状，颈细长，饰竹节纹，溜肩长腹，底部稍稍外展，内挖成圈足。胎质坚硬致密，表层涂化妆土后施透明釉。局部露出胎色。



青白釉花口温碗

高 16 厘米，口径 17 厘米，底径 11 厘米

凌源小喇嘛沟辽墓出土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温碗敛口，尖唇，深腹，圈足。口沿削出缺花口。口下侧腹向内压，形成内凹。外侧以内凹线为中心，印八方连续火焰纹。温碗内底见四个支烧痕。温碗胎质细腻，胎体先施化妆土，然后施青白釉，釉层从口部到底部逐渐增厚，因而青色渐变加深。



玻璃玛瑙项饰

高 16 厘米，项链直径 14.5 厘米

凌源小喇嘛沟辽墓出土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项饰 1 组 16 件，由心形坠、T 形坠、管状饰和小圆珠组成。小圆珠为玛瑙，有些表面涂有金粉，其余饰件为玻璃，表面因为侵蚀呈现乳白色。

“风”字形陶砚

长 18.8 厘米，宽 14 厘米，最高 6 厘米

凌源小喇嘛沟辽墓出土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宣化下八里辽墓壁画张匡正墓后室东壁壁画（局部）

砚池四周斜坡状，后端连弧五角形，上面压印对蝶，中间为火焰宝珠纹。宣化下八里辽代张匡正墓后室东壁壁画中也发现这种形式砚台，应为当时流行的样式。



康平张家窑林场长白山墓群

沈阳市康平县张家窑林场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考古人员先后在张家窑林场的穷棒子山、柳条通和长白山等地，发现五处辽代契丹贵族墓群。2017 年 4 月至 11 月，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长白山墓群进行了考古发掘，清理墓葬 9 座，大型房址 1 座，出土各类文物 500 余件。长白山墓群及居住址的考古发掘，大大丰富了辽代文化研究的物质资料，对于辽代契丹贵族墓葬制度的发展，墓葬形制及葬具的特征及演变，家族墓地排列关系，墓群与遗址布局，以及辽代陶瓷器、金银器、玉石器、玻璃器等器物的专项研究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白釉褐彩缠枝花卉纹梅瓶

高 29 厘米，口径 6.5 厘米，腹径 20 厘米，底径 11 厘米
康平县张家窑辽墓群出土
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梅瓶为圆唇，小口，平折沿，短细颈，鼓肩，肩部以下斜向内收，圈足底。器身除底部外均施白釉，瓶体上用褐彩绘制图案。



白釉黑彩动物纹梅瓶

高 33 厘米，口径 6.5 厘米，腹径 20 厘米，底径 10 厘米
康平县张家窑辽墓群出土
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梅瓶为圆唇，小口，平折沿，短细颈，鼓肩，肩部以下斜向内收，圈足底。器身除底部外均施白釉，瓶体上用黑彩

绘制图案。图案共有五只动物，分别为一只梅花鹿、一只羊、两条狗和一只兔子，鹿、羊、狗体型较大的四只动物均匀分布在梅瓶的四个面，两只狗位置相对，中间有鹿和羊相隔，形成狗逐鹿和狗撵羊的场景。兔子位于梅花鹿的下方。在动物上方和下方还绘有草叶纹图案。图案构成一幅草原上猎狗狩猎的场景，画面饱满，生动传神。



玛瑙管金丝球琥珀项饰

高 34 厘米，宽 18 厘米
康平县张家窑辽墓群出土
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项饰由心形坠、T形坠、玛瑙管状饰和不规则石头组成。
项链用纯金线穿成。



鸡冠壶

鸡冠壶，最初因其提梁部位状如鸡冠而命名，后来人们把腹部形状相近、提梁部位呈凹字形或环梁的仿皮囊壶也纳入其中。也有人称此类器物称为马镫壶、皮囊壶。鸡冠壶是辽墓中最常见的随葬器物，除了瓷器外，还发现了陶质、树皮质、木质与金属质地的鸡冠壶。

鸡冠壶器型流变表



根据杨晶《略论鸡冠壶》一文制作

白釉鸡冠壶

高 22 厘米，宽 19 厘米，进深 16 厘米
康平县张家窑辽墓群出土
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白釉鸡冠壶

高 24 厘米，宽 19 厘米，进深 17 厘米
康平县张家窑辽墓群出土
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赤峰博物馆藏辽代精品文物

内蒙古东部的赤峰市总面积 9 万多平方公里，发源于大兴安岭山地的西拉木伦河与发源于河北省平泉县西北部光头山北麓柳西川的老哈河流经其间，是契丹族的发祥地和文化核心区。皇都、皇陵、州县城、寺院、墓葬遗址众多，出土文物非常丰富。

铜烛台

通高 45.5 厘米，口径 3.2 厘米
赤峰市内出土
赤峰市博物馆藏



摩羯形金花银提梁壶

高 33 厘米，口径 5.4 厘米，底径 15.4 厘米
赤峰市松山区城子乡洞山窖藏出土
赤峰市博物馆藏

壶由扁平银条打制提梁，宝珠形钮的圆形帽盖，直口，椭圆形壶身。壶腹部锤揲镌刻两尾直立的摩羯鱼，双鱼张口戏珠。



百合花形铜香炉

长 30.1 厘米，高 14.8 厘米
赤峰市内出土
赤峰市博物馆藏

香炉外形似一束百合花，花茎为柄，花朵为炉，花蒂为座，花蕾为盒。此类香炉常为礼佛信众手持。



白釉剔花洗

口径 28.2 厘米，高 7.8 厘米

赤峰市公安局移交

赤峰市博物馆藏

洗为青灰色瓷胎，化妆土罩透明釉。
七曲花口，圈足。内壁剔出一圈牡丹花瓣纹，洗心剔出牡丹花蕊纹。



绿釉莲瓣纹盘口瓶

通高 30 厘米，口径 9.5 厘米，足径 8.5 厘米

克什克腾旗二八地辽墓出土

赤峰市博物馆藏

瓶盘口，竹节状颈部，直腹，平底，腹中部堆砌八个连瓣纹，形似仰莲。器身釉色以深绿为主，在莲瓣以下施褚黄滴釉，釉色浓郁。



黄釉五联套盒

通高 21.9 厘米，每盒高 5 厘米，口径 6.6~12.6 厘米
翁牛特旗解放营子辽墓出土
赤峰市博物馆藏



绿釉龙首提梁鸡冠壶

通高 23.5 厘米，腹长径 18.5 厘米
翁牛特旗广德公乡辽墓出土
赤峰市博物馆藏

直口，鼓腹平底。腹部有半环形仿皮囊壶缝合线。壶上以弓背行龙为提梁。通体施墨绿色釉。



绿釉刻花鸡冠壶

通高 23 厘米，口径 4.3 厘米，底径 8.2 厘米
翁牛特旗广德公乡辽墓出土
赤峰市博物馆藏

双孔，直口，扁圆形腹，底部内凹。肩部有细密仿皮囊壶缝合线，两侧装饰半圆纹，腹部装饰同心圆，外圆内刻连续半圆纹。通体施绿釉。

黄釉提梁鸡冠壶

通高 27.2 厘米，口径 3.3 厘米，底径 7.1 厘米
赤峰市内出土
赤峰市博物馆藏

壶直口，环梁，褐色瓷胎，上覆化妆土，施橘黄色釉。
下部露胎，圈足。



三彩鸳鸯形壶

高 20 厘米，口径 8.3 厘米，底径 9 厘米
赤峰市松山区王家店辽墓出土
赤峰市博物馆藏

三彩壶为浅褐色瓷胎，上覆一层化妆土，分施黄、白、
绿三彩釉。整体造型为一只凫水鸳鸯。鸳鸯背上有花形壶口，
壶口下部以弧形水波纹柄与鸳鸯尾部相接。鸳鸯喙部为流口。



白釉绿彩剔花洗

高 7.5 厘米，口径 30.5 厘米，底径 21.2 厘米
赤峰市公安局移交
赤峰市博物馆藏

洗为粉红色瓷胎，施白釉。敞口，卷沿，圈足。用剔花、划花技法在洗内底中央制作出四角星、四片花叶相交图案，双圆圈，圈内绘双鱼图。略施绿彩。



绿釉印花海棠盘

高 2.5 厘米，长 30.4 厘米，宽 17.8 厘米
赤峰市松山区初头朗乡西山根辽墓出土
赤峰市博物馆藏

盘面施绿色釉，宽平沿，浅腹平底，呈八曲海棠花形。盘内印有流水落花，口沿印缠枝纹。



白釉“官”字款镶金釦花口盘

高 5 厘米，口径 22.3 厘米，底径 8.7 厘米
赤峰市松山区大营子辽驸马赠卫国王墓出土
内蒙古博物院藏



白釉人首摩羯形壶

高 16 厘米，长 19.5 厘米，口径 3.5 厘米，底径 7.5 厘米
赤峰市巴林右旗乌兰套海苏木出土
内蒙古博物院藏

通体白釉，壶前端为一少女头像，眉目清秀，头戴发髻，颈臂间有彩带、花朵做贴饰，双手捧一螭首短注；壶身呈鱼形，尾鳍上翘，身刻细鳞片，腹两侧各附一欲展翅的飞翼，背中部有一莲瓣形注口，颈部和尾鳍之间有一桥型提梁。这件水注将人及鱼（龙）、鸟、螭等动物混合为一体，构思绝妙，造型奇特，是辽瓷中罕见的造型。



水晶坠（2件）

心形长 3.5 厘米，T 形长 6 厘米
赤峰地区出土
赤峰市博物馆藏



青白玉镂雕飞天

长 5.2 厘米，宽 3.2 厘米，厚 0.5 厘米
赤峰市翁牛特旗解放营子辽墓出土
赤峰市博物馆藏



器身略成三角形，飞天腰系飘带，下托浮云，凌空飞翔之态。制作精致，小巧玲珑。

玛瑙玉项饰

周长 47 厘米
赤峰地区出土
赤峰市博物院藏



白釉绿彩刻花洗

高 8.3 厘米，直径 32 厘米，底径 20 厘米
赤峰公安局移交
赤峰市博物馆藏

粉红色瓷胎，施白釉。敞口，卷沿，假圈足。用划花技法在洗内底中央制作一株牡丹图。花上施绿彩，点饰花蕊。



内蒙古史前文化博物馆藏辽代文物精品

敖汉旗位于内蒙古赤峰市东南部，辽代分属中京、上京辖地，辽墓众多，出土文物丰富，敖汉旗内蒙古史前文化博物馆保存有 80 余幅的辽墓壁画，是我国保存辽墓壁画最多的博物馆。

白釉银釦钵

高 6 厘米，口径 8.1 厘米，底径 2.9 厘米

敖汉旗南塔乡石塔子 1 号墓出土

内蒙古史前文化博物馆藏

瓷钵口镶银釦，瓷胎极薄，厚度 1.2 ~ 1.25 毫米。小圈足，足上有三个支钉痕迹，证明此钵为仰烧。



绿釉瓜棱执壶

通高 14.2 厘米，口径 3.6 厘米，底径 6.5 厘米

敖汉旗林家地乡西沟墓出土

内蒙古史前文化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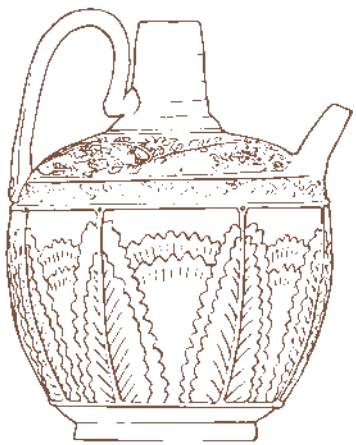
执壶绿釉灰胎，带盖，腹部呈瓜棱，上刻印羽毛纹。



白釉蕉叶纹温碗、注壶（2件）

执壶通高 19 厘米，口径 2.8 厘米，底径 8.3 厘米
温碗高 13.5 厘米，口径 11.9 厘米，底径 9.8 厘米
敕汉旗金厂沟梁镇姚家沟耶律元宁墓出土
内蒙古史前文化博物馆藏

温碗、注壶为一组，皆白釉白胎。深腹温碗为八曲花口，
外壁压出双层芭蕉叶纹。注壶为直口，高领，平肩小流口。
肩腹部以压出宽槽为界限，肩部为四朵缠枝牡丹纹，腹部为
双层芭蕉叶纹。



白釉刻莲瓣纹执壶

高 19.2 厘米，口径 7.4 厘米，底径 9.8 厘米
征集
内蒙古史前文化博物馆藏

执壶直颈芒口，溜肩圆腹。龙首流口，壶肩部与壶腹以
凸棱为界，肩部剔出双层覆莲，腹部剔出仰莲。覆、仰莲之
间的胎体变薄，呈现半透明状。扁柄，上堆一线，至口沿处
旋系三圈。整壶为灰白瓷胎，乳白色釉。





定窑酱釉碗

高 5.7 厘米，口径 16.3 厘米，底径 5.6 厘米
敖汉旗牛古吐乡小坑子墓出土
内蒙古史前文化博物馆

酱釉碗，胎较薄，碗内壁为模压凸花。底部为牡丹花，壁分六格，每格总为一花卉。其中有月季、牵牛花、菊花等。

竹节柄莲花烛台

高 37.8 厘米，底足宽 18 厘米
征集
内蒙古史前文化博物馆藏

烛台分三部分，顶部莲花三层，中托圆筒以插蜡烛。圆筒上下沿加箍，身刻数道弦纹。持柄为竹节式样，共 8 节。三足鼎立，足端为花瓣形。



白釉褐彩鹿鹤花卉纹梅瓶

高 31 厘米，底径 8.5 厘米，最宽 12.5 厘米
文物公司移送
首都博物馆藏



绿釉鸡冠壶

高 22 厘米，宽 18 厘米，进深 15 厘米
敖汉旗金厂沟梁镇沙子沟墓葬出土
内蒙古史前文化博物馆藏

褐色陶胎，施浅绿色釉，局部有橘红色窑变。鸡冠壶上部扁平，底部近乎圆形，侧观呈三角形。扁桃样鸡冠，中穿一孔，直口圆唇。两侧有仿皮质缝合线的凸棱。



双鱼纹银碗

通长 14 厘米，口径 8.5 厘米，高 3.5 厘米
征集
阜新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图腾文化的接受

在原始社会，图腾是群体的象征。由一个图腾，人们可以推理出一个族群的神话、历史记录、习俗。对图腾性质纹饰的接受可以表明族群融合层次的深度。龙凤纹是中原地区流行的带有图腾形性质的纹饰，而在辽代的文物遗存中，这些纹饰非常常见。

◎ 龙纹饰

龙纹是辽代最主要的纹饰之一，广泛地装饰于丝织品、石刻、壁画、铜镜以及金银器上。总体上辽代的龙纹与唐代的龙纹比较接近。



唐鎏金龟负“论语玉烛”
银筹筒的龙纹



唐鎏金龟四天王盃顶
宝函的龙纹



辽双龙纹山形简式
银冠的龙纹



辽十三曲
龙纹银盘的龙纹



辽晚期
壁画的龙纹



辽盘龙纹
银奁的龙纹



辽双龙纹银
鞍桥的龙纹

龙纹铜饰件

残长 72 厘米，最宽 23 厘米

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双龙纹铜镜（1对）

直径 21 厘米
征集
阜新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盘龙纹铜镜

直径 28 厘米，厚 1 厘米
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盘龙纹铜镜宽平沿，圆形纽。镜面抛光，镜背模铸四爪
盘龙，龙口含珠，珠即镜纽。龙纹通体鎏金，造型优美。



◎凤纹饰

在辽代，凤纹饰的使用比龙纹饰还要广泛。典型的凤纹饰是凤头较大，头上有灵芝冠，四角大眼，鹰钩喙，展翅，三四根长翎的尾或阔叶纹的尾。



凤纹彩绘石桌面

长 76.5 厘米，宽 57 厘米，厚 7 厘米
辽怀陵遗址床金沟辽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石桌面由绿砂岩磨制，长方形，面上浮雕纹饰。中间菱形框内主体图案为双凤，并饰花卉纹。菱形外饰花卉纹，底色涂朱色。框外四周各饰花卉纹，花朵处涂朱色。



凤形鎏金银钗

通长 17 厘米
征集
赤峰市博物馆藏

钗首为一凤凰，振翅飘尾，立于云团之上。通体鎏金。



银鎏金对凤纹冠饰

通高 12.5 厘米，横梁宽 15.3 厘米
凌源小喇嘛沟辽墓出土
凌源市博物馆藏

鎏金薄银片制成。镂空双凤相对，立于如意云纹上。立凤勾喙长颈，芝冠长髯，翅振而尾卷，双凤之间为四重如意云纹。下部横梁中间鑿刻缠枝花叶，左右对称，边缘连珠，两端为芝冠凤首。



浮雕四神石棺

通高 66 厘米，底座长 91.5 厘米，宽 77 厘米，
盖长 82 厘米，宽 70 厘米
康平县张家窑辽墓群出土
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四神石棺盖体分离，用两块淡绿色砂岩雕刻而成。整体呈殿式。棺盖为庑殿顶，四面坡，正背两面各纵排 26 条瓦垅，左右两面各横向瓦垅 18 条，檐下雕半圆弧形滴水。四垂脊尽头各雕一吻兽，圆目，有须，阔口露齿。正脊背上有两长方形刻槽，推测上面原有装饰物。底座为方形，素面。棺体左、后、右三面为板壁，前雕门窗，前后两面均有承檐柱四根，将前后两面均分为三部分，形成面阔三间，进深一间的样式。柱础为覆盆莲花状，正面立柱出露 5 个棱面，推测为八棱形

柱，上部略窄。立柱间有普拍枋，枋间承两朵斗拱，斗拱上乘撩檐门檻，框内板门两扇，四角雕有三叶状花纹，门正中雕出门环及铁锁。门楣正上方浮雕朱雀图案。朱雀体态端庄秀丽，双足扣于门楣之上，圆眼、尖喙，双翅横展呈预飞翔状，头顶 5 条羽毛，翎羽雕刻得十分精细。门左右两侧雕长方形棂窗，左侧 8 条竖向窗棂，右侧 5 条。后面正中浮雕玄武图案，四周无装饰。龟身粗壮，昂首，短尾，卧伏于地，一蛇缠绕于龟身之上，尾弯曲，仰脖，低首，与龟四目相视，形象生动、逼真。



四神二十八宿

古人仰观天象，将春分傍晚的星空划分为东、南、西、北四大区域，并将各区域内由恒星连成的形状想象成了四种带有灵性的动物，即东方青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称为四神，又称四象或四灵。每一“象”又由七段更小的“宿”组成，每一“宿”也被想象成一个“星官”的形象，共二十八宿。四神及其各自包含的七个星宿合称“四神二十八宿”。

彩绘木雕饰（3块）

高 35 厘米，宽 20 厘米

征集

辽宁省博物馆藏

辽宁省博物馆于 20 世纪 90 年代征集到四块彩绘木雕饰，据传出自内蒙古巴林右旗。

浮雕一为武士形象。虎首人身，龇牙怒目，面相狰狞，肩部披红巾，身着铠甲，腰部束一腰带，下垂丝带，斜跨一弓囊，内置弯弓。右手持一骨朵，左手五指分开。脚蹬短靴，脚下踏三朵祥云。对比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明《仇英款宿神形图卷》可知其为二十八宿之危宿。

浮雕二为一人骑于神兽背上。此人面目狰狞，头上秃顶，

两侧头发飞扬向上。上身赤裸，下着红裙，赤脚。神兽似马非马似牛非牛，作奔跑状，神态生动。头上有尖角和长鬃，圆眼，颈部拴有项圈。腿较短而粗壮有力，脚分四趾，尾巴较长如马尾，其下踏有三朵祥云。人物胸部仍残留有红彩。对比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明《仇英款宿神形图卷》可知其为二十八宿之毕宿。

浮雕三为一儒士形象。此人戴黑头巾，留有胡须，身穿长衫，跏趺坐姿，坐于三朵祥云之上。手放于膝盖，帔帛自双肩绕臂垂下。比较于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明《仇英款宿神形图卷》可知其为二十八宿之觜宿。

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木雕饰与辽庆陵皇族陪葬墓耶律弘本墓中出土的三件木板浮雕人物像形制、雕刻技法完全相同，只是图像人物有异，应为一组。



危宿



毕宿



觜宿





族源认同

契丹族源认同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很大不同。史料中有青牛白马的传说，也有奇首可汗的传说，甚至有将两个族源传说混淆的记载。但是到辽代后期，才有了新族源认同，认为契丹为炎黄后裔，而且这种民族认同也得到新出土墓志的证明。契丹族民族认同的变迁是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的一个典型与缩影。

耶律羽之墓志（拓片）

长 112 厘米，宽 103 厘米，厚 13 厘米

赤峰市阿鲁科尔沁耶律羽之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契丹人有青牛白马的族源传说。据《辽史》记载：“相传有神人乘白马，自马孟山浮土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车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相遇为配偶，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行军及春秋时祭，必用白马青牛，示不忘本云。”土河即老哈河，潢水即西拉沐沦河，契丹族在两河交汇处繁衍生息。学界认为，青牛白马传说透露给我们的历史信息是，一支来自西拉木伦河流域的部族和一支来自老哈河流域的部族相融合形成契丹族，其中心地在木叶山附近。学者刘浦江指出，张孝杰所撰《兴宗仁懿皇后哀册》中记载的：“昔年偶圣，仙輶从水以下流；今日辞凡，龙轡拂霄而高驾”，前半句用典即出自青牛白马传说。

在青牛白马传说之外，契丹人很早就确认了自己的东胡族系。耶律羽之墓志载：“其先宗分佉首，流出石槐”，佉首即奇首可汗。《辽史》记载：契丹之先，曰奇首可汗，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居松漠之间。奇首的事迹不可考证，但是在公元 941 年，也就是耶律羽之下葬前一年，辽太宗耶律德光派人编修《始祖奇首可汗事迹》，这表明，在辽代初期，官方认定奇首可汗是皇室始祖。石槐即《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第八十》所记载的鲜卑大人檀石槐。他曾经立王庭于弹汗山，南掠汉边，北拒丁零，东却夫馀，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东西一万四千余里。据此可知，耶律羽之墓志确定了“鲜卑－契丹”之间的族系渊源关系。

【耶律羽之墓志文】

大契丹国东京太傅相公墓志铭并。序蓟门邢明远撰并书。夫欲建皇极，扇薰风，必资栋梁之材，更籍盐梅之士。其或非熊应兆，卧龙见称。时推命世之贤，代许问生之杰。股肱王室，经营霸图。升坛则四海具瞻；拜幕则三军禀令者，其惟太傅相公欤。公讳羽之，姓耶律氏。其先宗分佉首，派出石槐。历汉魏隋唐已来，世为君长。曾祖讳勤德，迭列夷离董，北大王。九领节钺，十全功勋。祖讳曷鲁，匝麦夷离董，两奉王猷，控制藩屏。列考讳泓思，涅列夷离董，金云大王。剑履承家，旌麾显世。皇妣夫人邈屈耐奇，叔划宰相之女也，贤方卫女、德比樊姬。生六男六女，公即金云大王弟四息也。长兄曷鲁，于越、北大王。次兄汧里瑩，前北大王，东丹国大内相。季兄涅列神子舍利。弟护之、术宝舍利，并早亡。姊妹六人，皆适高门望族之家。

公星辰诞粹，河岳降灵。德符九三，贤当五百。幼勤事业，长负才能。儒释庄老之文尽穷旨趣，书算射御之艺无不该通。咸谓生知，亦曰天性。事有寓目历耳者终身不忘，言有可记堪录者一览无遗。博辩洽闻，光前绝后。

比及大圣大明升天皇帝收伏渤海。革号东丹。册皇太子为人皇王，乃授公中台右平章事。虽居四辅之末班，独承一人之顾命。寻授钺专讨，克致大功，旋加太尉，招抚边城。比至班师倒载，又加大傅，判盐铁，封东平郡开国公，食邑一千户。天显二年丁亥岁，迁升左相，及总统百揆，庶绩咸熙。以天显四年己丑岁，人皇王乃下诏曰：联以孝理天下，虑远晨昏，欲效盘庚，卿宜进表。公即陈辽地形便，可建邦家于是。允协帝心，爰兴基构。公夙夜勤恪，退食在公。民既乐于子来，国亦期年成矣。天显十三年戊戌岁，嗣圣皇帝受大晋之册礼也，即表公通敏博达启运功臣，加特进阶，上柱国，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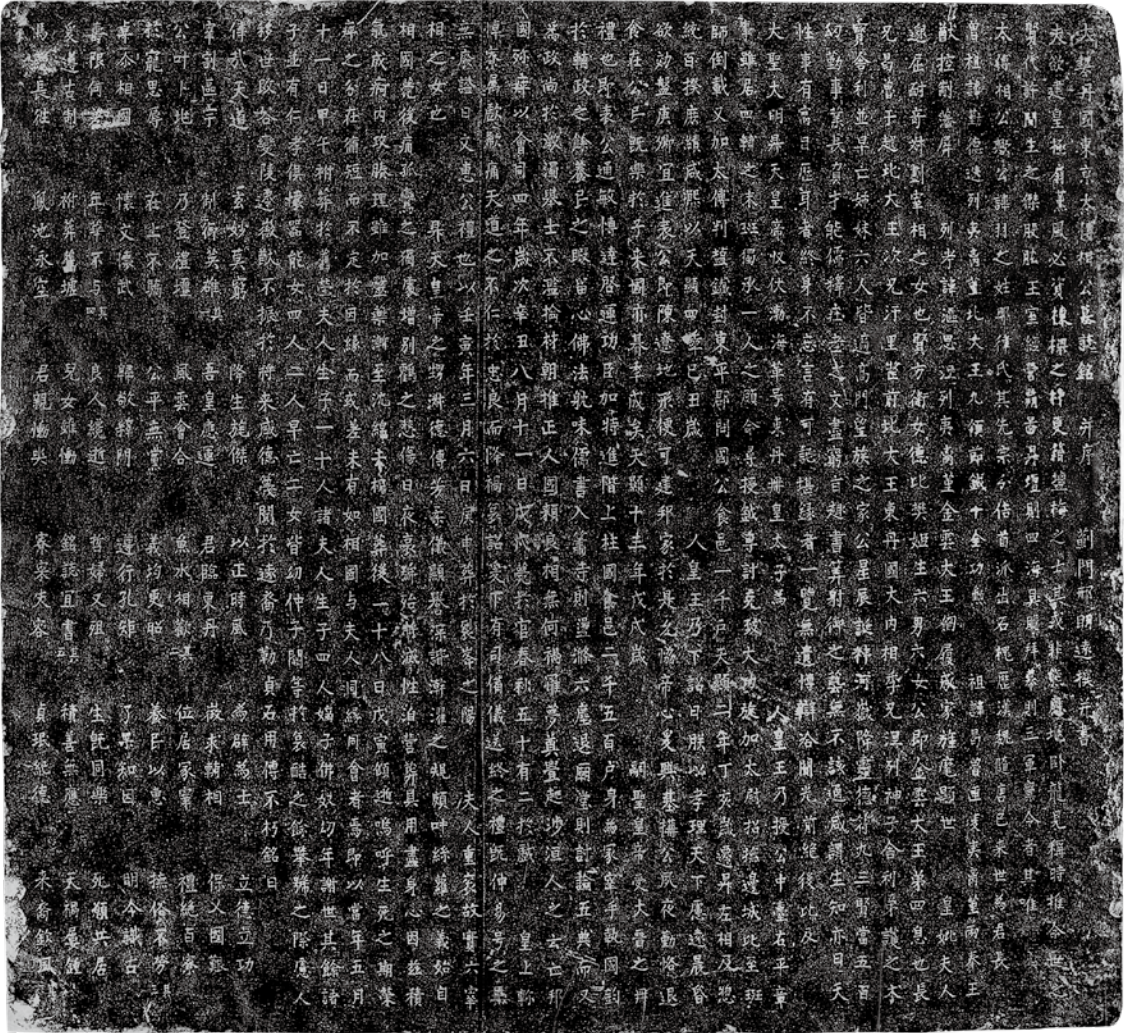
邑二千五百户。身为冢宰，手执国钧，于辅政之余，养民之暇，留心佛法，耽味儒书。入萧寺则荡涤六尘，退庙堂则讨论五典。而又为政尚于激浊，举士不滥抡材。朝推正人，国赖良相。无何祸罹梦奠，叠起涉洹。人之云亡，邦国殄瘁，以会同四年岁次辛丑八月十一日戊戌薨于官，春秋五十有二，于戏！

皇上轸悼，僚属歔歔。痛天道之不仁，于忠良而降祸。哀诏爰下，有司备仪，送终之礼既伸，易号之葬无废，谥曰文惠公，礼也。以壬寅年三月六日庚申葬于梨峰之阳。

夫人重袞，故实六宰相之女也，升天皇帝之甥。淑德传芳，柔仪显誉。深谙瀚濯之规，颇戔戔丝缕之义。始自相国薨后，痛孤莺之独处，增别鹤之悲伤，日夜哀号，殆将灭性。洎营葬具，用尽身心。因兹积气成疴内攻腠理，虽加医药，渐至沉绵，去相国葬后一十八日戊寅倾逝。呜呼！生死之期、荣瘁之分在悠短而不定，于因缘而或差，未有如相国与夫人同缘同会者焉。即以当年五月十一日甲午祔葬于旧茔。夫人生子十一人，诸夫人生子四人。嫡子佛奴，幼年谢世，其余诸子，

并有仁孝，俱怀器能。女四人，二人早亡，二女皆幼，仲子阙等，于哀酷之余，攀号之际，虑人移世改，谷变陵迁，徽猷不振于将来，盛德箴闻于远裔，乃勒贞石，用传不朽。

铭曰：伟哉天道，玄妙莫穷，降生旒杰，以正时风，为辟为士，立德立功。宰割区宇，制御英雄。其一吾皇应运，君临东丹，征求辅相，保义国艰，公叶卜兆，乃登礼坛。风云会合，鱼水相欢。其二位居家宰，礼绝百僚，于宠思辱，在上不骄，公平无党，义均更昭。养民以惠，抚俗不劳。其三卓尔相国，怀文怀武，归敬释门，遵行孔矩，了果知因，明今识古。寿限何差，年华不与。其四良人才逝，哲妇又殂，生既同乐，死愿共居，爰遵古制，祔葬旧墟。儿女虽恻，铭志宜书。其五积善无应，天祸屡钟，马鬣长往，凤池永空，君亲恻哭，僚案失容，贞珉纪德，来裔钦风。其六



永清公主墓志（拓片）

高 110 厘米，宽 68.5 厘米，厚 15 厘米
阜新市平安地乡阿汉土村宋家梁屯辽墓出土
阜新蒙古自治县民族博物馆藏

2003 年，辽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平安地乡阿汉土村宋家梁屯北山辽墓又出土了《永清公主墓志》。墓志中记载称“盖国家系轩辕黄帝之后”。轩辕即黄帝。永清公主是辽景宗第三子辽圣宗之弟耶律隆裕（《辽史》作耶律隆祐）的孙女。其父契丹人耶律宗熙（贴不）历辽圣宗、兴宗、道宗三朝。该墓志篆刻于辽道宗寿昌元年（1095 年）。在此之前的 1989 年，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杨家营子镇石匠沟辽墓出土了《大契丹国夫人萧氏墓志》，墓志谈到萧氏的丈夫契丹人耶律污斡里时，宣称“公讳污斡里，其先出自虞舜”，明确将黄帝之子昌意的七世孙虞舜，说成是契丹人耶律污斡里的祖先。而萧氏丈夫耶律污斡里在辽圣宗时曾任上京留守，萧氏死于辽圣宗统和二十七年（1009 年）。他们生活的时代基本上在辽圣宗时期。这两块墓志表明辽代中期以后，契丹人已经自称为炎黄子孙。因此，史官耶律俨纂修《皇朝实录》称“辽为轩辕后”。

【永清公主墓志文】

大辽永清公主墓志铭并序，敕祭发引使、朝散大夫兼司农少卿、陇西县开国子、食邑伍佰户，上骑都尉、赐紫金鱼袋李叔撰

夫人之生也，孰不爱其贵、贪其富、求其寿？世所贵者，惟帝王之胜族。生则银潢接派，玉叶联荣。品职踰于常，服馭异于俗；飘飘然，雄雄然，出入皇阙，逍遥宝綬；此所谓贵之极。世所富者，惟荣豪之极家，生则金翔凤盖摇辉，锵鸣玉于前，鞞翠翘于后；郁郁然，游游然，栖安遽居，优仰青阁；此所谓富之极。世所寿者，处清平之化国，乐钦明德，僖億粹駟，常燕榕其志，忘忧戚之慄；欣欣然，坦坦然，自在仙乡，保全上性；此所谓寿之等级。窃见公主之所出也，生皇王之家，岂不谓贵矣；衣金紫之色，岂不谓富矣；见鹤华之发，岂不谓寿矣。既贵且富又寿，世之所未有也。原其姓耶律氏，景宗孝彰皇帝之嗣女也，圣宗孝宣皇帝之侄孙。

盖国家系轩辕黄帝之后。祖曰高七，圣宗孝成皇帝之季弟，生而纯粹，长而英灵，忠孝立节，勤劳王家。上嘉其贤笃，以兄弟之功，封齐国。每以盛兴迎幸，春蒐夏苗，秋猕冬狩之际，饮食宴乐，靡曾一日而辍其左右。祖母封夏侯妃。父宗湫，齐国王弟三子。帝以连其近戚，初封裕彰郡王，次封卫王。母曰萧氏，大国舅小翁帐，駙马都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萧克忠女也。善属文章，尤精书笔，至于游艺，动则异于群矣。有亲伯二人，长曰胡都姑，封周王；次曰宗范，封三韩王。有第五人，长曰弘仁，清宁四禩间，承皇上之眷祐，特授左威卫上将军；弟弘义，自幼除大宁军节度使；弟弘礼，器度渊沉，回旋谦雅，举措骨气与并祖圣宗孝彰皇帝相肖。自条年授邓州观察使；弟弘智，贵州观察使；弟弘信，左监门卫上将军。从长则离于王家，适大国舅帐王五駙马男左千牛卫将军大山，讳彥弼、字良辅，为偶。有子三人，长曰昕深，德行□纯，寡言辞而尚密，襟幪慤俊，内刚外柔，有古君子之风骚；旦夕精意敬养父母；前任御院通进，朝廷考绩连宸，移任大国舅□翁将军。妻曰欲混，遥辇帐燕京同知留守、左仆射睿思女也。有子三人，阿僧、韩家奴、哥得。次曰咳，内富聪明，外扬风彩，教明五□，字晓三体。见事情则闻一知十，能以至孝事亲，尤精浮图氏之宗旨，常以读《华严经》为意。妻曰阿里，有子三人，特末里、宜哥、那哥。次曰盼，体儿英俊，尤善骑射，与友人相交，惟恭谦而已矣。妻曰向里朶，有子四人，如意奴，何里只、五斤、陈十。有女五人，长曰贤圣哥，赋性贤淑，德融敦厚，适大横帐魏王宗湫男邓州观察使弘礼。次曰贵哥，适大横帐于越王孙涅哥；次曰得哥，适王子班宓里；次曰师姑，体儿婣媚，语态轻丽，若春花之弄雨，素禀贞贤，有大丈夫器节，加以好习理性，多以《金刚圆觉经》属于贵念，适大横帐思□副枢亲弟蒲速里；次曰延哥，幼年尤在宝室。殊不知主之始来也，或星女之间，大罗之天；或浴水浦，苕萝之湾。别神仙之界，来帝王之家。颜膩红玉，艳浮春葩。动止轻俊，状垂杨之舞风；言语清零，讶碎琼之飘屑；加以精通词墨，善理笙琶。入则栖仙馆，眠锦帐；出则馭绣辇，乘宝马，琼衣玉食，为之常也。故万乘降以殊恩，疎其郡爵，人之极□□终其去也，或王母之宫，瑶池之室；或王□之殿，紫府之乡。芝骈永返，羽盖长归。豪郡之仙魂，一去怅望春风；兰陵之影帐，空存凄凉夜月。祠山旧色，原草长烟。朝则奠琼醪，□□楮；暮则寂

踈林，栖玄壤。罇酒簋餌，是所适也。故皇上念其内亲，敕行大祭，此人之荣也。遂遣司农少卿李权为敕祭发引使。万代仪礼，悉皆备焉，仍奉朝旨，取到中京导驾吉仪及差甲兵四十人。夫将军，大安三年三月十六日不禄，葬于兰陵郡之甲地。公主寿昌元年二月二十□日薨于豪州。当年岁次乙亥六月乙丑朔二十六庚寅日癸时，以信贞之故，同穴而葬之已矣。权奉命之际，承其□托，辞谢不已，强为铭曰：钦哉公



主，生自王家，银潢接派，帝萼分葩。精含瑞玉，脸丽春花；长则从人，礼丰乐奢；步摇金履，衣翻彩霞；赋性贞善，为人淑嘉；质而靡约，文而不华；严令教□，柔规治家；伟矣千载，名留则遐。寿昌元年六月二十六日志铭。

（转载自袁海波、李宇峰：《辽代汉文“永清公主墓志”考释》，《中国历史文物》2004 年第 5 期）



萧贵妃墓志（拓片）

边长 89.6 厘米

多伦小王力沟辽代墓葬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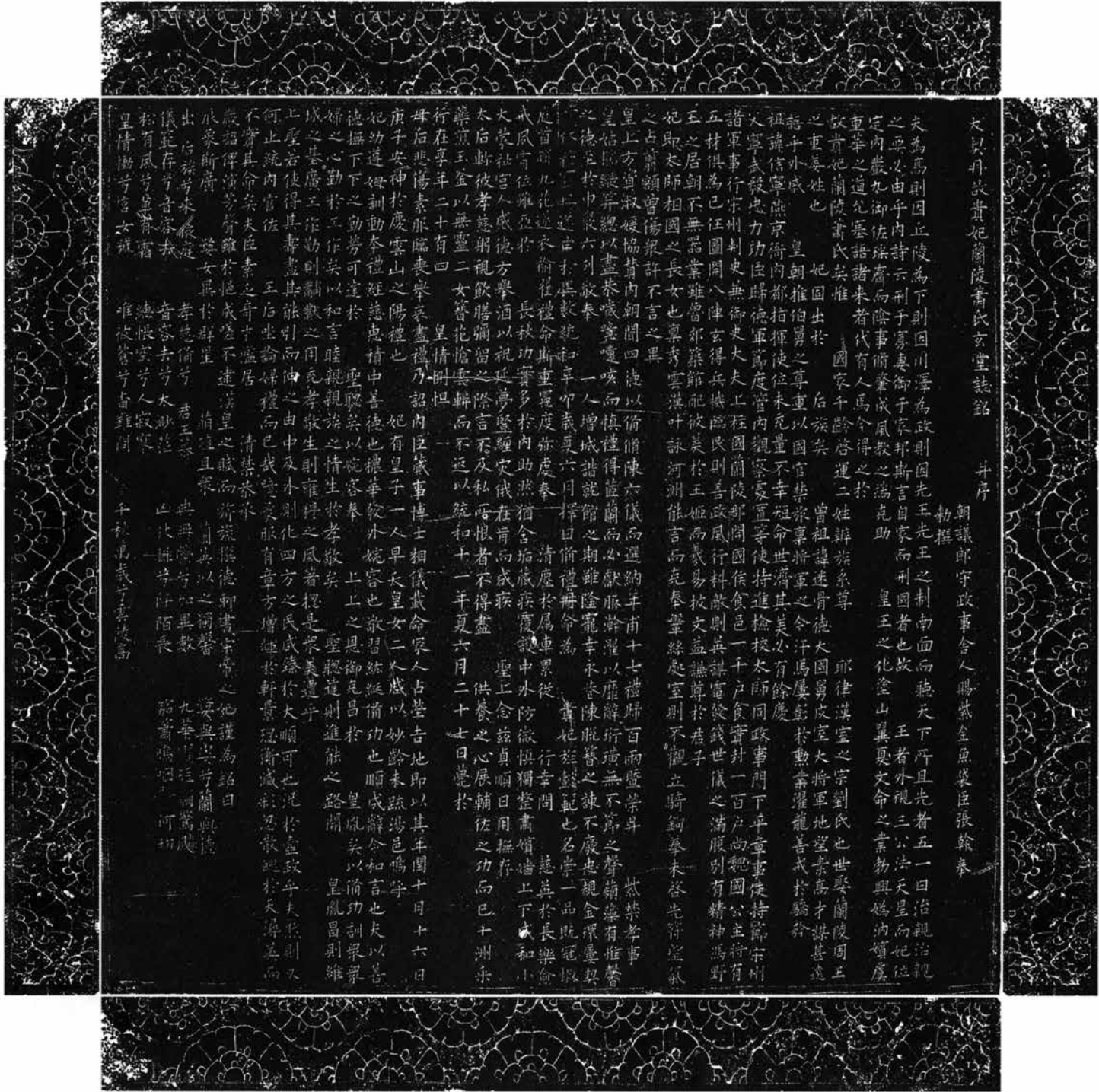
皇室汉姓反映出的英雄价值观可从《辽史》中看出。《辽史·后妃传》：“太祖慕汉高皇帝，故耶律兼称刘氏；以乙室、拔里比萧相国，遂为萧氏。”

【萧贵妃墓志文】

大契丹故贵妃兰陵萧氏玄堂志铭并序，朝议郎守政事舍人赐紫金鱼袋臣张幹奉敕撰。

夫为高则因丘陵，为下则因川泽，为政则因先王。先王之制，南面而听天下，所且先者五，一曰治亲。治亲之要，必由乎内。诗云：刑于寡妻，御于家邦。斯言自家而刑国者也故。王者外视三公，法天星而妃位定；内严九御，佐瑶齐而阴事修。肇成风教之端，克助皇王之化。涂山翼夏，文命之业勃兴；妫汭嫔虞，重华之道允塞。语诸来者，代有人焉，今得之于故贵妃兰陵萧氏矣。惟国家千龄启运，二姓辨族系尊，耶律汉室之宗刘氏也。世娶兰陵，周王之重姜姓也。妃固出于后族矣。曾祖讳迷骨德，大国舅、皮室大将军，地望素高，才谋甚远。语乎外戚，皇朝推伯舅之尊，重以国官禁旅。禀将军之令，汗马屡彰于勋业，濯龙善戒于骄矜。祖讳信宁，燕京衙内都指挥使。位未充量，不幸短命，世济其美，必有余庆。父宁，武毅忠力功臣，归德军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特进检校太师、同政事门下平章事、使持节宋州诸军事、行宋州刺史兼御使大夫、上柱国、兰陵郡开国侯、食邑一千户、实封一百户，尚魏国公主。将由五材，俱为已任；图开八阵，玄得兵机；临民则善政风行，料敌则英谋电发。钱世仪之满腹，别有精神；冯野王之居朝，不无器业；虽鲁郊筑馆，配彼美于王姬，而义易披文，益谦尊于君子。妃即太师相国之长女也。禀秀云漠，叶咏河洲；能言而克奉擎丝，处室则不观立骑；钩拳未启先符，望气之占翦额；曾伤众许，不言之异。皇上方资淑媛，协赞内朝；闻四德以备修，陈六仪而选纳；年甫十七礼归，百雨暨荣升紫禁。孝事皇姑，□纵笄总以尽恭，哆噫嚅咳而慎礼；得萱兰而必献，服瀚濯而靡辞；

珩璜无不节之声，蘋藻有惟馨之德；至于申严六列，敬奉一人，增城谐就馆之期；虽隆宠幸，永巷陈脱簪之谏；不废忠规，金环屡契，□□□□□遥由于异数，统和辛卯岁夏六月，备礼册命为贵妃，旌懿范也。名崇一品，既冠椒庭，首□九花，□衣褕翟；礼命斯重，宪度弥虔；奉清尘于属车，累从行幸间。慈英于长乐，愈戒夙宵；位虽亚于长秋，功实多于内助；然犹含诟藏疾，覆护中外，防微慎独，整肃嫔嫞；上下咸和，小大蒙祉；宫人感德，方举酒以祝延，梦竖缠灾，俄在青而成疾；圣上念兹贞顺，日用抚存，太后轸彼孝慈，躬视饮膳。弥留之际，言不及私，所恨者，不得尽供养之心，展辅佐之功而已。十洲采药，煎玉釜以无灵，二女簪花，怆云辘而不返；以统和十一年夏六月二十七日薨于行在，享年二十有四。皇情惻怛，母后悲伤，素服临丧，举哀尽礼。乃诏内臣，藏事博士相仪，载命冢人，占茔吉地。即以其年闰十月十六日庚子，安神于庆云山之阳，礼也。妃有皇子一人，早夭；皇女二人，咸以妙龄，未疏汤邑。呜呼！妃幼尊姆训，动奉礼经，慈惠积中，善德也；纡华发外，婉容也；散习紃紃，备功也；顺成辞令，和言也。夫以善德抚下，下之勤劳可达于圣聪矣；以婉容奉上，上之恩御克昌于皇胤矣；以备功训众，众妇之心勤于工作矣；以和言睦亲，亲族之情生于孝敬矣。圣聪达则进能之路开，皇胤昌则维城之基广，工作勤则黼黻之用充，孝敬生则雍穆之风著。总是众美，遭乎上圣，若使得其寿尽，其能引而伸之，由中及外，则化四方之民，咸臻于大顺，可也。况于□政乎？夫然则又何止统内官，佐王后坐论妇礼而已哉？噫，袞服有章，方增辉于轩景；琮衡灭彩，忽散魄于天浔；英而不宝，其命矣。夫臣素乏奇才，滥居清禁，恭承严诏，俾演芳声，虽于悝成嗟，不逮汉皇之赋，而旂旒撰德，聊书宋帝之妃。谨为铭曰：辰象斯广，婺女异于群星；萌殖且众，兰英以之独馨；婺与姿兮兰与德，出后族兮来掖庭，孝慈备兮君王慕，典册荣兮加异数，九华□短独惊□，仪范存兮音容去，音容去兮太渺茫，凶仗徘徊阡陌长，笳箫呜咽□何切，松有风兮草有霜，总帐空兮人寂寥。皇情恻兮宫女号，唯彼苍兮杳难问，千秋万岁兮云陵高。



契丹文是辽代为记录契丹语而参照汉字创制的文字。耶律阿保机建立辽政权后，为了适应新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形势，创制了契丹文字。契丹文字有两种：一种是大字，制字年代为公元 920 年（神册五年），另一种是小字，制字年代不详。辽亡金兴，契丹文字不仅仍被使用，而且影响了女真大小字。直到公元 1191 年（明昌二年），金章宗才下诏，罢用契丹字。此后，契丹字只流传于西辽上层。西辽亡，遂废。停止使用的契丹文字逐渐成了一种无人能解的死文字，因此，当人们从辽代帝后陵墓中重新发现契丹文字的实物时，竟然无法确定所用文字究竟是契丹大字还是契丹小字。经过数代学者努力，慢慢发现了契丹文字发音和造字的一些规律，并借以释读出部分文字。

契丹文铜铤

高 16 厘米，宽 15 厘米，厚 8 厘米
巴林左旗碧流台乡出土
巴林左旗博物馆藏



①



②



③

契丹大字残碑（3件）

- ① 残高 12 厘米，残宽 14 厘米
 - ② 残高 20 厘米，残宽 25 厘米
 - ③ 残高 15 厘米，残宽 17 厘米
- 辽祖陵龟趺山出土
巴林左旗博物馆藏

耶律延宁墓志（拓片）

长 84 厘米，宽 83 厘米

辽宁省朝阳县西五家公社石片大队柏树沟村辽墓出土

辽宁省博物馆藏

1964 年冬季，辽宁省朝阳县西五家公社石片大队柏树沟村西北发现一座辽墓，墓中出土了一合汉文与契丹文合刻的墓志。墓志文上半部刻十九行契丹字，下半部刻二十四行汉字。墓主耶律延宁葬于统和四年（986 年），曾出任过羽厥里部节度使。此墓志为我们研究辽代早期我国北方的疆域以及契丹民族的文字，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墓志汉文】

大契丹国故保义奉节功臣，羽厥里节度使、特进、检校太尉同政事门下平章事、上柱国、漆水县开国伯、食邑七百户耶律墓志铭并序。

公讳延宁，其先祖已来是皇亲。曾祖讳臬离骨；祖讳旨午不；孝讳萨割，并名已勇闻，庆由善积，祚将至英贤诞生，即萨割太师令公第二子也。以命世之才，开基之运，景宗皇帝念是忠臣之子，致于近侍。始授保义功臣、崇禄大夫、检校太保、行左金吾卫大将军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徕水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公尽忠尽节、竭力竭身。景宗皇帝卧朝之日，愿随从死。今上皇帝念此忠赤，特宠章临，超授保义奉节功臣、羽厥里节度使、特进、检校太尉同政事门下平章事、上柱国、徕水县开国伯、食邑七百户。公威极北之疆，境押沮悞之失圉。闻见归降，例皆森耸，妖砒扫尽，荡灭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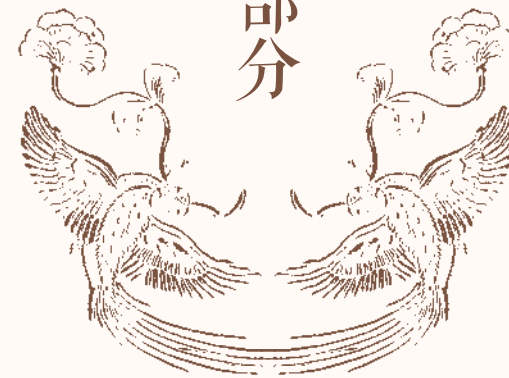
顽，路不拾遗，安人得众。天之道满，寿尽者然。以统和三年十二月三十日于羽厥里疮疾而薨，年三十九。圣上轸愍，即以令归国去。统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葬于白崖山之礼也。夫人频毕，令公大女，坤仪德备，令淑传芳，从夫荣而赴□，独归苦痛至切，睹灵帐前，萧疎冷落，血泪交流。男和哥，寺奴宾保控骨里，超群书算，武射猿猱。女喜哥演弥已，霸哥，迴察慈柔，芳年黯惠。公唐唐相貌，状若神姿。何有非常之福而无寿永之贞欤？今会葬连壘，即扁幽室，或虑寒来暑往，坐迁年世之期，雨灌霜封，莫识平生之事。谨为铭曰：

诞生令德，威镇北方，辅弼圣朝，出入将相，福兮已过，祸兮遄逼。卜连 兮安此宅，为来世之所识。

（转录自:辽宁工作队，《辽代耶律延宁墓发掘简报》，《文物》1980 年第 7 期）



第五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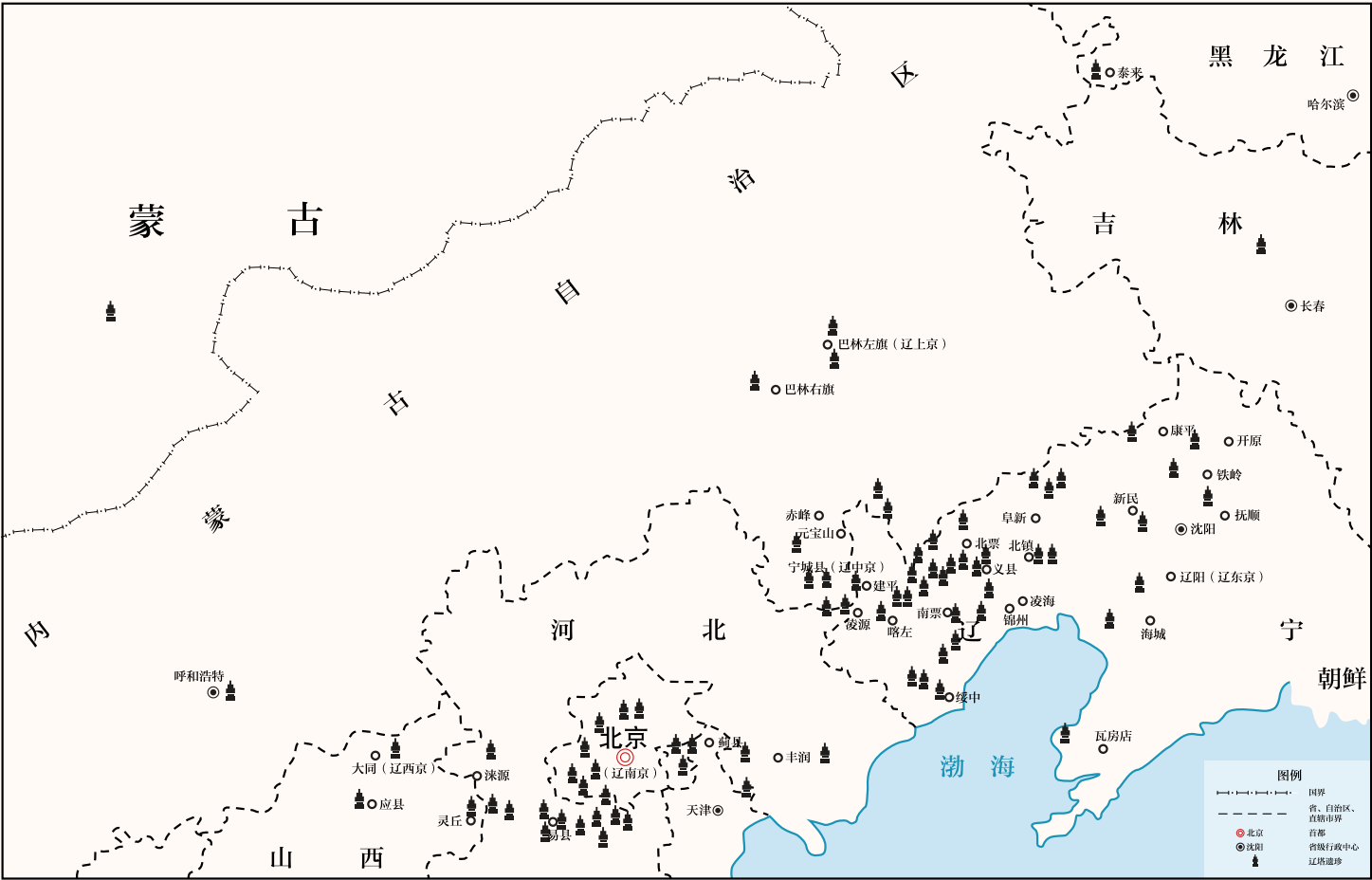
丨塔丨寺丨魏丨魏丨

辽代统治者推崇佛教，使得佛教在中国北部得到了辉煌发展。大量的皇家赐予、信徒的供养使寺院经济繁盛发展，高大的寺院建筑星罗棋布于帝国的都会州县。通过寺院俗讲、浴佛、荼毗火葬、千人邑等活动，佛教浸润到整个社会，成为重要文化纽带，并促进了民族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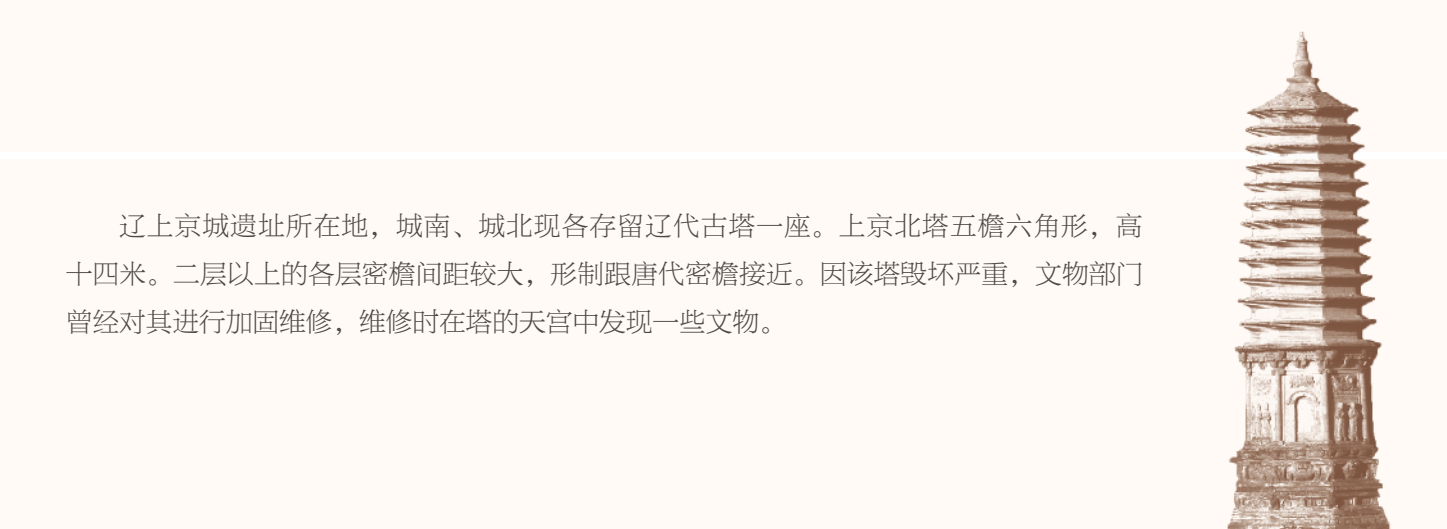
辽塔遗珍

辽代营建寺院佛塔甚多。建国后对一些尚存于地面的辽塔进行了维修，整修过程中，辽塔内往往出土有珍贵的文物。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应县木塔）内发现罕见的《契丹藏》（辽版大藏经）和版刻佛画等文物。1989 年，在内蒙古巴林右旗庆州释迦佛舍利塔（庆州白塔）的塔刹相轮檠等处，发现了经卷、小型木舍利塔等数量众多的文物。天津蓟县独乐

寺塔、河北丰润天宫寺塔、辽宁朝阳北塔等在维修过程中也都发现了一些重要的宗教文物。各地还清理了一批辽塔的地宫，比较重要的如北京房山北郑村塔基、密云冶仙塔基、顺义净光舍利塔基、吉林农安万金塔基、辽宁沈阳无垢净光舍利塔基、崇寿寺白塔等。



辽代砖塔分布示意图



铜净瓶

高 22 厘米，宽 10 厘米
辽上京北塔天宫出土
巴林左旗辽上京博物馆藏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右旗释迦佛舍利塔位于辽代庆陵及奉陵邑庆州城遗址内的西北隅，是一座八角七级楼阁式砖塔。该塔始建于辽重熙十六年(1047年)，二月十五日（佛祖涅槃日）开挖建塔的地面，经过两个月，四月十七日地宫建成，埋葬佛舍利。这个塔正式名称为“释迦佛舍利塔”，是辽兴宗为其生母章圣皇太后特建的佛塔。1988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立项予以维修时，考古人员发现了一批珍贵文物。

“千年万载” 铭银匙

长 9 厘米，宽 2.2 厘米
巴林右旗辽庆州城遗址出土
巴林右旗博物馆

匙面镌刻“千年万载”四字，柄细长向背略弯曲，尾端稍宽，与装有舍利的银瓶在一起置放，推测用以盛取舍利。



七佛贴金彩绘法舍利大塔

高 44.7 厘米，底径 13.8 厘米
辽庆州释迦佛舍利塔出土
巴林右旗博物馆藏

塔身外壁雕刻七佛立像，形态刻饰逼真，衣着线条简练流畅，刀法道劲娴熟，七佛全身贴金并勾绘有胡须。塔身彩绘以平涂勾勒为主，塔刹宝珠贴金。





七佛贴金彩绘法舍利小塔

高 23 厘米，底径 8.8 厘米
辽庆州释迦佛舍利塔出土
巴林右旗博物馆藏

七佛贴金彩绘法舍利小塔在技法上与七佛贴金彩绘法舍利大塔类似，只是体量较小。塔身外壁雕刻七佛立像，形态刻饰逼真，衣着线条简练流畅，刀法道劲娴熟，七佛全身贴金并勾绘有胡须。塔身彩绘以平涂勾勒为主，塔刹宝珠贴金。



淡彩原木七佛法舍利塔

高 23 厘米，底径 8.7 厘米
辽庆州释迦佛舍利塔出土
巴林右旗博物馆藏

淡彩原木七佛法舍利塔在技法上与七佛贴金彩绘法舍利大塔类似，只是七佛不贴金，塔身仅施平涂淡彩。

“十方佛”贴金彩绘柏木法舍利塔

高 45.5 厘米，底径 13 厘米
辽庆州释迦佛舍利塔出土
巴林右旗博物馆藏



彩绘汉白玉释迦佛涅槃像

长 60 厘米，宽 33 厘米，高 36 厘米

辽庆州释迦佛舍利塔出土

巴林右旗博物馆藏

涅槃像即表现释迦佛圆寂时的场面。佛经记载，世尊涅槃时，乃于宝床右胁而卧，因此，涅槃图像与雕塑中多依此而作。



联珠人物纹绣经袱

长 27.7 厘米，宽 27 厘米
辽庆州释迦佛舍利塔出土
巴林右旗博物馆藏

人物绣用红色四经绞罗作地，以铺绣作为主要针法，上下各有直条联珠带两条作栏，栏蓝色，珠白色。中间为一团窠联珠环。环上黑地白珠，大部分已断落。中间为一骑马人物，人侧身骑马，正视，戴皮棉帽，穿皮棉袍，着棕色皮靴。面形方正壮实，黄色胡须，并往两边翘起。两手高擎立鹰两只，疑为“海东青”。马也披挂，马尾扎成花状。其余空隙处散布各杂宝纹样，如犀角、双钱、竹磬、法轮、珊瑚。整个人物由橙、黄、蓝、浅棕等色块铺绣而成。



蓝罗绣梅花蜂蝶卷草纹巾

长 65 厘米，宽 50 厘米
辽庆州释迦佛舍利塔出土
巴林右旗博物馆藏

图案中心为一梅独放，枝干下白上红，有 14 朵五瓣梅花，其余均作花蕾状。大干铺绣，小枝锁绣，两边有花草两簇，14 只蜂蝶围绕树边。远方有或蓝或黄云状山四处，左右下方由白色联珠圈勾。



辽中京大明塔

大明塔即辽代感圣寺佛舍利塔。它是辽中京三塔中最大的一座，在辽中京城遗址内城南门——阳德门南侧、辽中京八坊之一的“丰实坊”中。大明塔建于1092年，为八角形十三层密檐式实心砖塔，全高80.22米，基部每面宽14米，周长112米，横剖面为八角形，两对边间的距离为34米，体态高大。



刺绣阿弥陀佛、文殊菩萨和 金刚手菩萨三尊像（2件）

清

长36 ~ 40厘米，宽26.4 ~ 29厘米

辽中京大明塔出土

宁城辽中京博物馆藏



朝阳北塔

朝阳位于辽宁省西部，市内原有呈鼎立之势的3座方形砖塔，依其方位，俗称东塔、南塔、北塔。北塔年久失修，破损严重。从1984年开始，国家拨款对其进行修缮加固。为配合维修工程，省、市文物部门于1986年春联合组成北塔考古勘察队，在塔周围进行钻探发掘。同年1月，发现并清理了辽代地宫。1988年11月上旬，拆除塔顶第13层檐后发现了辽代天宫，出土了舍利金塔、鎏金银塔、宝盖、玻璃瓶等一批稀世珍宝。1993年至1996年，再次对北塔进行考古勘探，确定朝阳北塔是集十六国时期三燕和龙宫宫殿建筑、北魏思燕浮屠、隋文帝敕建舍利塔、唐开元寺塔和辽延昌寺塔于一处，是全国唯一五世同堂的宝塔。



银菩提树

高 22.1 厘米
朝阳北塔天宫出土
朝阳北塔博物馆藏

银杆外包银片作树干，插在八角锥体台座上，银丝拧成绳状作树枝，卵形树冠，共16片弧边三角形叶。



镌刻龙纹花式口银碟（2件）

口径 11.4 厘米
朝阳北塔天宫出土
朝阳北塔博物馆藏

天宫共出土银碟八件，均完整，形制相同，大小稍异。平底，浅腹，十三瓣花式口，内底镌刻一龙纹。碟内皆盛珍珠、水晶、琥珀等各种供物。



白瓷方盘（2件）

口径 11.6 厘米
朝阳北塔天宫出土
朝阳北塔博物馆藏

直壁，内底两蝶相对，作振翅飞舞状。原内盛水晶珠等物。小圈足，腹壁作连弧状花式，素面。



白釉花口圆碟（2件）

口径 10.8~11.1 厘米
朝阳北塔天宫出土
朝阳北塔博物馆藏



白釉碗

高 6.9 厘米，口径 13.7 厘米
朝阳北塔天宫出土
朝阳北塔博物馆藏



《第三度重修》题记砖

长 57 厘米，宽 30 厘米，厚 7.5 厘米

朝阳北塔地宫出土

朝阳北塔博物馆藏



白釉狮

通高 20.8 厘米，底径 12.5 厘米

朝阳北塔地宫出土

朝阳北塔博物馆藏



波斯玻璃瓶

高 16 厘米，腹径 8.3 厘米，底径 5.7 厘米

朝阳北塔天宫出土

朝阳北塔博物馆藏

圈足，弧形腹，细颈，口似鸟首，上安子母口式金盖，柄上立短柱，似鸟尾，整体造型如一只昂首蹲坐之鸟。瓶内立一长颈弧腹小瓶。此瓶呈淡绿色，极轻薄，晶莹透明，而且造型奇特，是产于古代波斯地区的玻璃器珍品。



鎏金银塔

高 60.3 厘米，底宽 19.6 厘米

朝阳北塔天宫出土

朝阳北塔博物馆藏

银塔作六角形三重檐式。由基座、塔身、刹顶构成。基座六角形，铜质鎏金，下部矮而宽，上部高而略窄，有收分。每面双线刻出壶门，角突起作圆形倚柱。基座内空，放置的物品已烧结成胶状，上面黏附铜钱数枚，还有玛瑙球一个。塔身作六角柱状，铜质鎏金，下粗上细，套安三重金银塔檐。塔身内藏经卷等物。基座上面沿塔身一周安装勾栏，前后开门，有望柱、栏杆。基座与第一层檐间罩以银丝编织的“露幔”。第一节塔身每面线刻一尊坐佛，为释迦牟尼和密宗金刚界五方如来，佛下均有莲花和生灵宝座。第二节、第三节则刻写梵文。六角攒尖式银塔檐，下垂金铎。刹顶由平座、莲座、宝瓶、火焰、伞盖、月轮、宝珠等组成。



舍利塔

高 11 厘米
朝阳北塔天宫出土
朝阳北塔博物馆藏

基座三层，平台式，上面和侧面均镌刻云纹，基座底边外展。座上置单层八瓣金莲座，上承方形塔身。塔身四角刻出两个圆形倚柱，每面刻坐佛一尊，头戴宝冠，手结契印，结跏趺坐于莲座之上，佛像两侧饰祥云。塔身四周莲座上立有勾栏，栏板、望柱俱全，前后开门。塔檐单层，四角攒尖式顶，顶上安刹，由莲座、宝珠组成，脊上和檐下装饰珍珠串穿的流苏。



舍利罐

通高 4.5 厘米，口径 2.2 厘米，腹径 4.2 厘米
朝阳北塔天宫出土
朝阳北塔博物馆藏

原置金塔内。罐底托垫一块玉璧。罐平底鼓腹，小口圆唇，金盖金链。此罐以一块质地精良之玛瑙精工制成。罐内原盛舍利两粒，另有鎏金珍珠五颗。

木胎银棺残片（3片）

高 17 厘米，长 33 厘米，宽 13.5~20.5 厘米
朝阳北塔天宫出土
朝阳北塔博物馆藏

木胎银棺系木板制成，外包钉银片，舍利金塔应置于棺内，木板烧毁后仅存银片 3 片，并残存银钉。一侧银片上刻帝后礼佛图，一侧银片上刻佛祖涅槃，一侧银片上刻三尊佛。



木胎银棺北侧镌刻三佛示意图





木胎银棺东侧篆刻涅槃群像示意图



木胎银棺西侧篆刻礼佛示意图



金银经塔

残高 39 厘米
朝阳北塔天宫出土
朝阳北塔博物馆藏

金银经塔分为火炉、莲座、塔身、顶盖四部分。火炉作浅钵形，平底，铜质，上有豆座形连弧边银盖，盆内残存绵绢类物灰烬。炉盖上接仰莲座，座内置 1 朵单层八瓣金莲叶。塔身系四重圆筒形套，内装经卷。顶盖为金片锤揲而成，八角帽顶形，上面凸起作八瓣半敷莲花，顶尖安 1 颗大珍珠，边缘和下面饰以银丝穿串珍珠。塔身四重套，从外至内：第一重为金片，外面錾刻坐佛一尊和八大灵塔及塔名；第二重套为银片，刻三尊菩萨；第三重为金片，刻大日如来佛与八大菩萨，还有三行题记：“重熙十二年四月八日午时葬像法只八年提点上京僧录宜演大师惕紫沙门蕴侄记”；第四重银质，素面。



辽代滨塔

1993 年 7 月，辽宁省沈阳市文物考古工作队配合沈阳新民辽代滨塔抢救维修工程，对塔中有关佛教文物进行了清理。清理中发现塔身由下至上有三处瘞（yì）藏佛舍利等器物的塔宫，分别为下宫、中宫和天宫。共发现舍利子和金银器、铜器、瓷器、丝织品、珍珠制品、砖雕、石碑等器物 108 组件。从辽滨塔出土天宫石碑可知，辽滨塔建筑年代为乾统十年（1110 年）至天庆四年（1114 年），历时 5 年。同时也证实，辽滨塔古城即辽代辽州。



葫芦钮三足铜香炉

通高 12.8 厘米，口径 9.7 厘米

新民辽滨塔中宫出土

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铜熏炉半圆形盖子，葫芦立钮。盖上葫芦形与三叶形孔各三组。钮与盖子铆合连接。炉身直腹，三仿兽足。足上部与腹下部钉铆合。

长颈曲流铜净瓶

高 12.4 厘米，口径 0.4 厘米，腹径 4.3 厘米，底径 2.4 厘米

新民辽滨塔中宫出土

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铜净瓶平唇，直口，长颈，椭圆腹，圈足外撇。在口下部和肩部有凸弦纹，颈中部为扁圆半凸轮。腹上部为折流嘴，流嘴上扣盖。

北宋释道诚集《释氏要览》中记载说：“净瓶，梵语军迟，此云瓶，常贮水，随身用以净手”。据此可知，在宋辽时期，人们认为净瓶即军迟。唐代以前的净瓶式样不可考证。唐代早期的净瓶肩部没有汲水口，中晚期的净瓶肩部出现汲水口。宋辽时期，净瓶大多肩部带有水口。但是与唐代净瓶相比，原来的饮水口变成大汲水口。肩部的汲水口反而变成饮水口。两口的形制和用途完全颠倒。而且，净瓶也开始从实用器向供养器转变。到元代时期，净瓶成为与香炉、烛台一并出现的五供器。



狮钮莲花三足铜熏炉

通高 23 厘米，口径 10 厘米，最大直径 13 厘米
新民辽滨塔地宫出土
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铜熏炉平盖，狮纽。狮体中空，端坐，昂首，张口，双耳直立，目圆瞪，前胸有铃、带。前肢直撑，后腿屈坐，利爪分张，披卷鬃，尾上翘于背。毛发均为刀刻而成，造型生动逼真。炉身为莲花式，莲花瓣三层，每层八瓣，瓣为双层。边刻凹线，花为四蕊。束腰部分为镂空，墩形，镂空四分格，以如意云纹为格界，下部为菩提叶。其上下端均有凸管状空柱，上承炉，下连支座。支座为六瓣如意纹，以三长瓣为足。出土时炉内满盛香灰。在炉底部中孔上盖有孔铜片，以隔阻香灰并可通气。



三重套铜、银金函

铜函高 3.7 厘米，口径 1.9 厘米，底径 1.5 厘米
银函高 2.5 厘米，口径 1.4 厘米，底径 1.1 厘米
金函高 1.7 厘米，口径 0.65 厘米，底径 0.6 厘米
新民辽滨塔中宫出土
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舍利函为新滨塔中宫出土物品，原有木、铜、银、金四重，外包黄绸。这里展示铜、银、金三重函。盖罐形铜函，大口，尖唇，广肩，斜腹，平底。盖为四蒂叶上卷，叶枝回绕成柄，叶上刻有纹脉。银函形制与铜函相同，唯有盖子为五瓣。金函为外扣盖，平顶，上划一周弦纹。内原有舍利五颗。三重罐式套置的舍利函形式，为辽代晚期舍利装藏形式与制度增添了新证。



铜鎏金胡人跪像

高 7.9 厘米，宽 3.5 厘米，进深 5.5 厘米
沈阳小北崇寿寺释迦佛生天舍利塔宫出土
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铜鎏金胡人跪像出土于崇寿寺释迦佛生天舍利塔。该塔原位于沈阳市大东区白塔小学院内。它是一座八角十一级密檐塔，高约 25.9 米，始建于辽天祚帝乾统七年（1107 年），历时一年完工。该塔因破损严重，经市人民委员会批准于 1956 年拆除。拆除时出土各类文物 92 组件。



铜风铃

高 14 厘米，宽 7.5 厘米
1970 年代从辽阳市废品公司拣选
辽阳市博物馆藏



辽南京的佛教

辽南京是佛教中心之一。这一时期，兴修佛教寺庙在数量、规模和等级上，是继唐朝之后北京地区佛寺兴建的又一个高潮阶段。在佛经刻印方面，南京是《辽藏》的集结与刊行中心；辽代云居寺石经镌刻长达数十年，为后世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

银佛幡（4 件）

通高 17 厘米，砖座高 5 厘米
房山区北郑村辽塔出土
首都博物馆藏

幡 是佛教供养具。《长阿含经·卷四·游行经》载：“以佛舍利置于床上，使末罗童子举床四角，擎持幡盖，烧香散华，伎乐供养。”完整的幡一般由三角形幡头、矩形幡身、幡头下部及幡身左右垂饰的垂手、长条状的幡足构成。制作幡的

材质有丝、麻、银、铜、玉、木、纸等。

1977 年 6 月，房山县北郑村辽塔因年久失修，塔基附近又挖渠取土，致使该塔倒塌。文物部门对残塔和“地宫”及出土遗物进行了全面清理。





石雕观音立像

高 41 厘米，底宽 13 厘米

旧藏

首都博物馆藏

辽代兵部尚书、兴中尹赵庭睦曾经写诗歌称：

观音神力不思议，举世皈依颇异哉。

人各争奇金作像，工多炫巧木为胎，

积年弃石嗟谁顾，今日逢师入用来。

但蕴贞坚洁白德，宏材未见作遗材。

这不仅说明了辽代观音信仰与造像之风的盛行，而且也指出石质能表现出神灵贞坚洁白的德行。

绿釉贴花璆珞纹“杜家”款净瓶

高 25 厘米，通宽 10 厘米

密云冶仙塔出土

首都博物馆藏

净瓶瓶颈中部出檐，檐上饰六瓣莲花叶及十二道弦纹，下部为竹节状，共 4 节。瓶体上层饰七瓣莲花叶瓣，中间及下部交错饰璆珞瑞草垂纹。罐状注口，注口下方有“杜家”二字。釉色翠绿，间或绿中泛葱白，有细碎开片。竹节及十二道弦纹的凸棱处釉色为黑色。胎质致密，色白微褐。瓶底圈足，无釉，有旋痕及 3 个支钉印痕。密云冶仙塔位于密云县城东北 2.5 公里的冶山上。1988 年秋，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和密云县文管所对该塔基残址进行了清理发掘。



绿釉迦陵频伽像

高 16 厘米，两翅最宽 17 厘米，进深 22 厘米

旧藏

首都博物馆藏

迦陵频伽，意译作好声鸟、美音鸟、妙音鸟。其形象为上半身为人，下半身为鸟，身体类似仙鹤，两腿修长，双翅，头部或为童子，或为菩萨形象。手中常持各种乐器，或作演奏状，有反弹琵琶、吹奏箜篌 (bì lì)、笛子等乐器，或手捧花束。迦陵频伽在佛教经典中，一般在两种场合出现：一是弥勒佛或释迦牟尼佛对诸菩萨或众生说法之时，迦陵频伽与诸神鸟出妙音，闻者侧耳倾心；另一场合，迦陵频伽则出现在西方极乐净土，其具有“佛音”的象征意义。



辽以释废？

岁丁未，（元）世祖在潜邸，召见（张德辉）……问：“或云，辽以释废，金以儒亡，有诸？”对曰：“辽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亲睹。宰执中虽用一二儒臣，余皆武弁世爵，及论军国大事，又不使预闻，大抵以儒进者三十之一。国之存亡，自有任其责者，儒何咎焉！”世祖然之。

——《元史·张德辉传》

白釉黑花双系罐

高 17 厘米，口径 14.5 厘米，底径 9 厘米

敖汉旗新惠镇乃林皋遗址出土

内蒙古史前文化博物馆藏

系罐敛口，圆唇，双系耳，小圈足。灰白胎，施白釉。腹部对称画两幅漫画。画中人物大腹便便，以至于上无面目，下无大小腿。这可能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漫画形象。

辽末统治者之腐朽不堪，从一则史料可知：“自天祚亲征女真败绩，中外归罪萧奉先。于是谪奉先西南面招讨，擢用耶律大悲奴为北枢密使，萧查刺同知枢密院使。间有军国大事，天祚与南面宰相、执政吴庸、马人望、柴谊等参议，数人皆昏谬，不能裁决。当时国人谚曰：‘五个翁翁四百岁，南面北面顿瞌睡。自己精神管不得，有甚心情杀女直。’远近传为笑端。有人闻于天祚，天祚亦笑而不悟。”



海冬青纹鎏金铜饰片

高 24.3 厘米，宽 30.5 厘米，厚 0.03 厘米

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鎏金铜海冬青饰片为海冬青正面捕猎形象，双翼张开，利爪扑地，线条流畅。饰片周边亦有钉孔，为小帐装饰。

海东青属于鹰隼类飞禽。女真族为辽国进贡海东青而不胜其苦，因至于叛。史料记载称：“女真服属大辽二百余年，世袭节度使，兄弟相传，周而复始。至天祚朝，赏刑僭滥，禽色俱荒。女真东北与五国为邻，五国之东邻大海，出名鹰，

自海东来者，谓之‘海东青’，小而俊健，能擒鹅鹳，爪白者尤以为异，辽人酷爱之，岁岁求之女真，女真至五国，战斗而后得，女真不胜其扰。及天祚嗣位，责贡尤苛。又天使所至，百般需索于部落，稍不奉命，召其长加杖，甚者诛之，诸部怨叛，潜结阿骨打，至是举兵谋叛。”



结 语

“京都繁盛谁比矣，十二楼台重重起”，借助考古发现与相关文献，我们得以重见大辽五京重重楼台之一端、烂漫物华之片羽。面对穿越时空、静置眼前的如许美器，历史可资追溯、品味和借鉴的功用悄然而至——有关契丹族的神貌、辽代兴衰的轨迹、历史关键人物的命运、文物的器形纹饰、现存的遗址遗迹等，想必您都会关注、欣赏、沉思甚至追问过。而这正是展览的主要目的。

此外，借由大辽五京，我们大体勾勒出了契丹族及其政权的生发轨迹，而这一过程无可辩驳地实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和特点：“多元”，是指中华民族不是单一的民族，而是由不同民族所组成的复合民族共同体；“一体”，是指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已结合成彼此交融、相互依存的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